



高风颂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风颂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兰州部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革命友谊凝结的壮丽篇章

- 读《高风颂》·····方唯若(1)
- 幸福的时刻·····陈诗林(7)
- 课堂里的教诲·····王四海(12)
-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李 伦(15)
- 一套不寻常的旧棉衣·····石玉玺(23)
- 关怀·····郭文贤(25)
- 毛主席教子·····赵 斌(29)
- 父爱·····王俊魁(32)
- 毛主席看我们操炮·····于忠彦(37)
- 毛主席为关向应同志送葬·····李生有(40)
- 一瓶戒烟药·····郭文贤(43)
- 情深似海·····谭友林(46)
- 难忘的教诲·····陈诗林(53)
- 护送周恩来同志去西安·····何元吉(59)
- 难忘的两天三夜·····王治国(63)
- 给周副主席当警卫·····马洪山(73)
- 周总理视察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范扬俊(77)
- 深夜里的灯光·····晓 军(81)
- 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才浪费了·····晓 军(84)
- 建立政权就有钱了·····晓 军(86)
- 少奇拜师·····晓 军(87)
- 我们都是普通党员·····晓 军(89)
- 一粗蚕豆喻哲理·····晓 军(90)
- 全部送到前方去·····晓 军(92)

在前沿阵地上·····	李凯国 (94)
眼睛应向下看·····	宋志斌 (97)
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	宋志斌 (99)
朱总抓食堂·····	李凯国 (101)
总司令种菜·····	汪秀田 (103)
“修建篮球场有我一份”·····	李凯国 (106)
朱总司令的黑骡子·····	汪秀田 (109)
在叶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路宝银 (111)
“你们什么时候回北平来呀”·····	路宝银 (117)
上山打石鸡·····	路宝银 (119)
“我还等着喝水呢！”·····	路宝银 (121)
去西柏坡村途中·····	路宝银 (123)
邓政委来到中条山·····	于永保 (125)
赤胆忠心为人民·····	成 普 (132)
彭总心中装着人民·····	陈 明 鹿雨水 (135)
彭总在“百团大战”中·····	田成芳 (138)
五元边币·····	卫一吾 (144)
“处处事事要想到群众的难处”·····	田成芳 (148)
“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	陈 明 庞雨水 (150)
赏罚要分明·····	张成有 (151)
我为彭总喂战马·····	汪秀田 (153)
回忆彭总二三事·····	杨 兴 (158)
“我们当干部的要以身作则”·····	张成有 (161)
彭总看望伤病员·····	霍永贞 (163)
“别忘了有病的同志”·····	张成有 (168)
彭总生活小故事·····	陈 明 庞雨水 (170)
“要开会‘斗争’你哩！”·····	陈 明 庞雨水 (173)
贺老总在我们中间·····	周 龙 (174)
“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	谭友林 (181)

一袋炒面的故事·····	陈仕南(186)
“我替他打保票”·····	谭友林(188)
“要讲风格啊”·····	谭友林(106)
请将不如激将·····	谭友林(198)
贺师长和我们一起去搬神像·····	张 钦(201)
贺老总送我们两件“宝”·····	曾 征(204)
亲切的教诲·····	李福田(211)
“审问”陈毅司令员·····	晓 军(216)
任用“管半仙”·····	晓 军(220)
在林老身边·····	任峰华(223)
难忘的纪念·····	谭友林(228)
一颗比金子还亮的心·····	郭凤文(234)
跟刘志丹“闹红”·····	白仲元(238)
一件寻常的小事·····	王四海(244)
一个难忘的夜晚·····	王四海(247)
一项及时的命令·····	王四海(250)
“他是难得的人才”·····	王四海(253)
盲大娘的心愿·····	折仲恺(257)
刘志丹查哨·····	张金铭(260)
本色·····	孙家裕(262)
彭雪枫同志的故事·····	纪 锋(269)
跟彭雪枫师长在一起的日子·····	杜国军(275)
罗炳辉同志的故事·····	易 辉(281)
本钱·····	王俊魁 周福昌(286)
威斗何绍南·····	郭文贤 白二龙(290)
宽待俘虏·····	王玉崑(294)
“独臂照样于革命”·····	贾继毅(297)

革命友谊凝结的壮丽篇章

——读《高风颂》

方唯若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高风颂》，和已经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一样，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所记录的在革命征程中风云漫卷的珍贵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的壮丽画卷。细心阅读这本书，使人感到特别富有教益。

贯穿全书，《高风颂》的作者们以饱蘸着深情的笔墨，抒写了我党我军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的动人事迹，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品格。其中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党风中一种最可贵的传统，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

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这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力量源泉。在这一方面，《高风颂》的作者们以自的亲身经历，用史笔的实录精神，写下了最感人的回忆录。我们不妨简略地举出其中几个事例：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去看望伤员，摸摸铺草厚不厚，问问夜间冷不冷。一个头部重伤的重伤员抬不起头，便频频举起双手，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致敬。红军连长谢礼顺伤卧在床，毛泽东同志蹲下身子，双手从头到脚在伤员身上抚摸了一遍，当摸到谢礼顺同志浸透血迹的裤腿时，激动地向医护人员说：“他这双腿还要为革命爬千山，涉万水，你们要千方百计为他治好啊！”

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在翻越夹金山时患重病，红军指战员不断询问病况，在药物极端缺乏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争着冒死找药。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战士办事，不能只想到总部，要想到整个红军！”他自己吃苦菜，将部队送的仅有很少一点的牛肉送给伤员吃。

彭德怀同志在一次行军中，见一战士胳膊负伤，鲜血渗出绷带，便叫伤员骑他的马，伤员不骑，他亲自扶伤员上马，一边扶着马鞍走，一边和伤员拉家常。

长征途中翻雪山时，贺龙同志为抢救掉队战士，亲自带领骑兵，翻了四次雪山。过草地时，每到宿营地，就下令清查人数，发现不少同志因缺粮掉队，就令骑兵连拿着仅有的一百来斤，炒面，重返草地，找回掉队的同志。因为严重缺粮，贺龙同志发动部队挖野菜充饥，由于有些野菜有毒，便动员优秀党员干部组成“试验组”，贺龙同志带头当试验员，品尝野菜，区别有毒无毒，然后通报部队。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在革命队伍中，这些值得我们赞叹的友谊，宛如群星灿烂，光照人间。这种革命友谊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伦理方面反映了我们革命队伍的性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优秀品质。这种革命友谊当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也不是什么“朴素的感情”，而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下，在先进分子（首先是各级领导者）的模范行动带动下，蔚为风气，铸为传统的。因此，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觉悟，是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宝贵纽带。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最珍贵的篇章之一。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说：“古老的传说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这两个人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老的传说中最动人的友谊的故事。”（《列宁全集》第2卷第10页）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十分强调党的团结，说：“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互相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统一。”（《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9页）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显然用不着证明，我们的革命

事业正是严格遵循这种理论和实践，才无往而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者讲求友谊，同时也讲求同志间的不同意见的有益争论和对缺点错误的正确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时由于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也有过争论，甚至争论了好几天，在争论过程中各自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绘：“他们时常一前一后地走未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的时候又各自说自己所想的一套，直到半小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相互承认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两人放声大笑起来。”在如何处理友谊和批评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列宁一贯认为，党内对手不同意见的争论应该抱有正确的动机和团结合作的愿望。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影响。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环境，党内一些反对派还存在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但在列宁领导下，党的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生动活跃的气氛，党员仍然可以在党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展开如列宁所说的“最激烈的论战”。在国内战争时期，党内从没有什么人由于对党的军事政策和措施提出过不同意见而受到党的任何处分。

我们党在建党初期的党内生活基本上也是正常的。陆定一同志在《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一文（载《光明日报》“茗边老话”）中说：“反对陈独秀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斗争。尽管是政治斗争，也是可以健全地进行的。”“那时斗争的方法是文明的，健康的。在党的会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各抒己见，没有谁围攻谁。”“‘八七’会议对事不对人，对陈独秀连指名的批评也没有，党还是希望他自己觉悟。”不幸的是，这种党内关系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破坏，直到延安党内整风，才总结了经验，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样的任务。为了从理论上总结过去的教训，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问题。开始于

延安整风，尔后推广到全体人民中间的著名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说明团结是大局，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高风颂》一书中所赞颂的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军政之间那种融洽无间、亲密友爱的关系，正是我党实事求是地处理党内矛盾的本质反映。可惜，我们没有能将这些成功经验都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建国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某些重大失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都是用“左”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党内矛盾相联系，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长达十年的内乱。在大混乱中，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著作中关于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科学论述，被恣意歪曲并诬为“党内和平论”，胡说这是否定了所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荒谬地提出什么“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其结果正如刘少奇同志所告诫的，使好人“受打击、委屈与冤枉”，而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党内的团结松懈，使我们的干部解体，使党内的纪律削弱，使领导变为无能，使党的威信破坏”。尤其令人痛心的，《高风颂》一书中所介绍的一些功勋彪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一场浩劫中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的。

必须指出，十年内乱中风靡一时的所谓“共产党斗争哲学”，是早被列宁所批判和否定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一九〇九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召回派和造神派的派别组织在一个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时，列宁就尖锐地揭穿它的反马克思本质。列宁说：“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里，这一堂宣传课程的教学大纲有几十个、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话）。但是你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哲学距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愈远，它就愈加频繁地用‘无产阶级的’字样来对天发誓。”（《列宁全集》第15卷444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是把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体性看作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应用于人民内部，就要正确处理友谊和争论、批评的关系。团结是大局，不同意见的有益的争论和对缺点错误的正确批评，则会更加加深同志之间的友谊。

这已反复地为我们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所证明。《高风颂》的宝贵之处则用我党的正面经验证实了这个真理。

恩格斯说得好：“没有那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珍惜革命友谊，增强革命团结，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优良传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扬，并有了新的做法、新的经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高风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宗旨下介绍给广大读者的。我们深信，一切这样的革命回忆录，一旦笔之于书，就会不同程度地转化为精神力量，使我们的事业繁荣兴旺。

幸福的时刻

陈诗林

1931年元月3日，即龙岗战斗胜利的第三天清晨，雨后初晴，旭日东升，朝霞似锦，万道金光撒满山林，坐落在山脚下的小布兵站显得分外清新秀丽。全站的医务人员，开始给伤病员进行检查治疗。这时，突然走进来几个红军干部，不知道是哪个医生惊讶地喊道：“看，毛委员、朱总司令来啦！”我凝视着披着朝霞、漫步走来的毛委员、朱总司令，手里提着水壶，竟忘记放下。这两位红军领导人，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头戴红星八角帽，身着淡绿色军装，脚穿草鞋。毛委员手中还拿着一把红漆雨伞，两人边说边笑走进了病房。这时，站长、医生、卫生兵忙迎上前去，毛委员身边的一个干部说：“同志们，伤病员们，毛委员和朱总司令来看望你们啦！”顿时，安静的病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一个个脸上呈现出喜悦的笑容。轻伤员忙起立致敬，重伤员躺在草铺上抬头仰望。毛委员、朱总司令面带笑容向大家频频点头，连连挥手致意，并让大家坐下、躺下。然后，走到伤病员面前，跟他们握手，进行亲切慰问。

“你伤在什么地方？夜间冷不冷？”毛委员边问一位伤员，边弯下腰摸铺草厚不厚。这位伤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连忙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腰部。毛委员点了点头说：“伤不轻啊！”转身对站长说：“要好好护理伤病员，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要想法子让他们吃好，休息好，治疗好，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有一位重伤员，头部被敌人的大刀砍伤，包着纱布，不能说话。他躺在草铺上，想抬头看一眼毛委员、朱总司令，但抬不起头来，只好频频举起双手，向毛委员、朱总司令表示敬意。毛委员、朱总司令急忙走到他身边。毛委员蹲下身子，用温暖的手从头到脚在伤员身上抚摸一遍。这位伤员看到了毛委员、朱总司令慈祥的面容，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簌簌地往下直流。他使出全身力气想起来，但支撑不起来，朱总司令双手轻轻地把他按了按，小声说：“好同志，要好好养

伤哟！”

毛委员、朱总司令一个一个慰问伤病员。最后走到谢礼顺跟前时，毛委员又一次弯下腰，摸着他腿上带血的裤子，有点激动地向站长说：“他这双腿，还要为革命爬千山、涉万水，你们要千方百计给他治好哟！”

“多大啦？”朱总司令亲切地问道。

“十六岁。”谢礼顺摸着带伤的腿说道。

“哪年参加红军的？”

“前年。”

“在家干什么？”

“拉长工。”

“哪个部队的？”

“三十一团的。”

“是干部吧？”

“刚当连长。”

“好样的。”朱总司令蹲下身子摸着谢连长的腿说：“快治好腿，战士们盼你早回连队打胜仗哩！”

谢礼顺听了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话，非常激动，用全身力气坐起来，眼里挂着泪花说：“谢谢毛委员，谢谢总司令！”

我看着毛委员慈祥的面容，朱总司令和蔼可亲的神态，对伤病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只觉得心里热呼呼的。就在这时候，毛委员、朱总司令向我们医务人员走来，教导兵站的医务人员，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每一个伤病员。毛委员亲切地摸着我的头问道：“小鬼，多大了？什么地方人？”

“十四岁，宁都东山坝人。”我立正回答道。

“噢，本地人，东山坝离小布六十里，对不对？”

“对，对。”

“好好护理咱们的阶级兄弟，卫生兵的工作很光荣啰！”

我听了毛委员的教导，一时不知说些啥好，身子站得定定的，一个劲地点头。毛委员的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坎上。

慰问伤病员结束后，朱总司令请毛委员给大家讲话。毛委员把手向上一挥，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我和总司令来看望你们，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龙岗战役中，由于战法得当，一下子歼灭了一万多敌人，还活捉了敌人的师长张辉瓒，挫败了敌人的‘围剿’，这是一个大的胜利哟！在战斗中，你们挂了彩，是革命的功臣，党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功绩的。”毛委员环视了一下伤病员，然后大声说：“蒋介石，我深知此人，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可以预料，今后将有更大的战斗，希望你们安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去消灭更多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立更大的功勋！”毛委员宏亮的声音，响彻病房，传遍整个小布兵站，使全兵站的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慰问伤病员后，微笑着向我们告别。全站的医务人员、炊管人员和轻伤员，怀着敬仰和惜别的心情，送呀，送呀，跟随着毛委员、朱总司令，一直走到兵站大门外的公路上。毛委员、朱总司令一再挥手，叫大家回去。同志们虽然停住了脚步，但大家踮起脚尖，望着毛委员、朱总司令魁梧的身影，穿过枫林，翻越山岗，一直走向远方……

课堂里的教诲

王四海

1936年7月，为了培养文武双全的各级指挥员，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党中央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新文字业余学习班。我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志丹县委军事部副部长，也十分荣幸地参加了新文字学习班的学习。

9月的一天上午，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徐老（徐特立）上新文字课。一节课快要结束时，忽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教室后门。“啊！是毛主席来了！”我认出了他。坐在后排的同学们闻声都投以喜悦的目光，纷纷站起来给毛主席让坐。主席快步走到大家跟前，连连摆手，小声地说：“坐下，坐下。”说着，就和同学们挤在一条长凳上听课。

课刚上完，主席起身向徐老走去。这时，徐老才看见了主席，两人快步走到一起，亲切地握手，互致问候。

“你辛苦啦！徐老。”

“主席辛苦，工作那么忙还来听课。来多久了？”

“刚来一会儿。”接着，主席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学生的学习情况。

“学生的学习成绩咋样？能学进去吗？”主席问。

“他们都很用功，有的已学会读新文字报了。”徐老高兴地回答。

主席听了显得格外兴奋。接着，又询问了能否编一本新文字字典，纸张够不够，大家对学新文字有什么反映等一系列问题。徐老都一一作了回答，并说：“大家对学新文字反映都好，就是林彪反对。”

主席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他反对不要紧，只要学生们拥护就好。”

同学们见主席和徐老在亲切地交谈，都不约而同的围过来，屏住呼吸，想聆听一下领袖的教诲。徐老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就问主席：“有时间没有，能不能给同学们讲讲话？”

“那不是要耽误上课喽？”主席说。

“你看，他们都等着啦！你不讲行吗？”徐老又一次代表同学们要求主席讲话。

大家心想，主席工作那么忙，时间非常宝贵，恐怕是不会专门讲话的。说真的，我心里很矛盾，又想听主席讲话，又不愿意占用主席宝贵的时间。正当大家猜测不定时，突然，主席爽快地告诉徐老：“那我就说几句。”

顿时，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自动坐好。主席示意请徐老也坐下后，就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开始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毛主席说：“首先，我们要感谢徐老对同志们的关怀和亲自教学的精神。他年龄那么大，我们的条件又很差，天气这么热，还挤时间给同志们教文化，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里，主席稍作停顿，环视了一下大家，又看了看徐老后，提高了声调继续讲道：

“这是为革命，为了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过去，你们受土豪劣绅、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没钱读书。现在，要革命就要懂得革命道理，要懂得革命道理就要学习文化，文化提高了，学习马列主义也就容易了。”此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主席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回荡，同学们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主席和蔼的面容和有力的手势。

主席又接着说：“你们都是挤业余时间来学习。为什么要来学习呢？我想，你们一定是在工作中碰到困难了吧！否则，就不会来学习了。徐老是为革命而教，你们是为革命而学，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你们要把学习的成果运用到党、政、军、工、农、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去。”

主席又讲了为什么要学新文字，怎样开展根据地的扫盲活动等问题：最后，还特意向参加听课的部队同志作了指示。他说：“你们更要努力学习，因为部队担负着三大任务，在战场上要和敌人直接对话，没有政治文化水平，就可能说错话。因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主席的讲话，大约只有五、六分钟时间，但对我们的教育却远远超过了几堂政治课。同学们对学习文化的目的性更明确了都暗暗下定了刻苦学习的决心。

上课铃响了，主席微笑着向同学们招了招手，和徐老握手告别，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开了教室。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

李 伦

9月的南泥湾，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山坡上，一群群牛羊在白云下浮动；河沟里，黄澄澄、金灿灿的稻谷翻着波浪；火一般的海棠、红枫、栗子树，掩映着一排排雪白的窑洞；悠扬的信天游在蓝格英英的天空里飘荡……。

刚吃罢午饭，王震旅长兴冲冲地刮完胡子，又拿出一套新军装一边试着，一边对站在一旁的通信员笑了笑说：“傻看着我干啥？快，去通知营以上干部即到旅部来！”

“首长，有什么大喜事呀？”通信员忍不住问道，又笑着说：“瞧你，乐得把胡子都刮了。”

“小鬼，告诉你，是天大的喜事！”王震旅长满面春风地说：“明天，毛主席要来南泥湾！”

“什么，是毛主席要来？”

“对，是毛主席！”王震旅长微笑着点着头。

毛主席要亲临视察的喜讯，象春风添翼，霎时传遍了南泥湾。干部战士高兴得简直象过节一样，有的打扫窑洞，整理内务；有的理发洗澡、换衣服；炊事班的同志们更加乐得闭不上嘴，忙着选菜、杀猪、抓鸡鸭，都想把自己生产的每一样东西，让毛主席尝尝。

夜，来临了。原野里秋虫在弹琴歌唱，空气中飘荡着稻谷和瓜果的甜香。南泥湾的夜晚多么迷人，它蕴含着战士们多少幸福的憧憬和希望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望着满天繁星，盼着早点天明。可是，夜却显得特别的长，时光过得特别的慢。

第二天清晨，霞光万道，天气格外的晴朗。同志们早早来到田间地头，打谷场上，不约而同地向延安的方向眺望。大家盼啊，等啊，突然，一辆汽车朝旅部金盆湾急驶而来。车刚停稳，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影就出现在车门口，并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等待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

主席快步走到同志们中间，挨个和大家亲切握手，大声地赞扬：“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祝贺同志们丰收！”

主席又转过头来，对身旁的王震旅长说：“我在路上看了玉米、豆子、瓜菜，长得都很好，只是有的豆子有虫子，要注意灭虫。”原来主席一进南泥湾地区就下了车，一边走，一边查看地里的庄稼，还和地里劳动的干部战士谈了话。当来到旅部时，已经整整走了一上午了。

王震旅长见毛主席风尘仆仆地走了这么长时间，就请主席到新修的窑洞里休息一会准备吃饭。主席精神饱满、兴致很高，笑着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在外面看看。”说着，连口水也没喝，就同大家在旅部周围观看新盖的房子和新开的窑洞。

金盆湾完全交了样子！一排排新盖的瓦房坐落在绿树丛中，刷得白生生的窑洞布满山腰。毛主席触景生情，对王震旅长说：“还记得我给你念过的朱老总勘察南泥湾时写的那首诗吧？”说罢，望着远山低吟道：“中清人烟密，伊反成三光；至今遗迹在，可恨粮田荒。”主席回过头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说：“这首诗描写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你们就把一个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富饶的地方啊！”

正说着，已来到旅部新修的办公室。乘休息的工夫，主席点着烟打量着这座全用木头盖成的房子。屋内十分简洁，桌椅板凳都是自己制做的，显得有些古朴。

不一会，开饭了。桌子上，炒的、煎的、炖的，满满的摆了四十二个菜，全是三五九旅自己生产的。还有山鸡、野蘑菇、野羊肉、野猪肉等。王震旅长还亲自给主席做了家乡菜。看着战士们生产的丰硕成果，毛主席格外高兴，笑着说：“这么多的菜，我尝都尝不过来！”说着便招呼大家坐下一块吃饭。“你们加油吃，这都是你们劳动得来的。”

这时，一个战士端着一盘菜上来。主席见了问道：“这是什么菜？是哪里来的冬笋？”

王震旅长笑了笑说：“主席，这是南泥湾的特产，嫩包米棒子心，你尝尝。”

主席一尝，果然不错，连连称道：“好，做得好！色、香、味都有

了，可以以假乱真嘛！”

大家都被主席风趣的话引乐了。

主席问：“大家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王震旅长回答。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王恩茂副政委说：“星期天中午多半吃大米白面，有时还杀头猪，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主席很满意，又接着问：“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大家回答：“一个也没有。”

接着，毛主席亲切地叮咛：“告诉同志们，不要饮‘柳根水’，要注意卫生，爱护身体。”

毛主席细致入微的关怀，使大家十分感动。

主席又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主席的话，使同志们又想起了三年前初到南泥湾的情景。

1940年冬，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高唱着豪迈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没有住处，战士们就采来树枝搭草棚；粮食不够吃，战士们就以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就自己捻毛线，织毛衣，衣裳破了就自己缝补。南泥湾的冬夜是异常寒冷的。由于被褥单薄，黎明前天太冷，冻得入睡不着，大家就起来，升起篝火，围着火堆手拉手且歌且舞，等待天明。稍林里回响着雄壮的歌声：“正当黑夜黎明前，干柴烈火南泥湾，野火照人歌且舞，闯过今年到明年！……。”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就是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用双手和汗水，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想到这里，旅首长一边向主席碗里夹菜，一边汇报部队的生产情况。刚来那年，平均每人种三亩地，今年每人平均种三十亩。去年的日号是：

“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的指标是六石一斗细粮，六斤皮棉……

主席听着，不时点头微笑。汇报完了，主席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还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饭后，毛主席来到通讯连。见一孔孔新开的窑洞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从那里来的？”战士们回答：“是从山上取石自己烧的。”

主席又问：“桌子、凳子是不是自己做的？”

大家说：“都是自己做的！”

主席还一件件仔细看了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做的镢头、锄头、镰刀、编的筐子、做的扁担、杈子、纺车等。还看了战士们用野杏仁榨制的擦枪油和自己做的木枪、木马、山羊、平台、天桥等训练器材。毛主席满意地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说完，又告诫大家：“你们不但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把兵练好。你们前面不远就有敌人，他们随时都会来进犯你们，抢你们的丰收果实。”

战士们一致回答：“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练好兵，用生命来保卫边区，保卫丰收果实。”

主席又拿起桌子上一个学习本，看了上面写的字，摸了摸“纸”的厚度，高兴地笑了。

王震旅长对主席说：“桦树皮的用处可不小哩，不光能写字，我们还用它做饭盒，做斗笠。”说着，从墙上取过一顶桦树皮斗笠给主席看。这是一位战士精心制作的斗笠，周围用柳条镶边，上面端端正正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毛主席看了看，不住夸奖战士的手巧，斗笠做得好。

主席走到伙房，看望炊事人员。老李正在切菜，看见毛主席来了，连手也忘擦，湿漉漉的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得嘴上的胡子直抖，不知说什么好。

主席问：“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四十几个人。”

“辛苦啦！”主席赞扬地说。

老李回答主席说：“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起了泡，比自己辛苦得多。”主席又鼓励他说：“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

秋风吹拂着杨柳飘飘起舞，给秀丽的山川增添了诗一般的意境。毛主席走了许多地方依然兴致勃勃。在旅首长的陪同下，沿着田间小路，来到一个很大的养猪场。

饲养员小杨正在给猪喂食，见这么多首长向他走来，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主席上前问道：“小鬼，你是那里人？”

小杨一看是毛主席，激动得赶紧将手往围裙上一擦，敬了军礼，回答说：“我是湖南茶陵人。”

毛主席笑了笑说：“我们是老乡嘛。茶陵我去过，这里喂猪是否和我们家乡喂猪一样？”

“这里喂生食，我们家乡喂熟食。”小杨干脆地回答。毛主席的话使他感到格外的亲切。

主席又问：“你一人喂多少头猪？”

小杨腼腆地笑了笑，说“不多，一百三十多头。”

主席一听，赞扬说：“不简单呀！”

王震旅长在一旁给主席介绍：“他还是养猪模范呢！”

主席一边夸奖，一边走进小杨住的窑洞，用手摸了摸被子，看他铺的什么，问寒问暖，十分关心。离开时，握住小杨的手说：“你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要发扬革命传统。喂猪工作很光荣，也是为了抗战，你说对吧？”

毛主席的关怀使小杨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他激动地说：“对！对！我一定听主席的话，努力把工作做好！”

离开猪场，大家走到九团后勤处。在一块苞米地边，主席停了下来，向九团政委曾涤同志问道：“你看，苞米有些发黄，是什么原因？”

曾涤同志回答：“这地方干，缺水、缺肥。”

主席说：“我看这里不象南方，一年之计在于春，而是一年之季在于冬。冬天送肥有好处。你们不是缺乏工具吗？一根棍子就可以挑冻成块的大粪。有肥就有粮，达到耕三余四。”

正说着，一个战士挑着一担九龙泉的水过来，曾涤同志用桦树皮木碗喝泉水。毛主席见了也要喝。同志们劝主席不要喝。主席风趣地说：“没关系，我身体很健康，什么样微生物都可以抵抗。”说着，就用桦树皮木碗舀了泉水，喝了一日，称赞道：“这水很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看看。”

来到九龙泉边，主席指着汨汨的清泉问道：“这水化验过没有？有毒没毒？”

曾政委回答：“化验过，没毒！”

主席用手搅着水说：“这水很好，不但可以喝，还可以浇地嘛。”

说着主席点上一支烟，走到一棵柳树前回过头问道：“部队军民关系搞得怎么样？”

旅首长们，立即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时，边区十分困难，三五九旅拿出七百多万元给难民安家，开展了爱民运动，制订了爱民公约。具体规定每年每人包括干部在内给群众做三个劳动日，为群众办好事。逢年过节请群众来部队作客，看节目。王震旅长还带头挨家挨户给老百姓拜年，群众很受感动。团长陈宗尧带着战士给两个老人挖窑洞、修厕所。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被子。李老大爷见陈团长冬天光着脚还带头为群众干活，很感动。叫老伴赶做了鞋、袜，还扯下一块布，专门跑到延安城，请人写了“我们一家”四个字。老大爷说：“宁愿我们不盖被，也要让陈团长穿上鞋。”

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三五九旅都开赴前线去打敌人。正是锄草的时候，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帮助部队锄草，并写信给战士：“你们的庄稼长得很好，我们决不能让它荒了，请放心！”三五九旅一直把敌人打到镡川以南，取得了打仗、生产双丰收。

主席听完汇报，十分高兴，不住赞扬三五九旅做得好。他一边视察，一边亲自为三五九旅修订生产规划，描绘着未来美好的图景……。

秋日的夕阳，撒下一片温暖的霞光；微风习习，成熟的庄稼飘散着诱人的芳香。黄昏的南泥湾，镀上了一层金黄色，愈加显得可爱、动人……。

毛主席的视察，使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全旅上下立即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热潮。1944年，他们不仅实现了“耕一余一”，而且向政府上缴公粮一万担，创造了历史奇迹，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军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一套不寻常的旧棉衣

石玉玺

1941年的深秋，陕北高原的早晚，已使人觉得有些寒冷，许多人穿起了棉衣，毛主席却依旧穿着一身旧单衣。一天傍晚，中央管理处的一位同志提着一个包裹走来，告诉我说，这是毛主席的棉衣，要我转交给毛主席。当时，我们警卫班的九名同志都在场，大家高高兴兴地围拢来抢着解包裹，想看看毛主席的新棉衣。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不久中央管理处从敌占区搞来了一部分棉花和布匹，心想这个包裹里肯定是管理处给毛主席做的新棉衣。可是，打开包裹一看，我们都愣住了。大家都不解地望着管理处的同志，问道：“现在我们有了棉花、布匹，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做一套新棉衣呢？”管理处的同志急忙回答说：“我把新棉衣送到主席跟前的时候，主席轻轻地抚摸着那件新棉衣，深情地对我说：

‘我换一件新棉衣并不难，可我们想想，现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多困难，全边区人民的生活多困难，全边区人民是不是都能穿上新的？全军、全国人民能不能都换上新的？’最后，主席还是要我把旧棉衣重新拆洗一下再穿。”我们警卫战士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平静，久久望着这套熟悉的棉衣，泪水渐渐模糊了眼睛。此后，就是这套旧棉衣，又伴随着毛主席经历了多少个不平凡的岁月啊？！

1942年2月，我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是穿着这套旧棉衣日以继夜地开会，写文章，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还经常风尘仆仆地往返于枣园、杨家岭之间，领导全党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1942年5月，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同与会代表们亲切合影留念，穿的也是这套旧棉衣。当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围困，边区军民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并带领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老人家也是穿着这身旧棉衣，和我们一

起开荒生产，纺纱织布，吃小米饭，喝南瓜汤。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是毛主席穿的这套不寻常的旧棉衣，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当年毛主席穿旧棉衣的情景，就仿佛又听到了毛主席那语重心长的教导：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

（周宝昌 整理）

关 怀

郭文贤

1937年元月，中央机关从志丹县搬到延安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分别住在凤凰山下的两个院落里。那时我叫郭志明，是军委警卫营二连二班长，和全班战士一起，日夜担负着凤凰山住地的警卫任务。

在毛主席院子大门口，每岗站一人。主席办完公或中间休息时，常和哨兵拉拉话或到我们住的房子来坐坐看看，问寒问暖。一天早上，我上哨不久，天突然刮起寒风，飘起雪花来。我衣服穿少了，有点冷。这时主席走出窑洞，仰头看看天空，又看看我，便走近前来摸摸我身上的衣服说。“天变啦，冷吧？回去加点衣服。”

“我不冷。您快回屋去吧。”我有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别撒谎啦。你看我穿得比你厚得多，一出来还打了个寒战呢。你是放心不下哨位吧？”主席一下看穿了我的心思。

“不要紧，就一会儿功夫嘛。你们既要坚守岗位，又不要冻坏了身子。”主席说到这里，拍了拍我的肩膀，风趣地笑着说：“如果你们都冻病了，谁来警卫我？咱们要互相关心嘛。”在主席再三催促下，我跑回宿舍加衣服，直至来到哨位，主席才笑吟吟的往回走。我望着主席离去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在那段日子里，主席整天整夜地不知在写什么文章，有时写得太疲倦了，就走出窑洞散散步，或和警卫员贺清华、儿子毛岸英打打乒乓球。球台是块简易的大石板，设在院子中间。球网是白线织的，球拍用木板自制。球有黄、绿两色。有一天院子里没人，主席就站在大门口喊我（我们班住在主席院子大门外）：“郭志明，你来和我打几盘乒乓球。”当时，我连打乒乓球的规则都不懂，根本就不是主席的对手。但我为了让主席散散心，解解疲劳，就去硬着头皮招架。主席总是把球打得慢慢的、高高的，好像跟一个小孩游戏似的，很少抽杀，不打怪、刁、旋转等使我不能应付的球，还边打边耐心地教我。打了十多分钟球后，主席放下拍

子，问我们班里谁能打乒乓球。我说：“都和我差不多。”主席便亲切地说：“你这个班长要管好站哨，还要关心战士们的体育活动呀。”主席给我讲了一番道理后，又说：“以后我教你打乒乓球，先把你这个班长抓起来。”还关切地教我怎样组织全班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毛主席不仅在生活娱乐上关心警卫战士，而且在政治学习上也谆谆教导和耐心帮助我们。一天，我在大门口带班时，忽然听到主席在院子里叫我。我跑步前去，主席微微欠下身子，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识字吗？”我就认真地回答主席：“我是延长县人，1935年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从小给地主放牛羊，只能认几个字。”主席便让我去他办公室。

这是一排相通的三孔石窑，从中间一孔进门，靠右一孔是主席的书报室和警卫员的住室，靠左一孔是主席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我进到主席办公室一看，唉，摆设太简单了，除了一张大方桌和老木椅，就是“文房四宝”和许多书籍。

“你认识这几个字吗？”毛主席拿起一本书，指着封面上的书名问我。

“一个也不认识。”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当红军战士，要学习革命理论，科学技术、战术技术等等，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光会拿枪站岗打仗是不够的。”说到这里，主席点燃一支烟，左手权在腰间，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大部分红军战士都出身农民，家境贫苦，没有上过学、念过书啊！小郭，”主席突然提高了嗓门：“你回去转告连里干部，一定要组织好干部战士们学识字，要订出规划来，每人每天学二、三个生字，做到会认，会写，会用，……”

十多天后，主席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先问我识字的情况。我当即把随身带的学习文化作业本送给主席看。主席看得很认真，边看边用毛笔在上面批改，然后又倒转笔尾；数着我达到“三会”的字共有二十八个。他高兴地一下子站了起来，随即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工农分子知识化”几个大字，鼓励我要坚持不懈地学下去，还用生动形象的例子教我怎样识字快：“你们站岗的‘站’，字，就是由立正的‘立’和占领的‘占’

两个字组成，这样可以学一知三。你的名字也是这样，士在上，心在下，日月为明嘛……” “你学得不错，连队怎么样？”主席又点燃一支烟，亲切地问我。

我一下有点心慌起来，因为我前几天就想给主席汇报，可是，几次走到主席窑洞门口，看到他正全神贯注地写文章，想到他常常到深夜才睡，时间太宝贵了，便又退了回去。没想到主席还记着这件事，我便作了认真地汇报：

……全连按每个同志认字的多少，分别编成甲、乙、丙三个组，能者为师，甲组教乙组，乙组教丙组，人人结对子开展认字字竞赛。大家学文化可刻苦啦！没有纸和笔，就用木棍子在地上练写字，行军中，各组把事先写在黄裱纸上的生字贴在背包后面，一个看一个，边走边认，在战壕内，用手指在壕壁上划字，劳动场上，边干边互相提问……。

“好。”主席听到这里，很兴奋地说。“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你们就一定能很快成为既有军事素质，又有文化知识的革命战士。”

我听着主席这番话，望着主席那坚毅而亲切的神态，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地点头。我心里默默地说：主席啊，请放心！你的话我完全懂得。我们一定……一定……

（王俊魁整理）

毛主席教子

赵 斌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人，又是一位平凡的人；他是全党的领袖，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我有幸作为一名警卫战士在他的身边生活过，亲身感受到了他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胸怀和作为一位父亲严于教子的优良品德，他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教子成长的一言一行，为我们培养教育后代树立了光辉榜样。

延安北门外的王家坪，是毛主席曾经居住过的地方，1946年至1947年3月，他在这里日夜操劳，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在他居住的窑洞前，有一块三、四尺见方的青石板桌子，油光光的，他经常坐在石板上读书看报，接待来客。1946年2月，他的儿子毛岸英从国外留学归来，这块青石板也像他的主人一样，热情地接待了远方归来的骄子。在那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毛主席以父亲、主人的双重身份，把毛岸英拉到青石板前坐下，倒了一杯清茶，亲切询问他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毛主席满脸喜气，一双深邃的眼睛出神地盯着儿子，看着他那宽宽的额头，清瘦的脸颊，看着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神态，作为父亲，毛主席由衷地高兴了。残酷的战争环境没有夺去他生存的权力，他终于幸存了下来。他在革命的熔炉里得到了锻炼成长，知识又使他变得更加聪明了。毛主席抚摸着儿子的手，细心地听着他的汇报，还不时插问，听到高兴处，发出舒心的微笑。当时听完了儿子的汇报，说：“看来你学得不错，但只是知识的一半，因为是书本上的，还有一个大学，需要你上。”毛岸英听到这里，眼睛睁大了，急切地看着父亲。

“这就是劳动大学。”毛主席说。

岸英听了父亲的话，笑着点了点头。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话，等待着父亲的教导。

他老人家似乎也了解儿子的心情，笑着说：“这个大学外国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现在有了，这就是边区的农村。”说到这里，他加重了

语气：“老师就是边区农民。”

是的，七年前，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毛主席就给广大青年提出了一条检验自己是否是一个革命者的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今天，他在谆谆教导儿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走中国革命青年的道路。

为了让岸英多了解战士的生活，就在儿子回来不久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就把岸英领到了我们连。当时我们正在吃饭，毛主席看过了我们碗里的饭，询问了近期的伙食情况，然后，指着岸英对我们热情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孩子，叫岸英。他刚从国外回来，对延安的情况好多不了解，不懂，特别是普通话说得不好。你们要多多帮助他，让他向你们多学些知识。”我们当时已经知道毛岸英在苏联留学，毛主席的话把我们说得很不好意思。毛主席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别看他读的书不少，可打枪、种地就还得向你们学习。”随后，毛主席又把岸英领到我们连队的库房和饲养员住的房子里，详细介绍存放在库房里的各种肉类和蔬菜，还请旁边的同志作补充。毛主席说：

“这都是延安大生产的果实，别看这些东西不起眼，它可凝聚着一种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革命不靠别人，要靠自己。”岸英听着，沉思着，频频点头，很少说话。他是在品味父亲话中的深意，思考着今后的生活道路。

从此以后，岸英除了参加农民的劳动外，还经常到我们连队来和大家一起上课学习。他很虚心，很快和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他给我们介绍苏联的卫国战争，谈他在莫斯科日日夜夜战斗中的感想。他亲身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战斗，我们常常听得着了迷。毛主席在百忙中还抽时间来我们连询问大家对岸英的印象，他说：“可不能因为是我的孩子，就不说缺点。你们不告诉我他的不足，我怎样教育他呢？”

当时，我们都深深地被毛主席这种严格教子的言行所感动，跟岸英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杨志鹏 整理）

父 爱

王俊魁

毛岸英跟他爸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凤凰山居住期间，和警卫二班的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是1937年，毛岸英只十四、五岁，高高的个子，浓黑的头发，方方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明彻透亮，显得聪明而英俊。二班也都是些“娃娃兵”。可主席对他说：“这些小哥哥们都有‘酸辣苦甜’的经历，在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你要多接触和了解他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爸爸的话，岸英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一有闲空，他就去和战士们啦呱。

战士们也特别喜欢岸英。大家心里总想着他，有什么好吃或好玩的东西，也总想留给他。一天，他乐颠颠地跑来告诉大家：“我今天的功课做得又快又好，受到爸爸表扬啦。”接着，又俏皮地说：“唉！你们不知道，我得到爸爸一句表扬话，是多么不易呀！”说完，自己“噗哧”先笑了。

这时，一个战士见他外衣烂了一截贴边儿，拿出针线包，要替他繙繙。他说什么也不肯：“爸爸要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他接过针线包，穿针引线，又把针在头上篋了篋，便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爸爸还要求你什么啦？”一个战士把手藏在身后。

“可多啦！”他扳着手指头：“不准随便谈论党内机密；不准对警卫战士耍态度；要按时起居作息、做功课；要热爱劳动，不向别人索要什么东西……看，就是他手里拿的。”他说着，突然把舌头一伸，扮个鬼脸，指看那战士藏在身后的手。

大家会心地大笑起来，又暗暗赞叹他小小年纪就聪明伶俐。这个战士拿的是在山上站哨时拣的一只鸟蛋，专门留给岸英吃的。没想到他眼尖嘴快，来了个先发制人。

由于主席的严格要求和教导，毛岸英从战士们那里得到最多的是“精神食粮”。他在同战士们的接触中，看到了他们怎样学习、工作、站岗，

体察到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知道了他们都有过黄连一般的苦，他听他们讲的战斗故事，象陕北的山丹丹花儿一样多，延河水一样长。那给地主在深山放羊碰上大灰狼的惊险，那用扫帚疙瘩活捉敌人一个班的奇迹，给了他多少遐想和赞叹！那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那身上留下的条条鞭痕，又给了他多少眼泪和愤恨！……这天，毛岸英正听班长郭志明讲家乡斗地主、分田地的事。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眨着大眼睛，很认真地插话问：“岸英，你爸爸一定很爱你吧？”这冷不丁的问话，一下把大家惹笑了：“傻话，世上哪有父亲不爱儿子的。”郭班长边笑边伸过手去，在小战士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可是聪明的岸英心里明白；小战士的爹妈都牺牲在蒋介石屠刀下，从小就是孤儿……

一天吃过早饭，郭班长和几个战士刚下哨回到宿舍，毛岸英就来了。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却不见了往常那种活蹦乱跳的劲儿。难道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经再三询问，方知事情的根由。原来是主席为了培养他热爱劳动的习惯，亲自在院子里划了一块卫生区，要他每天负责打扫。今天早上，他起床晚了点，卫生区让战士们打扫了，便挨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并要他登门致歉。

大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都很感动，但又觉得主席在这件小事上严得过分了点。一个战士就说：“如果这样，你以后也别打扫厕所。”

“对，咱们各负其责。”大家有意逗趣。

“不行，不行！”毛岸英说出了实情：“这也是爸爸给我规定的任务。”

“啥?!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打扫厕所又是咋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在毛主席院子大门外约二十米处有个小厕所，由二班负责打扫。头天早晨值班员去打扫时，发现厕所干干净净的，开始二班并不在意。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大家心里就纳闷儿。一天早晨，郭班长专门到厕所里察看，发现又有人打扫过了，扫帚的印子还十分清晰哩。是谁打扫的呢？大家估摸着，一时猜不出来。

这天晚上，一场大雪使延安城披上了银装。天还没亮，二班的战士

们就早早起床，先集中力量打扫院子里的积雪，然后去大门外。

“班长，你看。”走在前边的一个战士突然转过身来，对郭志明说：“谁把厕所周围的雪打扫完了。”

郭班长仔细看去，厕所附近的积雪已扫成堆。蓦地，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只听厕所里有刷刷的扫地声，继而听到人说话：“你到炉灶里掏些灰，用筐子挑来，给厕所里撒一撒。”啊！是主席和他的儿子岸英。郭班长懊悔极了。他亲眼看到，昨天夜里主席窑洞里的灯又熄得很晚。他的嘴角颤抖着，上前劝主席回去再睡一会儿。

“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一阵大笑声，是那樣的爽朗。“走吧，小鬼们。”毛岸英挑炉灰去了，主席又和二班的战士们一起去扫其它地方的雪。

从这以后，虽然不常见主席去打扫厕所了，可毛岸英经常提前起床去打扫。战士们多次劝阻，也无济于事。多么伟大的父爱啊！

毛主席看我们操炮

子忠彦

1943年4月，陕北的南泥湾春光明媚，气象万千。绿油油的庄稼长满山坡，清彻的河水环绕山间欢声歌唱。在党中央、毛主席“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的号召下，我们当时所在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开进南泥湾已有两年了。在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一边生产，一边练兵，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我们的阴谋，而且丰衣足食，兵强马壮。

当时，我军炮兵力量还很弱，毛主席、党中央时刻关怀这支炮兵部队的建设成长。记得我们团刚刚成立一周年时，毛主席给团里赠送了大锦旗，又写了指示信；周副主席从蒋管区买来炮队镜，专程派人送给我们团；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多次到我们团开会、讲话；叶剑英参谋长还给我们团赠送了宝贵的炮兵教材。每逢新春佳节，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还亲自带着慰问团和文艺演出队来团里慰问演出，热闹非凡。

更令人难忘的是，1943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还亲自来观看我们操炮。这天上午，我们三连正在山上搞生产，突然接到团部命令，让我们连带一门炮到团部，给视察南泥湾的延安参观团进行操炮表演。连里接到命令后，决定让我们排去。我带着一、二班战士火速下山，将一门“一三”式山炮带到团部所在地陶宝峪。给我们交待任务的是匡裕民副团长，他带着询问的口气对我说：“忠彦同志，延安参观团的首长要看你们的操炮。这一段春耕大忙，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突然叫你们来，没做准备，不知你们是否还能象去年冬季大练兵时那样，做到动作迅速而熟练？”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虽然这一段时间没有操炮。但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战斗锻炼和冬季训练的老炮手，问题不大。”听了我的回答，匡副团长高兴地说：“那好，今天表演的课目是：（一）驮卸炮；（二）放列（收用炮）；（三）直接瞄准。注意安全，不要慌张。”副团长下达

表演课目后，就回团部去了。不一会儿，团政委邱创成和匡副团长陪着参观团的首长走了出来，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我正猜想今天来的是哪位首长呢？待我定睛一看，我差一点喊出声来，原来是我们日夜想念的毛主席，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彭总。我和我的战友们心情格外激动，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我是第二次幸福地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总都身着灰军装，精神焕发地站在台阶上。大家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们操炮。我们都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认真操练，用几年来所学到的炮兵技术，向毛主席好好汇报一下！随即，匡副团长下达了操炮命令。我按操炮课目一一果断地指挥着。匡副团长手拿秒表，向毛主席和各位首长读报操炮时间。“驮炮，两分三十秒；卸炮，两分钟；放列，……秒。”毛主席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操炮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做完一个课目，每报一次时间，毛主席都微笑地点点头。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们的操炮是满意的。操炮完毕后，我由于紧张的缘故，竟忘了向毛主席报告。匡副团长向毛主席报告说：“操炮完毕，请毛主席指示。”毛主席和彭总等首长来到山炮前，微笑着看一个个年轻力壮的战士，关切地询问我们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了，念过书没有，什么时候当兵的，打过仗没有，这两年生产苦不苦等问题。当他知道战士们大都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参军的，又打过仗，十分高兴。毛主席对大家说：“看来你们都是老同志了，有觉悟，有作战经验。现在一面生产，一面练兵，生产上占的时间长，训练只有冬季几个月。你们要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运用官兵互教的练兵方法，提高杀敌本领，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打击敌人。”毛主席讲完话后，彭总接着说：“你们驮炮用了两分三十秒，卸炮用了两分钟，都比规定的时间快。但我们炮兵采用的是直接瞄准，抵近射击，仅距敌人几百米才开炮。所以你们的动作还得再快些，这样在战场上可以减少伤亡。你们要向赵章成同志（他是我军有名的神炮手，后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学习，他的炮兵技术很好，炮打得很准，现在又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他在没有平射炮的情况下，研究了用八二迫击炮平射打敌人碉堡，又以简便射击（即不用炮架），用手扶着炮筒打百十米内的死角。你们

要把这一套本领学到手，使每一门炮都能打得很准。”

毛主席和彭总讲完话，与大家握手告别了。但他们的谆谆教导，象春风化雨，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指引着我军炮兵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而不胜。

(于建文整理)

毛主席为关向应同志送葬

李生有

关向应同志是我党我军很有名望的老同志。抗战开始后，他和贺龙同志率领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赴前线，打击日寇，屡建战功。他患肺病后，中央一再催促，才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中央医院。在此期间，毛主席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他，嘱咐他安心养病。中央医院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是，由于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不幸于1946年7月21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大家都很悲痛。安葬那天，上级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要来参加追悼会。我奉命带着总政治部的通讯班执行警卫任务。

追悼会会场设在大砭沟口的延河滩上。在一个高约一米的土台上，安放关向应同志的灵柩。灵柩上放置着战士们采来的常青松柏和野花，灵柩两侧悬挂着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中央机关送的挽联和挽幛，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上午十时许，关向应同志追悼会隆重举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关向应同志的亲属戴着黑纱，肃立在关向应同志的灵柩前，中央机关的同志都赶来参加追悼会。毛主席在追悼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关向应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向关向应同志学习，化悲痛为力量，为争取全国胜利而奋斗。毛主席讲话时声调悲痛，言切意哀，充分表达了他对关向应同志真挚的感情和沉痛的哀悼。

追悼会结束后，关向应同志的灵柩用汽车送往大砭沟里的山坡上安葬。这时，大家都劝毛主席回去休息，可是他却坚持要为关向应同志送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战士们一起将灵柩抬上汽车，汽车车厢上插满了碧绿的松柏枝条，车头两侧各缚着两条白色挽幛，向前缓缓开去。毛主席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双手挽着车头右侧的挽幛，步履沉重地随车前行，车后是中央机关的同志，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关向应同志送葬。

关向应同志的墓地选择在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后的半山坡上。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墓穴按照陕北的式样已经挖好。

汽车行至墓地的山坡下边，没有路了。大家就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来，由十几个年轻战士往山上抬去。毛主席快步走上前去，要抬灵柩。战士们觉得山路难行，说啥也不让。主席说：“向应同志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劳苦功高，今天是最后一别，我要抬一抬他。”大家拗不过主席，只好让他抬了一段路。后来有个大个儿战士换下了主席。主席还用手扶着灵柩，一直扶到山坡的墓地。

到墓地后，战士们轻轻地打开棺盖，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关向应同志的亲属，绕棺一周，与关向应同志的遗体告别。接着，战士们开始钉棺盖，嘭嘭的敲击声，一下又一下地无情地撞击着人们的心弦。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掏出手帕，默默地擦着泪水。送葬的同志都难过地抽泣着，墓地笼罩着一片悲痛而又庄严的气氛。

棺盖钉好，就开始安葬。周副主席指挥大家把灵柩放进墓穴，封好了墓口。毛主席沉痛地拿起铁锹，铲了一锹黄土，庄重地抛撒在墓坑中。接着送葬的同志人人铲土整墓，按照陕北的习俗，垒起了一个圆圆的坟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坟前默哀，深深地鞠了一躬，才和关向应同志的亲属乘上汽车，离开了坟地。

毛主席为关向应同志送葬这件事，传遍了中央机关和抗日前线的各个部队，大家每当谈起这件事，都激动不已，心里充满了对毛主席深深的敬意。

（陈绪生整理）

一瓶戒烟药

郭文贤

清晨，霞光万道。

昨晚，毛主席又写了一夜《实践论》，他揉了揉眼睛，走出窑洞，在院子里跑起步来。

这时，警卫班的同志们出操回来了，毛主席见到他们，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道：“你们今天谁上街去？”

班长郭志明说：“主席，我上街去，你需要买什么？”

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二元钱说：“给我买一瓶戒烟药。”

“主席，你要戒烟？警卫员们都知道毛主席很能抽烟，他在写文章或和别人谈话时，常常是一根接一根地抽。他们不明白毛主席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戒烟？”

毛主席见警卫员们疑惑不解的神情，乐呵呵地说：“不是戒烟，我这烟瘾恐怕戒不掉了，我要这药是戒鸦片的。”

“戒鸦片？”警卫员们更加惊讶了。从中央首长到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谁抽鸦片，毛主席买这药干什么呢？

“等小郭把药买回来了，我再告诉你们。”毛主席常爱和这些警卫员开玩笑，你越想知道，就越不告诉你。

郭志明从街上买回戒烟药，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毛主席正在和杜石匠谈话，没有马上进去。

这个杜石匠是本地人，五十开外，中等个子，腊黄色的脸膛，满脸乱蓬蓬的胡子，额上的皱纹象刀刻的一样，老是眯缝着眼睛，看上去象个六十多岁的人。他是前几天延安救国会的负责同志找来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打防空洞的。

郭志明听主席说：“老杜，昨天我到石洞里看你干活，见你在抽鸦片，你的烟瘾还不小呀？！”

老杜听了主席的话，两只手不停地在裤腿上搓来搓去，尴尬地不知

如何回答是好。

主席看看杜石匠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笑迷迷地说：“你的手艺并不坏，人也勤快，为什么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你想没想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杜石匠望着主席摇了摇头。

“你抽大烟有多长时间啦？”

“有二十来年啦。”

“能不能戒掉呢？”

“这……”老杜还在犹豫。

主席严肃地说：“老杜，鸦片是一种毒品，它可以使健康的人变得面黄肌瘦，丧失劳动力，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这可是一种恶习呀！你要把它坚决戒掉！”毛主席看了看老杜为难的脸色，继续说：“不要怕戒不掉，首先要有勇气，另外，我已让一个小鬼给你买戒烟药去了，吃了它，就可以帮助你把烟戒掉。”

郭志明听到这里，立即走了进去说：“毛主席我把戒烟药买来了。”

毛主席把戒烟药递到老杜手中，老杜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两行晶莹的泪珠不知不觉地从他那腊黄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他双手接过戒烟药，向主席保证：“我坚决把烟戒掉。”

从此以后，杜石匠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话，慢慢地把烟戒掉了，身体也逐渐地恢复了健康，红光满面，两只老是眯缝着的眼睛也睁开了。他高兴得逢人就说：“是毛主席教育了我，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

（周福昌整理）

情深似海

谭友林

(一)

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是在1936年的冬天。

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边区胜利会师以后，红二方面军总部的首长决定，派王尚荣同志和我带领一批干部分别到庆阳步校和保安中央红大去学习。临行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首长联名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右手在战斗中负伤后，长期不愈，经常化脓，要我一边住红大学习，一边治伤，并请周副主席关照一下。

周副主席早就以我党我军的总参谋长而闻名于世。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事无巨细，他总是亲自部署，亲手安排。不论什么纷繁复杂的事情，只要经过周副主席亲手料理，都会办得很妥贴、很利落、很周全。所以贺龙同志和总部首长把安排给我治伤的事也拜托给周副主席了！

陕北的隆冬，下雪并不多，但常刮西北风，天老是干冷干冷的。要去见周副主席，尽管天很冷，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们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所在地进发。从二方面军总部驻地环县的洪德城到保安，有三百多华里的路程。我们晓行夜宿，只用了三天多一点的时间，就赶到了目的地。我们到中央红大报到后，稍事安顿，就直奔周副主席住地。我在警卫人员的引导下，走进了窑洞，恭恭敬敬地向周副主席敬了一个礼，双手把总部首长写的信递给了他。周副主席身穿灰布棉衣，留着长长的胡须，面庞清瘦，两道浓眉，目光深沉，炯炯有神。他看完信后，向窑洞外面探寻了一眼，然后问我：“你们的谭友林政委在哪里？”

“报告周副主席，我就是谭友林。”我急忙答道。

“噢，原来就是你呀！有多大年纪？”

“二十一岁。”

“是个娃娃政委嘛！部队服你管吗？”

“还可以的，主要是靠党组织，靠集体。”

“好，说得好！”周副主席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包扎着纱布绷带的右手，一边询问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负伤的。尔后，他又敏捷地走到了电话机旁，亲自打电话，请当时在保安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来给我检查伤情。

马海德医生一进窑洞，周副主席连忙介绍说。“二方面军的谭友林同志右手受伤已经一年多了，经常化脓，在长征路上遭罪得很，请您帮助检查一下。”

马海德医生当即给我解开纱布绷带，仔细察看了一番，然后摇了摇头，和周副主席用外语谈论起我的伤情来。接着，周副主席对我说：“马海德医生讲了，为了保住你的右手，需要动手术。但这里条件不具备，因为伤口附近有动脉血管，没有X光机不能随便开刀。”

保安当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连一部普通的X光机也没有，可见当时条件是何等的艰苦。

周副主席接着说：

“这样吧，谭友林同志，你先到红大去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到苏联去动手术。”

正说着，警卫员进来报告周副主席，说开饭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吩咐道：

“马海德医生和谭友林同志也在这里吃，一共打三个人的饭来。”

我们和周副主席共进晚餐，吃的是小米饭，菜有土豆、萝卜丝。因为有马海德医生在，还临时加了一个炒鸡蛋。周副主席一边吃饭，一边向我询问贺老总、任政委和关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身体情况，询问二方面军到达陕北、陇东以后的一些情况。

我一一作了回答。

吃罢晚饭，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周副主席，回红大去。周副主席把我送出窑洞，并再三叮嘱我：

“要坚持天天换药，要经常清洗伤口。”

在回红大的路上，我边走边回忆着周副主席刚才的嘱咐，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1937年3月，贺老总从一二〇师驻地庄里镇来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之前，中央红大校址也由保安搬迁到延安，并改名为延安抗大。一天，我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留我在招待所吃中午饭。在饭堂里，我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见我来了，便端着饭碗来到我和贺老总这张饭桌边坐下来，问我的伤口近来有什么变化没有，还向贺老总介绍了马海德医生当时给我检查的情况。然后，又和贺老总商量着，是等到以后有机会到苏联去作手术，还是怎么好？贺老总说：

“到苏联去治当然好，但是目前我们一二〇师需要干部，到苏联去恐怕一年半载回不来。再则，时间拖长了，怕伤口更加恶化了。刚才，我问了一下西安办事处的叶季壮同志，他说可以到西安去治伤，但必须化装。”

“这倒是个好办法。谭友林同志年轻，可以化装成青年学生嘛！”周副主席脸上顿时露出了微笑。他刚从西安谈判回来不久，脸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显得更加精神威武。

不久，我在周副主席的亲自关照下，提前结业离开了抗大，化装成青年学生，到西安治伤去了。

(二)

1938年夏天，在汉口长春街的一座古老幽静的四层楼房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我又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他老远就认出了我，大声喊道：“谭友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的伤治好了没有？”

我一边答话，一边跟周副主席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把自己受中组部李富春同志派遣，回洪湖地区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以及返回武汉向省委汇报工作后，省委不让我回一二〇师，要我留在湖北工作的情况，一一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

周副主席说：“回一二〇师倒不必要啰，现在长江局就很需要干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先住在办事处等一等，我与长江局的同志研究一下。”

第二天，李克农同志和我谈话，说长江局决定派我以中校团副的名义，到田家堰国民党要塞司令部警卫营当营长，为保卫武汉作准备。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官是个德国留学生，与李克农同志有点私人关系。我带着李克农同志的亲笔信，乘船离开了武汉。到了田家堰后，这个司令官开始是称病不见，尔后是要我住在招待所久等，还不许和旁人接触。我只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警卫营的驻防和兵力情况。

一天，我借故返回武汉办事处汇报，没有找到李克农同志，恰好又碰见了周副主席。我向周副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顺便谈了一下我自己的看法：“警卫营就在这个要塞司令部的旁边，在短时间内靠个把人开展工作把握不大。”

周副主席当即指出：我的意见，现在最要紧的是到抗日救亡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的眼睛要盯着敌人的后方，只有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特长。吴芝圃同志率领青年学生和当地农民在豫东打游击，坚持了半年多了，他那里就很需要懂得军事的干部。”

不久，恰逢彭雪枫同志由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来长江局开会，他几次三番跑来给我介绍河南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的情况，讲豫皖苏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动员我和他一起到河南去打游击。

我对彭雪枫同志讲：“这要请示周副主席。他原先好象有个考虑，想派我到豫东吴芝圃同志那儿去。”

雪枫同志急忙答道：“这个没问题，由我去请示。我们先到竹沟去培训一批干部，然后就到豫东去打游击。我们很快就会与吴芝圃同志的游击队会合的。”

没过几天，周副主席正式和我谈话，说河南省很需要干部，准备派我去，并嘱咐我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和雪枫同志一起动身，先到确山竹沟去办教导队，培训骨干，尔后到豫皖苏边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斗争：不仅要和敌伪进行军事斗争，而且还要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把敌伪搞得坐卧不安，鸡犬不宁。

第四天，告别了周副主席和当时在武汉的叶剑英参谋长，我和雪枫同志一道乘火车由汉口去河南确山。

(三)

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恰好和邓颖超同志在一个支部。邓颖超同志待人热忱，态度和蔼，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周围的同志，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她邓大姐。

一天，邓大姐告诉周副主席，说我和姜汝芳（现名鲁方）同志很快就要结婚了，还说要把她在党校住的窑洞让给我们结婚用。周副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对邓大姐说：“他们结婚时我要去看看的，已经很久没见到谭友林和小姜了。”

小姜的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原是汉阳兵工厂的工程师，武汉失陷后奔波到重庆。他倾向抗日，同情我党。他和周副主席的秘书徐冰同志是老同学，又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周副主席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他父女便成了周副主席办公室的常客。周副主席每见到他父女俩，总要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讲延安代表中国的未来，讲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投奔延安。在周副主席的教育感召下，他父女俩几经周折，后来终于来到了延安。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商量着一定要给我们点什么礼物。可是他们翻包倒铺，最后只找到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周副主席在红布上面亲笔书就：

谭友林

新婚之喜

姜汝芳

同心同德 互敬互爱

周恩来

邓颖超

这件非常普通而又十分珍贵的礼物，在以后的南征北战之中，我们一直珍藏在身边。没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抄家抄走了。

在十年动乱期间，我被林彪、“四人帮”监禁达六年之久，不许和家中通信，不许亲人探视，不许回京治病。但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只要

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1972年，刚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疏散”到外地而返京不久的王震同志，听到我在“监狱”里身患重病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仗义执言，拿着我爱人鲁方同志的申诉信，拄着拐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我。王老几经周折，躲开“四人帮”的盯梢，又亲手把鲁方同志写的申诉信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秘书打电话，要允许我的亲属探视。

同年十二月，周总理又亲笔批示：

“同意谭友林同志回京治病，可以和家人团圆。”

当周总理把我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囹圄中解救出来以后，他老人家却已重病缠身。他一面住院治疗，一面抱病料理国事，日理万机。我离京来西北工作不久，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我们全家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样，处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青山处处飘忠魂，神州人人悼英灵。

爱民自有人民爱，革命岂无后来人。”

难忘的教诲

陈诗林

1935年6月，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横在我们面前的夹金山，山高路险，风雪弥漫，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当地藏民流传着一句话：“俗人难过夹金山”。可我们红军战士说：“能过金沙江、大渡河，就过得夹金山。”在翻越夹金山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操劳过度，突然患了感冒，发高烧，有时烧到近四十摄氏度。他面容憔悴，两眼凹进，呼吸急促，饮食日减，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了。那时，我刚刚十八岁，在中央军委当卫生员。我们看到周副主席迎着暴风雪，拉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地攀登夹金山，心里非常焦急，就给他绑了一副担架。他摇摇头说：“我能走，抬我干什么？”他披着满身雪花，仍吃力地拉着马尾巴向山上攀登。我拉住他的衣角说：“周副主席，你患感冒好几天了，不能再让你走路啦！”在我们的再三恳求下，他才勉强强地上上了担架。周副主席趟在担架上，仍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坚持批阅电报、查看地图，和其他首长一起研究进军路线。

翻过夹金山，我们刚到懋功，干部、战士不断来询问周副主席的病好了没有？我们医务人员整天守在周副主席身边，看到他烧不退，心里比谁都焦急，但手头没有药，有什么办法呢？有一天，医务处主任戴济民同志把我叫去，直截了当地说：“陈诗林，同志，组织上决定派你到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去取药，能完成任务吗？”我们医务人员都知道，前天派了四、五个同志到红四军去取药，因沿途遭到敌人伏击，至今一个人也没有回来，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我领会了戴主任的意思，立刻坚定地说：“只要能给周副主席治好病，我豁着命也得把药取回来。”戴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戴主任立即给我开了药方，给我要了一匹好马，并派了三个骑兵护送我。他一再说：“路上要小心，如发生情况，要机智、勇敢，千方百计把药取回来。”我坚定地

点了点头，随即带上三个骑兵，纵马奔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一个多小时就到达红军军部。司药主任张万全同志，听说我来给周副主席取药，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关心地询问周副主席患病几天了，好些了没有？我回答说：“好一些，就是高烧还退不下来。”他迅速拿药方去配药。在他拿药的时候，我发现药房里的药不少，就向他多要了两三种药。我拿上药，顿时心里象开了花似的，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和三个骑兵战士往回奔跑。我骑在马上，边跑边想：路上可不要再发生！情况啊！我们乘着四匹马在草原上奔驰着。突然间，“砰！砰！砰！”一阵枪声，从草丛里飞出一排子弹。我心里咯噔下：糟啦！我们立即在马上开枪还击，边打边冲。我向前倾着身子，伏在马背上，左手紧紧地按着挎包里的药策马拼命地向前。敌人射来的子弹“嗖嗖”的在我们耳旁呼啸，跑在前面的那个战士中弹栽下马来。我紧拉马的缰绳，俯身去抢救他时，他大声喊道：“你快走！”随即他掉转身子向敌人开枪射击。我为了保住药品，一狠心，继续策马向前奔驰。跑着跑着，我的马尥蹶子，差一点把我摔下马。我双手紧紧地抓住马鬃，迅速冲进一片树林，巧妙地甩开了敌人。我纵马奔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住药，周副主席还等着用药哩！跑回驻地时，我发现两条裤腿上尽是血，以为自己负伤啦，拉开裤腿一看，没有见伤口。抬头一看，马的屁股被敌人的子弹打中，鲜血直流。这时，后面的同志也脱险回来了，那位负伤的战士伏在马背上，向我打着手势，让我快把药给周副主席送去。我含着泪，提上药包，快步向戴主任的诊疗室走去。我见到戴主任，赶忙把药递给他，并汇报了路上的战斗情况。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这么快就把药取来啦！”戴主任迅速地配好了药，并告诉我药的吃法。我拿上药，轻轻地走进周副主席的休息室，慢慢地走到他的床前，小声说：“周副主席，请您吃药。”他看到我手上捧着药，亲切地问道：“小鬼，从那里搞到的药呀？”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说：“是刚从红四军取来的。”周副主席微微点了点头说：“谢谢红四军和同志们喽。”这时，我感到心里甜滋滋的，继续说道：“我看到红四军的药挺多的，就顺便向他们多要了两三样药。”周副主席坐在床上，出神地望着桌上的药，严肃地说：

“小鬼，拿红四军的药太多啦！”他用左手按着胸部，温和地说：“咱们红军战士办事，不能只想到总部，要想到整个红军，想到红四方面军的困难啊！我感冒过几天就好了，那能用那么多药哟！”我端端地站在周副主席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这时，周副主席又亲切地说：“小鬼，要注意搞好同兄弟部队的团结，自己应多承担些困难啊！”在长征中，无论战斗如何频繁，生活条件多么艰难，周副主席对总部工作人员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我听了周副主席的话，不断地点头。

周副主席吃了药后，高烧略退，就挺着身子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开会，研究继续进军、作战等问题。八月间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翻越了几座大雪山，到达松潘草地附近的毛儿盖。当时，正值青黄不接，部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在辽阔的草原上，青稞随风飘荡，穗儿刚灌满浆，约有七八成熟了。为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总部向藏民买了一亩多地的青稞。这时，我们都饿得不行，就跑到青稞地里，有的拔青稞，有的拾柴禾，就地烤青稞吃。傍晚，在茫茫的草原上，我们围着篝火，有说有笑地吃起青稞来。这时，周副主席也慢步走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争着给周副主席烤青稞。当警卫员小武把一把青稞捧到周副主席面前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你们有一双手，我也有一双手，你们学会了烤青稞，让我在大草原上也学学烤青稞嘛。”说着，就大步走到篝火旁，坐在我们这些小鬼中间，拿起一把青稞就烤起来。飘动的篝火映红了草原，跳动的火苗映红了红军战士的笑脸。周副主席边吃青稞边风趣地说：“草原上吃烤青稞，别有风味。红军个个都是铁打的汉，翻雪山，过草地，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咱。”我们吃着青稞，嘴唇上、脸蛋上都弄得黑黑的。周副主席一看，就哈哈的笑开了，指着我们几个小鬼说：“唉哟，你们都成铁人啰！”他的话刚落音，人群中就响起了一阵笑声。有一个同志听了周副主席的话，随即编了一段顺口溜唱道：“蓝天当被地当床，火烤青稞喷喷香，野火燎原通天亮，北上抗日志如钢。”周副主席听了连连点头，摇动着手上的青稞说：“好，好哇！”记得，有一天吃苦苦菜，周副主席拿着碗筷也来了。他盛了一大碗苦苦菜，蹲在人群中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们看到周副主席和大家一块儿吃苦苦菜，顿时心里

感到热乎乎的。周副主席边吃边鼓励大家：“同志们，明天行军可能有大的战斗，大家吃饱肚子好打胜仗。”接着，他举起饭碗说：“今天，我们在长征中吃苦苦菜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了共产主义幸福的明天，同志们懂吗？”大家端着苦苦菜，聚精会神地望着周副主席，异口同声地答道：“懂啦！”接着，大家又和周副主席一起，乐呵呵地吃起苦苦菜来。

周副主席和大家一块儿吃青稞、吃苦苦菜的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同志知道后，感到周副主席的身体不好，那能和大家一样吃苦苦菜呢！就派人给周副主席送来了五、六斤牦牛肉。这时，警卫员、炊事员和我，高兴得不得了，大伙正商量给周副主席做一顿美味的清炖牛肉时，周副主席来到了伙房。他说：“警卫连有几个伤病员，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快把这几斤牛肉送给他们补补身体吧！”警卫员小武撅起小嘴吧，炊事员直摇头。我急忙说：“周副主席，你病刚好，身体又弱，也需要补养补养呀！”周副主席拍着胸脯说：“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没有法子，我们只好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把牛肉送到警卫连去。那儿位伤病员听说周副主席派人给他们送牛肉来了，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一个伤病员说。“周副主席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也不好，比我们更需要补充营养，快把牛肉给周副主席送回去吧！”正当伤病员恳求干部把牛肉给周副主席送回去时，周副主席来到了警卫连。全连战士看到周副主席来了，一个个满面笑容，心里格外高兴。周副主席爽朗地说：“今天来看看同志们，伤病员都好些了吧？”一个连队干部说：“他们好多了。大家叫我们把牛肉送回去，请周副主席吃呢！”周副主席说：“他们为革命负了伤，在长征中生了病，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让伤病员吃好些，这是应该的嘛！”这时，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员，从人群中走到周副主席面前说：“首长，大家都知道您身体不好，您更应该吃好些！”周副主席微笑着说：“你们年轻。多吃些有营养的东西，身体康复后，好干革命，好打胜仗哟！”全连战士和伤病员，望着身体消瘦的周副主席，感动得流下了热泪。那个拄拐杖的伤员，边擦眼泪边说：“周副主席时刻都想着我们红军战士，真比亲生父母还亲呀！”

打下了腊子口，红军向岷县进军。途中，我们看见路旁躺着一个红军战士。周副主席立即下马走到那个战士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问道：“你是那个部队的？”躺着的战士微微抬起头来，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说：“一师的。”周副主席又亲切地问道：“病了吗？”那个战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拉肚子，走不动了。”周副主席叫我给他吃了一些止泻药，并让警卫员将这个战士扶上马，对我们说：“不能把老倭丢下，让他骑着马走好了。”那个江西老倭骑上了枣红马，两眼一直望着周副主席，嘴里喃喃地说：“首长，您真好，我那能骑您的马哟！”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九年了。我每想起红军长征，周副主席他那高大的形象，和蔼可亲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风趣的话语，亲切的教诲，常常在我耳边回响……

护送周恩来同志去西安

何元吉

1939年的清明节刚过，我们延安第十八集团军兵站部接到上级命令：护送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去西安。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虽说我们多次护送过中央领导和国际友人，押送过军需物资，但护送周副主席却还是头一次。当时，大家非常高兴，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护送。

部里开会研究决定，由我带领七名同志，组成一个精悍的小分队，去完成这次护送任务。我当即召集同志们作了周密的安排，检查了行装和武器弹药，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

那天一早，我们随同周副主席乘一辆汽车，从延安出发了。

一路上，周副主席谈笑风生。一会儿，给我们讲前方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多少日本鬼子；一会儿，又给我们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还和我们拉家常，说笑话。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幽默风趣的谈吐，使我们最初见面时的拘束，一下子消失了。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聆听着周副主席的谈话，争着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车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汽车逐渐放慢了行驶速度，我望望车外，洛川国民党检查站马上就要到了。时间过得真快，已离开延安一百二十多公里路程了。

那时，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已实行所谓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延安通往西安的路上，就设了许多检查站，盘查过往的行人。

这时，周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谈话。我们以高度警惕的心情，紧握着随身携带的武器。突然，汽车“吱”地一声刹住了。只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呼啦一下子朝我们的汽车拥了过来。我们为防发生意外情况，把子弹推上了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外，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

周副主席神色自若地对我们小声说：“不要紧张，下去看看。”

我下车走上前去，拿出由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签发的护照，递给了

一个象是带班的人。他装模作样地翻弄了一阵后，又把汽车检查了一遍，然后盯着我盘问起来。“车上都是什么人？去西安干什么？”

“这没有必要告诉你。”

“哼！那好，我们要检查汽车和你们带的东西！”他带着挑，衅的口吻说。

“护照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凭什么检查？”

“少罗嗦！快让我们检查，不然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看那家伙的蛮横样子，是存心不想让我们通过。”

正当我要发火时，周副主席下车走了过来。同志们也都赶紧下车，走在他的前头。大家惟恐发生不测，都替周副主席的安全捏了一把汗，总想靠拢来把他遮挡住。而他侧身挤到我和国民党那个带班的跟前，先向我询问了情况，然后泰然自若地向那个带班的问道：“你们的检查站是为抗日服务的吗？”

“那当然是。”那家伙高扬着头回答。

“我们这次去西安是执行抗日任务的。按照惯例，抗日军政人员只要有上级护照，便可以不受检查，而你们为什么要检查我们呢？”

“你们和我们不一样，对你们共产党，就是要检查！”那家伙无理地说。

“岂有此理！”周副主席义正辞严地指出：“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八路军和其他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统统是抗日友军，是一家人嘛！你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会损害抗日友军的团结！”

“这……”

见对方语塞，周副主席又用缓和的语调说：“当然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自己互相搞摩擦了。我相信你们是不愿意做不利于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事情的。”

听了这番道理，检查站的一个陕西口音的士兵，上前扯了扯那个带班的袖子，小声耳语道：“算咧算咧，都是为抗日，再不要找麻搭了。”那个带班的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周副主席威严的神色，只好乖乖地给我们放行了。

等汽车过了洛川，我们的心才算放下来。还是周副主席的话语打破了车内的沉寂。他关切地问道：“刚才你们都受惊了吧？小何同志还是挺勇敢的嘛！”

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急忙解释道：“我们都在替你的安全担心哩！”

“是吗？我料想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真理在握，就能压倒一切敌人！”

大家为周副主席刚才对敌斗争的胆略和气魄所鼓舞，无不投以敬佩的目光。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继续说：“在前方，和敌人是真枪实弹的较量，而你们兵站部的同志，却要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不但要有胆量，还要注意策略，有智有谋，胆大心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你们说，对吗？”

大家都连连点头，个个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车轮在不停地飞转。周副主席的话语象那清澈的山泉一样，点点滴滴浸润着我们每个年轻人的心田，成为革命的原动力，启迪着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中勇往直前！

难忘的两夜三夜

王治国

1947年8月，国民党调集了以胡宗南集团为主的十一个师、二十五个旅，约二十多万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我西北部队，夺取延安。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了英明的战略决策，于8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战争的气氛笼罩着陕北高原。

当时，我是延安八路军总兵站部管理员，在撤离过程中，奉命负责转移总兵站部的重要文件和贵重物资，护送年老体弱、残疾有病的干部和家属子女转移至安全地区。当我安全顺利地将他们送到绥德县义合区的深沟村后，恰遇我们兵站部的运输处处长惠世荣同志，第二天，我们俩结伴而行，每人乘一匹快马，去寻找已经转移了的“总兵站部”。就在我们行进的路上，竟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而又使人终生难忘的事儿。

路 遇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惠处长一路快马加鞭，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赶到了子洲县的双湖峪镇。我俩商量：到镇子里探听一下消息，了解一下地形环境，给跑了一天的马喂点料，人凑合着弄点吃的就继续赶路。

到离镇子约有一百多米时，我们看到镇边的一块坡地上围着许多人在谈论什么，气氛十分活跃。我俩挺纳闷：在这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是什么人还在这里有说有笑？走近一看：噢，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军人，在和当地老乡谈天。自从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我们一直没见过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能碰到周副主席，真是又惊又喜。周副主席看到我们牵马走过来，就热情地向我们招呼道：“你们俩是那个单位的？”

“是总兵站部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回答说。

“到哪里去呀？”周副主席十分关切地问道。

“我们到前总部队去！”

周副主席又询问了一些情况，惠处长简明扼要地作了回答。虽然有些情况是周副主席已经知道的，但他仍然认真地倾听着。周围的同志，有的在听我们谈话，有的已悄悄走开忙别的事儿去了。我俩与周副主席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说：“那好，你们就不要走了，今晚就住在这里，咱们明天一起走！”一听这话，我高兴极了。

“和周副主席一起走！”我真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惠处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我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周副主席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在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和他一起走，不但是一种幸福，而且一定能受到不少教益。但周副主席为什么在情况危急的时候还要让我们和他一起走呢？这成了我俩一时解不开的谜。说话间，周副主席的警卫人员热情地把我俩带到他们住的院子里了。

自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为了防止敌人疯狂野蛮的“扫荡”，当地多数群众都已疏散了，留下的都是坚定，精悍的基本群众，所以，空闲窑洞很多。在这个大院里，住的全是部队的同志。老乡们忙着给我们的马喂草料，给我们的住处铺炕席。“别的不说，就凭这热情劲儿，我们也一定能睡个好觉。”我心里这样想。

在和其他同志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周副主席只带了一个秘书。一部电台和六、七个人组成的骑兵警卫班。其余的人，都是周副主席在途中收留来的部队上的干部。

“吃饭喽！”一位老乡吆喝了一声。我上前一看，嗨！这算什么饭？还不是一大锅米面搅在一起的“合合饭”。只见警卫员盛了满满一碗饭，送到了周副主席的窑洞里。周副主席和大家同甘共苦，毫无特殊之处，一股暖流触动了我的心房。虽然这顿饭不怎么好，但吃起来却感到格外香。

开 会

刚吃过饭，周副主席就派秘书把我们五六个收留的干部召集到他住

的窑洞里去开会。在小油灯下，大家围坐在周副主席身旁，他用亲切的目光看了看大家，问道：“来齐了没有？”

“来齐了，副主席。”秘书回答说。

周副主席说：“同志们！党中央撤出延安后，形势变化很快。我是到吴堡、佳县、黄河东西一带看了看战备情况后返回来的。在这里把大家留下，好不好哇！”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吱声。

周副主席见大家还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们一起走的意图，就继续问我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部队在哪里吗？敌人已经到了哪至知道吗？你们单独行动，遇到敌人怎么办？……”这时，大家三明白了八、九分，情绪顿时活跃起来。

“我知道大家心里很焦急，都想早点回部队去工作、去战斗！因为你们是革命队伍里的骨干，但为了防止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避免意外损失；为了战争的胜利，所以，我们要一起走。人多势众嘛！又有这么好的群众，我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同志们？”听到这里，一种无比温暖亲切的感情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副主席啊！副主席，您日理万机，和党中央一起，不仅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对敌斗争，而且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有多少大事需要你去操劳呀！可你，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生命安全。我看了看坐在座的同志们，大家的眼角都涌出了激动的泪花。我们心中的“谜”终于解开了。这使大家感到特别的兴奋和幸福。

周副主席看到同志们解除了忧虑，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当前的形势。他说：“胡宗南集中了十一个师、二十五个旅共约二十多万人。可我军呢？在陕甘宁边区只有两万多人。敌我兵力的比例是十比一，敌人的胃口很大，妄想一日吞掉我陕甘宁边区。可是，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说到这里，周副主席显得很兴奋。他随手解开两个衣扣，继续说：“我军在彭德怀司令的指挥下，集中兵力，避开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得很出色。8月13日，敌人向我解放区扑来，在延安南面的劳山一带就遭到我军的阻击，被杀伤五千余人。

19日，我军按中央的部署，主动撤出延安，敌人得意忘形，到处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军除以少数兵力诱敌主力至安塞方向，使敌造成错觉，大部分兵力则到延安的东北方向集结，待机歼敌。”我们这些单独执行任务的同志，自离开延安后，只听到有关我军只言片语的消息，因此，有一个同志急切地问：“打了没有？打得一定很漂亮吧！我早就知道，让胡宗南占领延安，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别乱插话，听副主席讲。”大家都想早点知道当前的形势，就制止那个同志说。

周副主席也不介意那个同志的插话。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3月25日进犯青化砭的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一个团的三千余人被我伏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就被全部歼灭了，并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首战就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极大地振奋了我边区全体军民。4月14日，也就是前两天，由于我军机动灵活，利用敌人给我造成的可乘之机，又在羊马河苦战六个多小时，全歼敌一三五旅的四千七百余人，同时，活捉了敌代旅长麦宗禹。敌人不仅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决战。反而到处碰壁，连吃败仗。现在的基本形势是：敌人士气沮丧，人心不振，而我军则越打越强，决心再歼敌人有生力量，最后获得全胜！同志们，敌主力又在向绥德进犯了，离我们这儿只有十几公里。”说到这里，大家的心情一下紧张起来，都不约而同地为他的安全担心。可周副主席却处之泰然，神态自若。他提高声调说：“现在我军准备打第三个大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说是不是？我们要让胡宗南知道，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好了，时间不早了，同志们休息吧！”

散会了，可大家都不愿意离去。周副主席的话，使我们的耳目一新，精神大振。可大家更为副主席的安全担心。为了让周副主席早点休息，我们还是离开了窑洞。

我们人虽躺在炕上，可心里很乱，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许多、许多，也想得很远、很远……。散会后，曾有几个老乡向我们打听。“那位首长是谁？”为了保密，我们都没有告诉他。一位中年老乡说：“我在延安见过一次，他好像就是周副主席。”想到这些，又增

加了我们为副主席安全操心的责任感。夜间，虽有警卫人员和群众放哨，但我总想着保卫副主席的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时刻警惕，决不能睡死。我暗暗地提醒着自己。

午夜，我特地起来去看看周副主席住处周围的情况。哎呀！只见周副主席住的窑洞里还亮着灯光，不时发出“嘀……嘀，哒……哒”的电键声，我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我这才明白周副主席给我们所讲的形势的来源。周副主席召集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目前敌我双方的势态，使每个干部都心中有数，了解敌情。可这些情况都是夜间通过电台得来的呀！周副主席对我们这些普通干部真是关怀备至。有这样的英明领导在我们身边，谁能不感到是极大的荣幸呢？我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又一次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行 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家都已起床了。惠处长推了我一把，我一骨碌爬起来，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周副主席已经从外面散步回来了。我赶紧收拾好行装，匆匆忙忙地吃了早饭，并拿了分给我的干粮。我们十几个人每人牵一匹战马，由向导带路，和周副主席一起沿着大路向周家岭、石湾方向走去。在行军路上，周副主席谈笑风生，一点也看不出紧张的迹象。他和每个向导都是边走边拉话，边走边了解周围的地形，认真调查社情。我离周副主席很近，他们交谈的内容我听得很清楚。周副主席先是十分亲切地询问向导家里的情况，又让他谈谈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老百姓有什么反映。一路上，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周副主席和老乡的交谈，有节奏的马蹄声伴随着我们行进。

“前面是什么村？离这儿几里路？村里有多少户，多少人？”周副主席提的这些问题，向导都详细准确地作了回答。周副主席没听清的地方，向导就提高嗓门重复一遍。警卫员想劝老乡说话声音小点，但周副主席摆摆手，毫不计较这些。

“翻山过去是什么村？离这儿有几里路？村里有多少户、多少人？”

有多少户地主、富农？有多少户贫苦农民？有没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家？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家？”一连串问题，与其说是行军，倒不如说是周副主席在开调查会。

第一天的中午，大家在一条河边的小树林里准备休息吃饭，周副主席指着自己的干粮招呼大家：“来，一块儿吃饭吧！”

“我们都带有干粮，副主席。”大家都拿出自己的干粮，和周副主席围坐一圈，啃一口干粮，喝一口凉开水，别有风味地吃了一顿“野餐”。在两天行军中，为了不打扰老乡，中午我们都是野外吃干粮。

休息后出发，警卫员向周副主席恳求道：“周副主席，请骑着马走吧！”

“向导都在步行，我们怎么能骑马？大家还是同甘共苦好！”周副主席边解释边迈开大步，很有精神地向前走去。

“看来，咱们都骑不成马了！”惠处长听副主席这么一说，就小声地对我这样说。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每人牵着一匹马，硬是步行了两天。周副主席从来就有个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按他自己的话讲：只有锻炼好身体，才能适应更紧张、更艰苦、更残酷的环境。但他又十分乐观，在革命困难的时候，总是看到光明，相信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一定会诞生。两天的徒步行军，副主席没有显出一点倦意。

后来，我们才知道，周副主席有马不骑是他胸有成竹，有意安排的。最主要的意图，一是宣传群众，让群众都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离开陕北，仍然指挥着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二是和敌人周旋，我们大摇大摆地行进，使敌人无法掌握我主力部队的活动规律和地点。这样的行军，别说两天，就是走十天、二十天，我们也毫无怨言。

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又召集我们几个干部到他住的窑洞里，十分关心地问大家：“累不累？同志们。”

“不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用热水烫烫脚，明天我们好继续赶路。”周副主席热情地和大家交谈着，对一天行军的劳累好象没事一样。周副主席也许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天晚上的会开得很短。最后他面带笑容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

消息：敌人已快到绥德城了。这样一来，又给我们创造了歼敌的机会了。”这就是指5月2日至4日攻克蟠龙的战役。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忘记了疲劳，回到住处还在议论着党中央指挥的英明正确。

在短短两天的行军途中，我们对周副主席豪放的革命气魄，严谨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高贵品德，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感受很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分 别

两天行军结束了。晚上，干部们又到周副主席住处开会，我们预感到这次开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周副主席在窑洞门口一个一个地和大家握手，同志们都向周副主席敬礼问候。干部们到齐了。周副主席象初次见面那样环视了一周，看看每个同志的神色，很轻松地说：“咱们已到了安全地带了，一路上，有马不骑，大家有意见了吧！”大家互相看了看，一个四川同志笑着风趣地说：“有啥子意见嘛！这样的锻炼机会，别个想要都要不到，和副主席一起走，再走几天也要得。”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周副主席说：“还想走哇？为了工作，咱们要分路了。你们几个同志（指联防司令部、后勤部，一野后勤部、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五、六个同志）明天起由惠处长负责向南带回前总，我们明天走西川。”

要和周副主席分别了。听到这个话，我们心里就象倒了个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但为了工作，我们只好分路。当时，我们估计，周副主席可能是找毛主席商讨歼敌大事去了。我们怎能拖累他呢？他有千斤重担在肩上呀！想到这儿，我们就再没有说什么，只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和敬爱的周副主席分路了。

虽然我们分路了，但是，两天三夜的共同生活，却一幕一幕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周副主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到今天，都使人难以忘怀。

给周副主席当警卫

马洪山

人生的经历，有的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被遗忘，而有些情景却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当年给周恩来同志当警卫的一段经历，我至今仍留在脑海里。

1947年8月延安保卫战之后，我带了一个营在延长、延川，清涧一带侧击敌人，随后，转回到延安以南打游击，破击敌人运输线。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我便去找主力部队，路上遇到去黄河东送伤员返回的教导旅的一个排，他们也是在找主力部队。我们就一同行军来到了子洲县。

这时我很着急，部队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简直象离开了娘的孩子一样。我焦急地在镇子上转，不知怎么办才好。突然发现靠山脚下架着天线，我高兴极了。吃过晚饭就一个人快步向有天线的地方走去。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是周副主席在这里。我喜出望外，急忙找到警卫的同志说明情况。此时此刻，我多么想立刻见到周副主席啊！

当警卫同志带我来到周副主席房子里时，副主席正在吃饭。我想退出来等首长吃完饭再来，可是周副主席却亲切地说：“你不要走，来来，吃饭，是饺子。”我赶快说：“吃过了。”副主席接着说：“吃过了也尝尝嘛，非尝不可！”

我和周副主席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心里有些激动。我知道，不吃饺子首长是不高兴的，就尝了一个。是素饺子，没味道，就说：“没有肉，不好吃。”“好吃，好吃。”周副主席笑着连声说。我悄悄地问警卫员：“为什么不给周主席买点肉吃呢？”那位同志说：“眼下人们都在准备打仗，买不到肉，再说周副主席也不让买。”周副主席很快吃完了饭，问我：“你们有多少人？”我说：“身边只有一个排。”周副主席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需要人，你们就跟我一起走吧！”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兴奋地给周副主席敬了个礼，就离开了他的房子。

不一会儿，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告诉我，要我们一路警卫首长。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实在太高兴了，赶快回到驻地，把消息告诉给教导旅那个排的同志。一听说要和周副主席一同行军，警卫首长，战士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位战士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中央首长在这里，要我们警卫。今天晚上上哨我一个人包啦！”听他这样讲，大家都嚷起来了，争着要上第一班哨。有的建议上双哨，每个人都要轮一遍。

多好的战士啊！我的心随着大家热烈的情绪沸腾起来，在这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岁月里，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情意！

会后，我就带着排长和三位班长去看哨位，当晚就放了双哨。

安排好警卫回来已经很晚了，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那繁星闪烁的夜空，回想着白天周副主席会见我的情景：他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谈话，俭朴的生活，就象一股股热流在我心里久久回荡着……。睡不着，我就又起来穿上衣服来到哨位。哨兵说：“副主任（我当时是直属团政治处副主任），你来干什么？”我说：“睡不着，来看看你们。我也要和你们一起站一班哨。”就这样，我和战士们一块站哨，守卫着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

第二天，我们就和周副主席一起出发了。高原的路不太好走，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可是周副主席放着马不骑，却和我们一起走路，一走就是十几里。我多次劝他骑上马走，他却说：“走一走好。”说实在的，我走累了，很想骑马，可是看看周副主席那矫健的身姿，坚定的步伐，心里就感到有一股热劲，好像有人在拉着我前进一样。

行军的第二天，我们住在周家岭一个镇子上。周副主席一到镇上还没有住下，就到区政府找地方干部谈工作，问情况，特别是检查战备情况。当地方同志谈到敌人不会到这些地方来时，周副主席说：“你们这个地方敌人可能来不了，但是支前工作多得很，例如送军粮、做军鞋、出担架，这些你们要很快行动起来。”吃完晚饭又接着谈，一直谈到深夜。他谈得那样具体、那样详细，实在令人佩服。

我们走了好几天，最后来到真武洞。原来周副主席是代表中央来这

里参加西北野战军庆功大会的，也是一次西北野战军反击胡宗南部侵犯延安的动员大会。这个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因为白天敌机轰炸无法进行。大会上，彭德怀司令员首先讲话。接着，周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讲话的中心意思是：陕北的反击战一定能胜利。他说，我们部队虽然少，但有边区的人民支援我们，有民兵参战，有担架队支前。而敌人是瞎子，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已经在青化砭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我们还要大量地消灭敌人。现在，敌人没有粮食吃了，边区人民坚壁清野搞得很好，敌人所到之处什么都没有。最后，周副主席坚定地说：“从现在起，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吃掉敌人！”他还说：“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指挥我军和陕北人民抗击敌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周副主席的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西北野战军和边区人民没有辜负周副主席的期望，很快就打败了胡宗南部队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周总理视察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

范扬俊

1966年6月30日，晴空万里，旭日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干涸的河床用她那潜在的乳汁，哺育着沙生植物，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几株胡杨树尤为挺拔秀丽，显露着沙中豪杰的气概。这片植物群在朝霞的照映下，象给金色的戈壁镶嵌上绿色的宝石，格外媚人。一辆辆汽车沿着一条水泥路面的公路，向着导弹发射场驶去，车上坐着参观导弹发射的陆军干部。当汽车驶进发射场时，远远望见在浩瀚戈壁中一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坐在车内的人们议论开了：“这是沙漠中的幻影吧？”“沙漠中还敢修这样高的楼房呀！”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并不是幻影，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高大的导弹发射架。银灰色的国产多级运载火箭，像一柄利剑，直刺蓝天。人们依次坐在参观台上，观赏着这庞然大物，等待着发射时间的到来。在参观的人员中，有初到此地进行国防施工的陆军干部，他们为能亲眼看到导弹发射这种壮观场面而激动，他们也为我军向现代化建设迈进而自豪。突然，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移向参观台的入口处，有人喊出声来：“那不是周总理吗？”“就是周总理！”参观的人们立即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欢迎，周总理在杨成武等首长陪同下，健步向首长席走来，不断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

导弹点火了。随着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浓烟滚滚，火球团团，巨大的导弹腾空而起，扶摇直上，向着预定轨道飞去。碧空拉起一束长长的烟云，恰似嫦娥挥舞的长袖。导弹渐渐由大变小，最后只见一个小白点消逝在无际的碧空。当肉眼再也看不到导弹飞行时，周总理还兴致勃勃地拿着望远镜，在天空中搜索着。不一会儿无线电传来了导弹命中目标的消息，导弹发射成功了！周总理高兴地站了起来和大家一起鼓掌表示祝贺，鼓励大家努力争取新的胜利。为了发展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十多年来，周总理辛勤操劳，亲自主持召开了近百次专门会议。从国防尖端技术事业的规划，直到每次试验的组织实施，总理都是亲自抓，亲自

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敬爱的周总理不顾出国访问后的旅途劳累，风尘仆仆，亲自来基地视察，亲眼看到了国防科技的鲜花结出了丰硕成果，他老人家怎能不高兴呢？

第二天，周总理在驻地亲切接见干部，合影留念。当摄影师对好焦距，提醒大家注意，准备掀动快门开拍，这时有一位摄影工作者仍在镜头前蹿来蹿去，只顾自己抢拍照片。周总理见到这种情况，有些生气了，批评道：“你这个同志不象话，缺乏群众观点。我们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那样，只顾自己抢镜头，不顾别人。我们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新闻作风。”接着，总理问身旁的乔冠华同志：“老杜来了没有？”乔冠华回答说：“没有。”周总理让人去叫。只见跟随总理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同志，提着相机边跑边扣纽扣，来到合影场地。总理半批评半开玩笑地说：“懒鬼，才起床吗？”，杜说：“昨晚在暗房里搞得时间太长了。”总理“啊”了一声，微笑着点了点头。总理让杜修贤同志给大家拍了几张照后，在场的同志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在周总理视察基地时，接待的同志为了表达全体同志的心意，总想让总理吃得好一点，休息得好一些，做了比较丰盛的饭菜。总理见了却不高兴，把负责接待的同志找去，吩咐道：“以后每餐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多余的我一概不吃。”当即让把多余的菜都撤了下去。他还亲自开菜单，限制鱼虾和海味食品。他和颜悦色地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们的困难刚刚过去，国家经济状况才略有好转，我们一定要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千万不能浪费。”吃饭的时候，周总理端了一杯酒和一盘苹果片来到伙房，向全体炊事班的同志祝酒，不会喝酒的就吃一片苹果。总理说：“让我们共同为实现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

晚上，周总理还观看了烽火文工团的演出，与干部战士同娱乐。总理亲自打拍子，指挥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响彻整个夜空。

7月1日，周总理不顾旅途疲劳，不顾气象条件恶劣，要乘直升飞机到基地最远的场站和施工现场视察。清晨，从总理下榻的基地生活区到飞机场的道路两旁，排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中间有干部、战士，也有职工、家属和儿童。个个怀着无限热爱和崇敬的心情，殷切地期望见到总理。基地领导请总理坐敞篷汽车和大家见面。总理却说：“这不是在国外，我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了，和自己的同志见面，看望奋战在国防科研第一线的干部、战士，我怎么能坐车呢？”他坚持要步行和大家见面。后来杨成武同志等一再说明，去机场的路程很远，欢迎的队伍排列得很长，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尚未休息就来基地视察，为减轻总理劳累，还是坐车为好。经过一番“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乘敞篷汽车，以时速五公里行驶，尽量满足群众的心愿。

上午9点，幸福的时刻到了。总理乘坐的敞篷汽车徐徐向我们开来。我翘首仰望，拼命鼓掌欢呼，近了，又近了。我们日夜想念的周总理现在居然近在咫尺。他是那样地和蔼可亲，他向我们频频招手，问候大家：“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欢迎的人群高声回答道。“总理好！”“为人民服务！”我看得是那样认真，那样仔细。我要在这短暂的一瞬间，把总理的音容笑貌牢固地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啊！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您头上的根根白发、是您为全国人民辛勤操劳的写照。您脸上的老年斑痕，是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忘我工作的见证。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在工厂、农村、在建筑工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总理的足迹。祖国每一条大河的治理，每一条重要铁路的修建，每一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原子弹、导弹的实验成功，无不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总理乘坐的车子在欢呼的浪潮声中前进，在人流的长河中行驶。我们目送着总理缓缓而去。

总理的直升飞机起飞不久，天气突然发生变化，漫天尘沙飞舞，我们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当总理飞临边远场站和施工现场时。他不顾恶劣的气候条件，提出要飞机降落，去看望为国防施工和国防科研辛勤劳动的干部战士。后经陪同的其他首长劝说，才未着陆。周总理用无线电通

话，向干部、战士表示慰问。干部、战士在科研场地和施工现场，挥舞着彩旗和帽子，向着总理乘坐的直升飞机欢呼、雀跃，祝总理身体健康，请总理向毛主席问好！

深夜里的灯光

晓 军

盛夏的一个晚上，天上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远处，隐约可见几个缓缓移动的黑影正在接近平原上的一个村庄。这时，忽听有人轻轻地说：“哎，总算到宿营地了。”接着，他们很快走进了村庄。进村后，他们先是转了两圈，随后才找了几间位置适中的民房敲起门来。当时，乡亲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整个村庄在沉寂中。这一阵敲门声不算急促，但还是惊动了四邻。“是什么人来了？”他们哪里知道，来的这几个人正是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带领的一个工作组，专程来新四军所属部队检查指导工作的。因为白天已经赶了一天路，所以，才准备在这个小村子里歇一晚上，天亮后再走。他们叫醒了老乡，向他们说明了身分。乡亲们一听说是党中央派来的，大家又惊又喜，纷纷爬起来让出自己的正房，接着又是烧水，又是做饭。

吃过饭，少奇同志的秘书刘彬同志却忙开了，又是找煤油，又是搬桌子、摆凳子，等一切收拾好以后，他才伸了个懒腰到隔壁的房子里睡觉去了。原来，他是为少奇同志准备的。因为，在他和少奇同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每到一地，不管时间再晚，也要想方设法先把“办公”的地方安顿好。他走了以后，少奇同志从皮包里取出了一叠文电和几本书摊放在桌子上，在微弱的油灯下，开始办起公来。

说来也巧，张爱萍同志率领的部队当天夜里也开到了村子附近，为了能及时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他没顾得上休息就赶到了少奇同志住的村子。一进村，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咳！来的不是时候，少奇同志一定休息了。”他边想边放慢了脚步，心里嘀咕不该这么晚了还来打搅首长。最后，他竟站在那里犹豫起来。想来想去感到还是要去见一下少奇同志，因为有很多重要的情况要向他汇报。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向少奇同志的住处走去。问过哨兵后，他让警卫员又把刘彬

同志叫起来，他们一块来到了少奇同志的房前，这时，只见一缕暗淡的灯光从窗棂里透了出来，果真，少奇同志还在工作。张爱萍同志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少奇同志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支像是已经灭掉很久的香烟，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文件。他见张爱萍同志进来，才赶紧放下手上的文件，招呼他坐下，并对他说：“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爱萍同志笑了笑说：“你不是也没休息吗？”两个人都会心地笑了。接着，他们就热烈的谈起了工作。谈完话出来后，张爱萍把刘彬同志悄悄叫到一边，带着一种责怪的口吻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督促少奇同志早点休息，累坏了身体怎么办？”刘彬同志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咳，你可不知道，我也有难处啊！少奇同志在夜里工作和学习，已是他的习惯了。我跟他这么多年，他几乎天天如此，要改变他的这个习惯可比登天还要难啊！”

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才浪费了

晓 军

193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少奇同志带着几个人到新四军某部队去检查工作。当他们路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时，和“洛办”的领导同志谈到人才问题时，“洛办”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有一位比较老的同志叫刘泽如，这个同志很爱读书，特别是对教育心理学很有研究，还写了不少东西。”听了这番话后，少奇同志非常高兴地说：“没有想到我们党内还有如此偏爱教育心理学的同志，真是天大的好事！这可是个新发现啊！”随后，少奇同志提出要见见这位同志。

当他和刘泽如同志见面后，什么都没顾上问，一开始就热烈的谈起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来。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说得十分投机。刘泽如从教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谈到我们应该怎样来抓好教育。对他的每一句话，少奇同志都听得非常认真，而且还不时地往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上几句。后来，刘泽如同志又把自己亲手写的一本教育心理学著作的手稿送给少奇同志过目。少奇同志看后，感到刘泽如同志对教育心理学颇有研究，有不少独特的见解。第二天，他又把“洛办”的负责同志叫来，告诉他说：“我发现刘泽如同志是位很有才华的同志，请你们把他尽快送到延安去深造，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才浪费了，我们党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啊！”

刘泽如同志在延安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担任了讲授和研究教育学方面的工作。西安解放以后，党又派他到西安接管教育工作，创办了陕西师范大学。这所学校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祖国大西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建立政权就有钱了

晓 军

1939年9月，新四军六支队住在皖北的怀远县龙岗一带。由于当时没有建立政权，经济上非常困难，快到冬天了，三千人的棉军装还无着落。彭雪枫就把刘贯一找来，要他到“国统区”去募捐。刘贯一接受任务后到河南开封、郑州、洛阳，找老友，找世交。可是，却碰了钉子，刘贯一没有办法就到豫西澠池县的八路军兵站住了下来。这时恰巧碰上刘少奇同志从延安到竹沟、华东等地传达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指示，路过澠池。刘少奇亲切的接见了刘贯一同志，当刘贯一把彭雪枫派他出来的前因后果向他汇报后，刘少奇同志说，我们要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靠募捐是不行的。刘贯一听后有点愕然，不募捐那来的钱呀，部队吃穿不解决怎么抗日呀！刘少奇笑了笑说：“有办法，你回去给彭雪枫说，‘要抗战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光靠上级接济不行，靠统一战线募捐更不行。抗日部队要扩大，要夺取抗日的胜利，非建立政权不行。’”一席话说得刘贯一心里亮堂了。他向彭雪枫汇报后，彭雪枫高兴地说：“是呀，政权一建立，我们就有钱了。”没有多久新四军六支队就在永城县和亳南、宿南、怀远等地建立了政权。部队的衣食解决了，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

少奇拜师

晓 军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在徐海东、刘瑞龙同志的陪同下到豫皖苏边区去检查指导工作。在路途中，当他得知刘瑞龙同志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到过苏北、皖北的一些地方，他便对刘瑞龙同志说：“老刘啊，俗话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看来，此次远行，你要当我的老师了。”他还说：“你对苏北、皖北的情况最有发言权，请你多多赐教。”一席话，说得刘瑞龙同志很不好意思，他赶紧对少奇同志说：“谈不上当老师，可以当个向导。”一路上，少奇同志从沿途地区的社会阶级状况问到物产和交通，从民情、风俗问到群众基础。到了新的休息地点，他总喜欢找一些老年人聊天，有时把当地的民歌民谣记在笔记本上。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村子里住下，晚饭后，几个人坐在一个大草垛下闲谈，正当大家谈得十分投机的时候，忽然，少奇同志仰望夜空，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一样。大家觉得奇怪，问道：“你又看到什么东西了。”这时，少奇同志看了看大家，然后笑着用手指着天空中闪烁的群星说：“听说宇宙间有无穷的奥秘，你们谁能讲一些听听。”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少奇同志又说：“在天文学知识方面，我们都不如老刘，他是‘专家’，还是请老刘给我们讲吧。”刘瑞龙同志忙说：“我不行，还是请少奇同志讲。”少奇同志又说：“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还是你给我们当老师的好。”于是，刘瑞龙同志就象讲故事一样，开始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谈起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他从牛郎织女讲到银河系，从地球的构造讲到月球表面的形状。少奇同志又提问：“地球和其它星球的距离这么远，是如何测量的呢？”刘瑞龙同志说：“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家已经发明了计算这种距离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光年来计算。测量这种距离可不是普通尺子能测量的，许多恒星要以亿万光年来计算。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星还在发光，可是它本身可能早已消失了。”少奇同志又问：“这是为什么呢？”刘瑞龙同志说：“因为你现在看见的，可能还是它在若干

光年以前发出的光呢。”接着他又讲了一番光年的道理。直到把问题弄得水落石出，少奇同志才肯罢休，大家从心底里佩服少奇同志的甘当小学生精神。最后，少奇同志还对大家说：“看来我们仅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还是不够的，还要学点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今后我们建立了新政权，主要是从事经济建设，到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知识就更不行了。”

我们都是普通党员

晓 军

1941年，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非常重视过好党的组织生活。

那时战火纷飞，大家工作都很忙，很难凑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有时白天没有时间就放在晚上过。记得有一次，军部机关召开支部大会，党支部委员吴文桥同志去通知少奇同志和陈毅军长。当时他见少奇同志和陈毅军长正在研究工作，就再三告诉他们：如果首长工作忙，就不一定参加了。少奇同志听后，就语重心长地说：“文桥同志，那怎么能行呢？我们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不能有丝毫的特殊。我们工作忙，其他同志也很忙呀！”当天晚上少奇同志和陈毅军长都按时参加了支部大会。有一次，少奇同志亲自找来吴文桥同志，对他说：“我这个月的党费还没有交呢。”吴文桥同志接着说我已给你代交了，少奇同志一听，马上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党费是不能代交的。党员的党费要自己交，交党费的事虽小，但他反映了一个党员的党性、党的组织观念和对党的认识问题。”一席话，说得吴文桥同志脸上火辣辣的。他捏了捏少奇同志刚交来的党费，心里很不平静，他深深感到：“这那里是普普通通的几角钱啊，这分明是少奇同志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啊！”

一粒蚕豆喻哲理

晓 军

少奇同志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很善于从豆芥小事升华开去，要言妙道的说明一个道理，使你听后回味无穷，大受教益。

记得那是在1940年，刘少奇在中原局当书记的时候。一天，他到张爱萍率领的第四总队检查工作。中午，张爱萍和纵队其他首长留刘少奇同志吃饭，由于当时生活环境艰苦，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招待刘少奇同志。炊事员忙活了半天，才弄到几个鸡蛋和一些新鲜的蚕豆、小白菜等东西。

中午吃饭时，大伙都心里感到不安。刘少奇同志却边吃边谈笑风生的夹起了一粒蚕豆，诙谐的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个蚕豆虽然不大，但它身上的知识还不少呢？大家一听都觉得有些奇怪，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夹起的蚕豆。少奇同志见大家有些迷惑不解，便解释说：“是这样的，从这粒蚕豆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不少的哲学知识。你们想一想，蚕豆是个有生命的物质，它的成长要经历一个发芽、生长、结果的过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起作用。芽子否定了种子，果实否定了芽子，这种否定不是简单扬弃，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发展过程，通过否定之否定，一粒种子最后结出一大堆蚕豆，你们说这没有哲学道理吗？”一席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接着，他又就事喻理的讲了调查与研究、认识与实践等哲学观点。由于少奇同志把深奥的哲学道理喻于浅显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家听得竟入了迷。

全送至前方去

晓 军

1940年春天，淮北平原，洪泽湖畔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战斗在敌后方的我新四军第五支队，时常缺粮断炊，生活异常艰难。此时，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正在此时，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开始了扫荡，国民党王光夏部也乘机向我军进攻。使我军陷入十分的困难的境地。要想摆脱困难，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军趁敌人立足未稳，抢先占领了新行圩子，与顽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三个昼夜。当战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部队快要断炊了，只能靠喝点杂粮稀饭来充饥。

第五天晚上，张爱萍同志从前方指挥所回到了纵队司令部新行圩子，专门赶来向少奇同志汇报战斗情况。新行圩子分南北两个圩寨，南圩子是个大地主的宅院，有围墙，有水壕，少奇同志就住在这里。张爱萍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处，少奇同志正背着手在屋里踱着步子，见张爱萍进来，未等张爱萍讲话，就焦急地说：“快坐、快坐，情况怎样？”张爱萍便一一的汇报起来。讲了一会儿，张爱萍肚子里叽哩咕噜直叫。这时，他才意识到已经一天粒米未进，饿得真有点受不了了。转身对刘少奇的秘书刘彬同志说：“搞点东西吃好吗？”少奇听了这话，奇怪地问：“怎么，你还没吃饭？”“嗯……，一天都没吃了。”张爱萍回答说。“部队也一样吗？”少奇同志追问。“也是一样。”话一出口，张爱萍不由得后悔起来。原来，根据地当时粮食困难，部队生活水平也低，但考虑到少奇同志工作紧张，而且有严重的胃病，于是弄了些米面给他吃。一至没有让他知道缺粮的情况。这时，少奇同志站起来，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说：“是呀！我们倒吃着大米呢！”接着便对刘彬同志说：“快，快查查还有多少粮食？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张爱萍连忙向少奇同志说明：部队米面吃得少点，但象玉米面、绿豆、大麦糝子还有得吃的；这

会儿也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时间去搞。你们吃的这点粮食，拿到前方也没有什么用处的。少奇同志听后还是连连摇头：“不行，粮食虽少，但总比饿肚子好！”张爱萍看着少奇那坚定的神情，日益消瘦的脸颊，内心感到又失悔，又感动。

在前沿阵地上

李国凯

1946年，我从中央机关调到教导二旅三团三营当营长。旅长是罗元发，政委是李志民，参谋长是欧阳家祥。我部按照上级的命令，在富县至南泥湾、牛梧镇、金盆湾一线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国民党部队的猖狂进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到了5月中旬，国民党部队不断在关中、定边、庆阳一带向我挑衅，预谋大举进攻延安，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天上午，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通报敌情、研究抢修阵地和加强防御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团司令部一位参谋跑进来向团长王金龙报告：“朱总司令来我团视察阵地。”我们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又惊又喜，心情十分激动。会议停止，王团长、胡政委带领大家迎接总司令。我们刚走到院子里，总司令骑着一匹黑骡子已经来到院内，后边跟随着几位警卫和参谋人员。我看到总司令穿一身宽大的灰军装，上面落了不少尘土，心想：总司令为了战争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和路途遥远，风尘仆仆来到前沿阵地视察工作，实在太辛苦了。他虽然日夜兼程，鞍马劳累，但没有一丝倦意，仍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显得格外健壮。王团长、胡政委向总司令行了军礼，总司令频频点头，与他们握手。这时，我们围到了总司令的身边，胡政委向总司令一一作了介绍，总司令亲切地接见我们。当介绍到我时，总司令笑呵呵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不是军委警卫班小李吗？”我说：“我是李凯国。”他说：“你的名字改了。小鬼当营长了、有进步。”接着又问：“你是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团的？”我说：“我到这里两年多了。”总司令说：“干得不错嘛！你营的任务在东线防守，要修好工事，顽强地阻击敌人。”我坚决地回答：“请总司令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总司令接见我们之后，来到了会议室，问道：“你们团的情况怎么样？简单汇报一下，我准备到前沿看一看。”王团长、胡政委向总司令

汇报了敌情、敌我形势、我团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总司令听完后说：“你们把地图拿出来，让作战股长谈谈情况。”作战股长刘山元指着地图，又详细地作了补充汇报。总司令听得非常认真，还不时地作笔记。我们对总司令这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都很钦佩，深受教育。下午一点钟左右，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吃了简单的午饭。团领导想让总司令休息一下，总司令说：“不休息了，接着开会吧。”王团长说：“总司令今天走路多，太累了，出门就要爬山，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随总司令上山看地形。总司令虽然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但登山的本领比我们强，动作敏捷速度快，连我们这些不到三十岁的人都望尘莫及。我们登上富县的西山，山上构筑了许多工事。总司令首先察看了团指挥所。团指挥所是在交通沟的基础上，用门板，木料和树枝加固而成的，周围还修了几个小碉堡。总司令边看边指示说：“现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不比以前，敌人的武器变了，增加了重武器。按过去的作战情况看，这样的工事就不错了，但是，现在看就不行了。工事上面覆土太薄，胸墙厚度不够，墙垛也应该加固……”从团指挥所出来后，又来到了一营的阵地。一营的部队正在加固工事，战士们看到朱总司令后都跳跃欢呼：“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总司令微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看大家。”战士们听到总司令的热情问候，热泪盈眶，欢欣鼓舞，干劲倍增。总司令走到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了前方和左右阵地。当他看到二连的战士干得汗流浹背、满脸泥水时，关切地说：“战士们很辛苦，要想办法让他们休息好。”团领导和各营干部异口同声地说：“是，坚决按照总司令的指示办。”

下午，总司令回到团部，召开机关、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就当前的斗争形势、我军的战斗任务、以及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等方面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加强防御部署和准备，部队要加强战术训练和进行战斗演习，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讲完话后，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跃马扬鞭踏上了新的

征途。

(李敬申整理)

睛眼应向下看

宋志斌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八路军进行整编，有些战士复员了。当时解放区生活还比较困难，复员战士的一些实际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再加上个别干部工作不细，态度生硬，有一段时间，冀中地区的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比较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检查工作，当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中很是不安。

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来到县城歇息，不一会儿，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地直奔县政府，来到大门口的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

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

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

“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甩掉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

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

冀中司令员和政委心急火燎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急忙打电话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级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

“啊呀！那就是朱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耳机，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去。

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情不自禁地说：“这一下可不得了啦！”便抬起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

了，那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给您赔情。”

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为抗日救国作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才对啊。”

“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深怀内疚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

果然，从此之后，这位民政科长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程占功整理）

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

宋志斌

1947年夏季的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过河北任丘县，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太太，她正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走。总司令快步赶上前去。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位骑马的青年军人，总司令招了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问他是那个部队的，叫啥名字，是干部还是战士？青年军人回答说，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这位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她把麦子送回家去吧！”

这位营长不认识总司令。开始，他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话。当听到叫他替那位老太太送麦子时，他可憋不住了，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似地跑了。

朱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他便同警卫员、秘书一起，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驮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送她到家。老太太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示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

沧州解放后，在战斗总结时，朱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决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儿很快就在晋察冀军民中传开了。那位老太太知道了这件事，感动得直流泪。她惊喜而感慨地说：“噢，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

（程占功整理）

朱总抓食堂

李凯国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机关勤杂人员和一般干部同在一个大灶上就餐。由于人员多，标准低，管理不善，伙食搞得不大好。吃的菜是清水煮萝卜，主食是陈米黑豆蒸的小米干饭，同志们有些意见。后来，意见反映到朱总司令那里，他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决心抓一下机关的伙食。

一天中午，我因外出执行任务，理发员小张，张国涛的勤务员邢桂林也没有按时赶到食堂，菜锅里只剩下一点萝卜、千豆角汤。炊事员给我们每人打了多半勺菜汤和一碗小米干饭。邢桂林边吃边嘟嘟囔囔地说：“我们每人每天三钱盐、五钱油的伙食标准，连一点油水也吃不到……。”这时，总司令走进食堂，我们赶快站起身来，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想：这下总司令可要批评我们了。总司令看了看我们的菜碗，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和蔼可亲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好，还有什么意见可继续提。”邢桂林激动得流着眼泪说：“总司令让我们讲我就讲。自从过完年后，每天都吃清水煮萝卜，连一点油水也吃不到，我们有意见。”总司令又转向我们俩问有啥意见？我说：“伙食办得不太好，大家有些意见。”总司令听后点了点头。他接着又问：“你们有没有伙食管理委员会？”我们说：“伙食管理委员会是有的，就是伙食没人抓。”总司令又问：“灶上烧柴都是买的吗？”我们回答：“是的。”总司令说：“你们买柴烧太贵了。要自己上山砍柴烧，节省一些伙食费，用来改善伙食。这个办法行不行？”我们说：“这个办法好。”总司令又说：“机关食堂的伙食问题要专门开会研究，很好地解决。只要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伙食是可以搞好的。”总司令说完后走出了食堂，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总司令不但关心我们的学习、工作和进步，而且还深入食堂调查研究，召开会议研究办法，千方百计改善战士的生活，真是战士的贴心人。

过了两天，朱总司令让司令部张科长召集伙食管理委员会成员和炊

事班的同志开了会，总司令也参加了。会上，总司令与大家座谈研究，提出了自己打柴烧，自己生豆芽等改善伙食的好办法。第二天，总司令又召开了机关干部、战士会议，动员大家上山打柴，支持食堂搞好伙食。此后，我们经常上山砍柴，晒干后送到炊事班。炊事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些油和肉，自己生些豆芽，每周为大家改善两次伙食。在总司令的关怀、指导下，加上炊管人员和大家的努力，我们机关食堂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就餐人员都很满意。

（孝敬申 整理）

总司令种菜

汪秀田

延安时期，大家都知道朱总司令年年种着二亩菜地。那时候，敌人千方百计地封锁我们，根据地一切供应都很困难，党中央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朱总司令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他一到延安就和康大姐选了一块河滩地，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中，总要抽出一点时间拣石头、整菜地。大家看到总司令种菜，也都忙乎开了。我们管理科几个班的同志，一有空就跑进河滩挖菜地，总司令见我们挖地时，笑嘻嘻地说：“小鬼们，我们来个比赛，看谁种的菜今年收得多。”我们齐声说：“好，和总司令比赛了！这样一来，大家的干劲更大了，每天一休息大家都去干活，恨不得拔着苗让它快点长。

一天下午，我遛完马看见总司令在菜地里浇水，便跑去帮他挑水。他笑着说：“多种点菜能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还能改善伙食，重要的是通过生产锻炼，增强劳动观念，永远不脱离群众啊！”听了总司令的话，看到他整日操劳军队的大事，还抽空忙着种菜，我这才进一步懂得了种菜不仅是为改善生活，意义还更深远呢。从此，我只要看见总司令和康大姐在菜地里干活，就去帮忙。到了秋天，总司令和康大姐种的菜比我们的都好，长长的牛角萝卜，高高的大白菜，二亩菜地收了足有五千多斤。他让管理科把这些菜分给几个灶上，把最好的菜送到枣园给毛主席吃。大家吃着总司令和康大姐种的菜，感到格外香甜。

（傅国兴、赵景贤 整理）

“修建篮球场有我一份”

李凯国

1937年初，中央机关驻在延安北门口吴家大院。这里靠近郊区，十分荒凉。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遍地，没有一点生气。中央机关驻到这里后，想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活跃部队和机关的文化生活。为了解决活动场地，司令部和三局的同志们准备在附近的一块废墟上修建一个简易篮球场。一些年青人听说要修建篮球场，热情很高，都踊跃参加义务劳动。

一天上午，我们司令部和三局抽出六十多人，在参谋部张科长的组织带领下挥汗大干。有的抡起十字镐、镢头挖除石头砖块，有的挥舞铁锹平整地面，有的抬筐清除瓦砾。劳动的场地上“一二、一二”的号子声、愉快的歌声和锹镐、石块砖瓦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浹背的时候，朱总司令笑呵呵地来到了劳动现场。他脱下缀有许多补钉的灰色棉上衣，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抡起镢头干了起来。当年，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身体健壮，虎实实的，干起活来赛过小伙子。我们看总司令年纪大了，不想让他干这种力气活，就急忙上前劝阻：“总司令你不要干了，给我们当指导就行了，我们保证干好。”总司令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是个篮球爱好者，修建篮球场有我一份，开展篮球活动我也要参加，参加劳动当然是我应尽的义务啰。”说完，他又抡起了镢头，飕飕生风，地面上碎石四溅，尘土飞扬。我看到他脸上豆粒大的汗珠向下滚落，就赶忙送上一块毛巾。总司令接过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把大家喊到一起说：“我们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总要有个活动场地，一定要把篮球场修建好。要挖得深一些，把下边的砖瓦石块搞净，抬些黄土打平、打光、打实。场地不光，打完球后满身是土，很不卫生；地面不实，会影响弹跳力；场地不平，容易跌伤人。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有力气，会干活，要在张科长的带领下，把这项工作干好。”我们这些放羊娃、庄稼汉出身

的战士，在战争环境中极少开展篮球活动，听了总司令的话，感到很新鲜，很受鼓舞，都决心把球场修建好。接着，总司令领上张科长，用步子丈量了球场的长和宽，并对观众看台也作了精心设计。在总司令的鼓舞下，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得更欢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劳动，我们终于按照总司令的要求平整好了场地。没有篮球架，我们就因陋就简，在球场两头各栽上一根木头杆子，再横着钉上几块木板，然后安装上铁圈。就这样，我军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篮球场正式诞生了。

球场建成后，司令部、三局和警卫营各成立了一个篮球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友谊比赛。每场比赛，不管天气冷热，我们的总司令都作为司令部球队的一员参加比赛。机关还组织拉拉队为我们鼓劲加油，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常来观看，附近的老乡们也赶来助兴。总司令是我们司令部球队技术最好、得分较多的运动“健将”。在机关的三个篮球队中，三局队比较强，他们多半是学生兵，技术、战术比较全面。我们司令部球队都是些年轻娃娃，技术比较差，每次与三局队比赛，往往吃败仗。有一次篮球比赛，我们又输给了三局队，队员们互相埋怨，没精打彩。总司令看到后就教育鼓励我们：“篮球比赛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篮球运动主要是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提高技术，培养机智灵活作风，运用于战争，能多打胜仗。不要斤斤计较输赢，输了球不要相互指责，不要怕人家笑话。你们年龄小、聪明，身体素质好，只要勇于锻炼，舍得流汗，一定能够提高技术，战胜三局球队。”听了总司令的话，全体队员精神振奋，决心苦练技术，赶超三局篮球队。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练球，总司令来了。他接过球，作了个三步跨栏的动作。他虽已年过半百，但雄风不减当年，动作迅速优美，投篮准确。大家看了后都交口称赞，要求总司令教我们三步跨篮技术。他边做示范动作，边认真讲解要领：“跳起时身体端正，两脚并齐，在空中要挺住，双手把球端举起投篮。”只听“飕”的一下，球又进了篮内。我们按照总司令讲的要领，刻苦训练，不断提高，终于掌握了三步跨篮的技术。另外，总司令还经常教我们运球、传球、断球技术和进攻、防守战术。他还要求我们平时养成团结友爱、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勇猛顽

强的良好作风。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司令部球队技术、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节假日的篮球比赛中，能经常战胜三局和警卫营的篮球队，受到总司令的表扬。

（李敬申 整理）

朱总司令的黑骡子

汪秀田

1940年农历12月中旬，陕北的原野，冰天雪地，站在军委所在地王家坪举目眺望，高高的远山上白雪皑皑，太阳光一照，放射出道道银光。在这数九寒天里，当部队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朱总司令已经穿着单薄的旧军装踏着冰雪在营区周围的河滩小道上散步了。

一天早上，我赶着几匹大马在河边饮水。总司令走过来顺手拍了拍他的那匹大红马说：“小汪，你喂得好啊！瞧，大红马又添膘了。”我说：“把它喂壮了，您骑上走得快啊。”他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阵子说：“唉，我在山西寄养的那匹黑骡子多好啊！”我边给马饮水边说：“我去把它牵回来吧！我睡觉都想着它呢？”总司令想了一会后说：“我也这样想过，可就是远了点。”

说起这头黑骡子来，还真有点历史呢。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它就跟随朱老总转战在方圆五百多里的罗霄山上。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离开井冈山，长征北上，它又跟随朱总司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深得他的喜爱。1937年，抗战爆发后，它被寄养在山西临县老乡的家里。所以，尽管朱老总以后有了这匹大红马，可还是时时想起它。

过了几天，我们协理员来到饲养班说：“小汪，你工作很踏实，开会时要表扬你哩。”因我和排长为一条马缰绳的事还憋着一肚子气，就生气地说：“协理员，我不在饲养班子了，给我调班吧！”协理员笑了笑说：“和排长吵了几句就要调班，那还成！总司令的那黑骡子要你去牵，你去不去？”

一听要去牵那匹黑骡子，我高兴极了，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协理员，什么时候出发？我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天，天刚麻麻亮，我便上班长送我的一件破棉袄，迎着风雪，踏上了去山西临县的征途。一路上，我象“接力棒”一样被地下党的同

志一站一站地送过去，穿过了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十多天后到达了目的地。在临县一个小村子老乡家的槽头上，我看见总司令的黑骡子长得膘肥体壮，激动得我几乎流下泪来，顿时好象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一样，亲昵的抱住了它的头，久久不愿松开。记得在井冈山的年月里，朱老总和康大姐最爱这匹黑骡子，俩人总是轮着骑。在太行山根据地时，他俩边行军边在路旁揪些青草喂它呢。

我在临县过完春节，就踏上了归途。一上路这头黑骡子像个排头兵一样，总是走在前面。地下党的同志又是一村一村地接送我们，使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区，安全地返回了延安。同志们见总司令的黑骡子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我们刚回到家，朱总司令和康大姐就跑来看黑骡子了。总司令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汪，你辛苦了，这一下不想它了吧！”我高兴地说：“总司令这头黑骡子，它可是我们的无言战友啊！”

（傅国兴 赵景贤 整理）

在叶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路宝银

一

1944年春天，我们部队利用战隙在太行山区整训。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文化课的时候，指导员走了进来，他和文化教员说了几句话，就对我们高声讲到：“同志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上级决定抽调一部分同志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去，到毛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去！”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又惊又喜。我心里想，该不是指导员和我们开玩笑吧。

稍停了一会儿，指导员又严肃而简短地讲了抗战形势和上级决定一部分同志去延安的道理，接着就宣读名单。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还有点不相信真的是叫我，心里咚咚直跳，确实是太激动了。这天晚上，我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既为要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去而无比兴奋，又为要和多年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分别而难舍难分，直到鸡叫，才迷糊了一会。

两天之后，我们告别战友出发了。到延安后，大约休息了一周左右，一天下午，卫士长李树槐同志告诉我说：“小路，你到叶总参谋长那里工作好不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现在就带你去。”听了卫士长的话，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紧张，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说实话，不用说总参谋长，我在前方由于小分队活动，还没见过我们团长呢！现在就要去总参谋长身边工作，心情哪能安定得下来呢？

二

叶剑英总参谋长住在王家坪的一个山坡上，几间土平房，面对延河，很是安静。

我去的时候，叶总参谋长去杨家岭开会不在家，李树槐同志向老警卫员许昌南同志作了介绍就回去了。许昌南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对人诚

恳热情，向我详细地介绍了首长的生活习惯等情况，并交待我的工作是先负责内勤。许昌南同志见我非常拘谨，还告诉我：“首长的工作很忙，他对自己的生活从不过问，就全靠我们照顾啦。首长非常关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不要拘束，也不会感到拘束的。”

晚上，叶总参谋长开会回来了，他穿一身打着补丁的灰军服，十分整洁，还留着小胡须。初一见觉得他很严肃，真还有些拘束呢。叶总参谋长没有顾上休息，就把何光、许昌南同志和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我站在首长面前，觉得手脚不知往哪儿放好，首长看出了我的心情，拉起我的手问起了家常：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以前在哪个部队？……我一一作了回答。他风趣地说：“是个山西小老乡，放牛娃，小八路，很好哇！”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一点也不紧张了。

接着，叶总参谋长又问我：“你愿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工作？”我高兴地答道：“愿意。”他满意地点点头，又笑微微地看着我们三个人说，请你们来帮助我做些事，我们互相帮助么。你们几个也要互相帮助么。还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好好学习，今后为党和人民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叶总参谋长兴致很高地谈了很多，直到何光同志提出首长忙了一天，也该休息了，叶总参谋长才笑着说：“好。”亲自把我们送出房门，又伏在小油灯下办公了。从此，我就在叶总参谋长身边开始了新的工作。

三

叶总参谋长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他经常到我们的宿舍来看看、问问，亲自检查我们的学习，帮助解答问题。他还把延安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大众哲学》送给我们，要我们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革命道理。

一次，叶总参谋长翻开我的书检查我的学习。他看见书上用红铅笔画的圈圈、点点很多（叶帅看书很快，而且注有很多标记，我也照着学），就笑着对我说：“你学得不错嘛！”接着又提了几个问题，我却完全没有回答上来。他好像在想什么似的，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并让我把其他

几个同志都找来。叶总参谋长对我们说：“你们几个过去都是穷孩子，上不起学，现在就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主要是学文化，今后有机会还可以到学校学习。穷人闹革命，没有文化，不懂革命道理是不行的呀！”他还讲道，革命胜利后，更需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建设好新中国，并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看几页书，学几个生字，通过练习写字来加深记忆，等等。叶总参谋长从学习的重要性到学习的方法，循循善诱地谈了很多，那一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64年8月，我在北京开会时去看望叶帅。叶帅一见我就亲切地问道：“你这几年到哪里去了？去年国庆节时听说你在装甲兵部队，打电话找你，你怎么又跑到长春去了？”我把自己离开叶帅几年来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后，他高兴地说：“你经过抗美援朝的锻炼，又是从基层上来的，这很好呀！”接着就很关切地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来。我说，比在延安时期好一些，自己能看书了。他满意地笑了笑，又鼓励我说，一定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完一个问题，必须回过来反复思考，真正弄懂其中的意思。这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强记忆。同时，要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好笔记，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最后，叶帅亲切地一再勉励我：“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新的贡献！”

二十年过去了，叶帅这次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工作、学习的座右铭。

四

叶参谋长对工作严肃认真，对自己生活要求严谨，不论多么艰难困苦，他从不准我们搞半点“特殊”。只要他看到桌上的饭菜稍微好一点，就要问个明白，如果有一点说不明白，就会很严肃地批评教育我们。1947年深秋，我们见叶参谋长的棉衣穿了多年，已经补了好几块补丁，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就想给他做一件新棉衣。我刚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叶参谋长就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是集中全力，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紧要关头，解放区人民正在节衣缩食支援我们，我们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衣服能穿就行了，不应该再做新的。他拍着我的肩头说。

“小路，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不是也穿着旧衣服吗？你看，毛主席、朱总司令、彭总他们穿的衣服不也是补钉摻补钉吗？再看看邓大姐，好些年都是穿的那一套衣服……”听了叶参谋长这一席话，心里虽然没有完全想通，但也只好照着他的话去做，叶参谋长又穿着这件旧棉衣过冬了。

在叶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受到叶帅许多终身难忘的关怀和教诲，这里记叙的仅仅是几件生活小事。然而，正是从这样一些生活小事上，充分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三十多年来，一直珍藏在我心里，激励着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你们什么时候回北平来呀！”

路宝银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达成了停战协定。为了保证停战协定的执行，决定组成三人军事委员会来会商解决军事冲突等问题。并在北平设立由美国、国民党和我们党三方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具体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总参谋长作为我方首席代表来到了北平。

我们代表团大部分人员住在北京饭店。为了工作方便，叶总参谋长住景山东大街丁2号，名为叶公馆。公馆的工友，是国民党当局安排的。有的名为工友，实际上是被派来监视我们行动的。我们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情况后，十分警惕，本来一些应该叫他们干的事，由于不放心，也不想叫他们干。叶总参谋长看出了我们的心事，就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讲如何影响、教育和争取这些工友。他说：“这些工友基本上都是城市的贫苦市民，长期受国民党、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他们是能够接受革命道理的。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对我们不了解，受国民党的一些利用也是可以原谅的。你们要主动接近他们，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并用我们的好作风、好言行去影响他们。让他们亲眼看到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懂得我们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了。”他不但教育我们，还经常主动和工友们接近，谈论家常，做工友们的思想工作。

不长时间，这些工友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尤其是看到叶总参谋长平易近人的作风、朴素的生活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深受感动。一个工友就对我谈了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奢侈、腐败的生活，他说，两相比较，一清二白，说明一个真理：“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必败！”他说出了工友们的心理话。

从此，工友们都站到了我们一边，不但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而且经常为我们提供一些消息，为我们做工作，特别是对叶总参谋长的

生活和安全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违反《双十协定》，致使谈判破裂。当我们撤离北平时，工友们都个个含着眼泪同我们告别，纷纷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回北平来呀？”叶总参谋长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定要回到北平来的，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到那时，北平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了！”

上山打石鸡

路宝银

在战争年代，生活极为艰苦，叶总参谋长是广东人，不习惯吃面，又没有大米，主食是小米，没有菜，更没有肉，只好在农村买点土豆，有时也上山挖点野菜。

在我们驻在山西临县双塔村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随首长去爬山散步，看到一群“呱呱”叫的石鸡。老乡告诉我们，石鸡肉很好吃，比家鸡还香呢。参谋长笑着对我说，你明天早起上山，三发子弹交两只石鸡，行不行？我说没有把握，试试看。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按参谋长说的，带着三发子弹，背着枪上了山。这天的运气还真不错，两枪就打了两只石鸡，还节省了一发子弹。叶参谋长看了非常高兴，当天中午就炒了一盘鸡肉，熬了鸡汤，还专门打电话把杨尚昆主任请来一块吃午饭。从此，我每天早上都上山打石鸡，很少空手回来，总算使首长的生活得到一点改善。

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总参谋长就走进我们宿舍，笑着说，“我们今天一块儿上山打石鸡好吗？”我们齐声回答：“好！”我们想，首长这几天工作繁忙，时常工作一个通宵，早晨上山散散步也好。这天上山不久，就发现一个山洼里有一群石鸡。叶参谋长轻轻地打手势让我们蹲下来，看准目标再动手，又叫我悄悄迂回到对面去打，我一扣板机，一只石鸡应声倒下，真是旗开得胜。到十点多钟，我们就打了七只。回到住处，叶参谋长又兴致勃勃地同我们一块退鸡毛。我们劝他休息，他才告诉我们，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陕北很艰苦，今天有人去米脂县杨家沟，顺便带去几只石鸡，让他们改善改善生活。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叶参谋长一大早就带我们上山打石鸡，大家越干越有劲，很快就把石鸡收拾干净了。杨师傅在叶参谋长亲自指点下生火做鸡，叶参谋长还配好了佐料，鸡做好了，叶参谋长亲口尝了尝，高兴地说：“味道不错，还真有点广东味呢！”最后，他叫杨师傅精心包装好，让我把去杨家沟的同志

找来当面作了交待，才满意地回办公室去了。

“我还等着喝水呢！”

路宝银

1947年8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叶参谋长、杨尚昆主任等领导同志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临县坚持工作。在军委机关的驻地双塔村，叶参谋长非常关心当地群众的生活，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经常找群众谈话，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为了和群众交谈方便，他还学会了不少乡土话。南方人说北方土话，难免南腔北调的讲不清楚，有时逗得老乡们哈哈大笑。他也常常和大家一块笑起来，然后又拜老乡为师，一句句地学起来。

一天中午，有个老汉急急忙忙走来要见首长。正好叶参谋长正在院子里散步，一见老汉就边招呼边迎上去。老汉告诉叶参谋长，不知哪里跑来一条疯狗，咬了人就有生命危险，吓得村里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要首长为老百姓除害。叶参谋长听了，马上找来警卫排长，组织人把这只疯狗打死了。

一天清晨，叶参谋长在村外散步，看见老乡们拿着一个瓢去舀水，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水小要用瓢舀。他跟着挑水的老乡来到石老梁山脚下，只见很多人排着长队，走下十几级台阶，在一个小洞里舀着一瓢浑水，水少人多，挑一担水要花很长时间。看到这种情况，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没说话，我们都知道他在想着老乡们的吃水困难。

当时，为了使中央和总部首长有一个比较安全稳定的指挥所，从陕北调来一些老乡在山脚下挖防空洞，叶参谋长为尽快解决驻地群众的生活困难，决定让挖防空洞的石匠先停下来，立即为群众打井。打井开始后，叶参谋长不管工作多忙，早晚都要抽时间去工地看看，为大家鼓劲，有时还挽起衣袖搬石头。大家见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都劝他休息，但他开玩笑地说：“我还等着喝水呢！”说得大家都笑了。老乡们都齐声欢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解放战。

去西柏坡村途中

路宝银

1947年6月，叶参谋长和邓颖超、田家英同志一道，从双塔村出发，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只有骑马和步行。而且，阎锡山还盘踞在太原，同蒲路沿线有的地区刚刚解放，还有残敌没有肃清。一路上，叶参谋长每天都要亲自研究行军路线和宿营点，并且画出详细的路线图，具体确定哪些地方要昼行夜宿，哪些地方该夜行昼宿。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过问邓大姐的住处，询问邓大姐的身体怎么样。一次，他看见邓大姐准备睡在一间茅草房的地上，就立即叫我去把给他找好的一块门板扛来，给邓大姐铺上（因为当地的门板大多被阎锡山部队拿去修了工事或者烧掉，找块门板很困难）。当邓大姐到叶参谋长住地，看见他也睡在地上时，说什么也不肯用叶参谋长给的门板。她用亲切的口气“命令”我们马上把门板搬回来给“叶公”（那时邓大姐对叶帅的尊称）铺。他们俩人你推我让，谁也不愿用门板。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块门板给叶参谋长铺上，两人才各自放心地回去休息。

沿途每到一地，叶参谋长总要不顾疲劳，找房东和当地的老乡问长问短，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行至五台山时，我们游览了山上的寺院。当时，由于当地土改中的一些做法过“左”，寺院的建筑遭到破坏，一些佛像、铜佛像被砸烂、被拿走。叶参谋长，邓颖超等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不时地叹息：“可惜呀，可惜！这是封建剥削的见证，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后还能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搞掉了真可惜！”

在游览时，叶参谋长还作诗三首：

过五台山

（一）

千年古刹千年债，万个金身万姓粮。

打破禅关惊破梦，未妨仇恨是清狂。

(二)

荒凉殿宇有啼鸦，稀世藏经灰化也。

昔日庄严金佛像，而今流落万人家。

(三)

南台山上白云低，人在云中路径迷。

可有神工能扫雾，让吾放眼到平西。

在路途上，叶参谋长骑在马上高声吟诵，还请邓大姐、田家英同志修改。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就到了宿营地。

邓政委来到中条山

于永保

1942年2月初，日军开始对我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地“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铁蹄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村村镇镇房屋被付之一炬，男女老幼惨遭杀戮，尸横遍野。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着救星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到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太岳军区第四分区奉上级命令，来到中条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中条山地处晋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山地，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原始森林茫无边际。在我们部队到来之前，此地曾驻着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纷纷溃散。因此，这个地区日军、汉奸、特务、土匪活动很猖獗。加之敌人冒充八路军抢劫民财，污辱妇女，坑害百姓，欺诈蒙骗群众，所有这些，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正在这个时候，129师政委邓小平同志来到了中条山地区检查、指导工作，他指导我们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创建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

那是1942年春节的前一天，军分区机关正在忙着准备过年，同志们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贴上了红对联。机关宣传队在积极地排练节目，锣鼓声、歌声响彻驻地，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虽然生活比较困难，粮食紧缺，但是，分区首长和后勤部的同志还是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些面粉、蔬菜，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在年初一早晨吃一顿可口的水饺。

除夕晚上，我们在小油灯下包着饺子，同志们相互交谈着在家里过年的不同情景，说说笑笑，直到深夜。除夕的夜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着，明天分区首长又要和我们一同吃饺子，一起观看宣传队为大家演出的精彩节目……

大约凌晨四点钟，清脆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推醒身旁

的一个战士说：“听！好象二营方向有枪声。”我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迅速穿好衣服，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我们分区机关驻在中条山地区雪泉岭下的暖泉，分区直属队7773团2营驻在机关附近，担负警卫任务。二营六连为前哨连，驻在小庙村。这天早晨，敌人秘密地包围了驻在小庙村的六连。六连指战员进行了英勇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拂晓时突破敌人的包围，撤至分区机关驻地。这时，敌人向分区机关扑来。分区首长命令一营断后，阻击敌人；二营掩护分区机关向雪泉岭上转移。一营和二营的指战员们英勇地阻击敌人，快到中午时，分区机关撤到了山梁上。这时，我突然发现与陈赓司令员走在一起的，除了分区政委黄祝华外，还有两位新来的首长。我旁边有个战士喊道：“是邓政委，邓政委来了！”我又仔细地向山梁上望去，只见邓小平政委左手牵着马，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军装，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地走在山梁上，北风吹拂着邓政委的衣襟，他好象丝毫没有感到寒冷。他边走边认真的与陈赓司令员、王新亭主任谈论着什么，不时地抬起头微微笑着与战士们打招呼。大家看到邓政委神态安然、镇定自若的和部队一起沿着山梁前进，顿时受到很大的鼓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大家情绪高涨，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原来，邓小平政委是从太行山129师师部出发，先到太岳军区，后到我们四分区。当邓政委由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陪同来到四分区时，狡猾的敌人又悄悄跟到雪泉岭下，密密地包围了驻在小庙的二营六连和分区机关，妄图袭击邓政委。

部队迅速地向雪泉岭上转移。忽然，警卫部队报告说：“山下有敌人！”邓政委听到后，不慌不忙地把马交给警卫员，从陈赓司令员手中接过望远镜，走到队伍前面，向山下观察了一会儿后，转身对陈司令员说：“果然不错，来得还不少呢！”这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就用大炮轰击我们。顿时，山梁上烟雾弥漫，弹片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邓政委和大家一样，全然不顾。炮声过后，敌人沿着山梁董村旁一条干河向山上进攻。邓政委果断地对陈司令员说：“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首

先控制山梁制高点，拖住敌人，然后掩护大部队转移。”邓政委说完后，陈司令员立刻命令一营派两个连队守住山梁，掩护部队、机关和邓政委安全转移。

一营的两个连队按照分区首长的命令，迅速地控制了山梁上的制高点。敌人拼命地向山上进攻，企图把我们全部消灭在他们的包围圈内。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山梁炮声隆隆，枪声、手榴弹声交织成一片，震耳欲聋。邓政委和分区首长镇定地指挥部队和分区机关迅速而有秩序地向雪泉岭转移。山梁上我们一营两个连的战士为掩护邓政委和分区机关，勇敢地打击敌人。手榴弹象雨点般地向敌人投去，炸得日军魂飞魄散，血肉横飞，一批批地倒在阵地前面。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八点左右，邓政委和分区机关终于撤离了危险区，安全地到了大山里。大部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后，一营两个连的战士才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心情撤下了山梁。这次战斗我们两个连抗击了几倍于我的敌人，共歼敌二百多人，表现了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我们分区刚刚撤出，驻地全被敌人占领了。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敌人集中了阳城、沁水、翼城、浮山等六、七个县的两万多人对我中条山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敌人采用“铁壁合围”战术，企图彻底消灭我中条山地区的抗日力量。

邓政委和陈赓、王新亭等首长，撤到了阳城和翼城交界的督都大山里，这里四周几十里无人烟，地形十分复杂。邓政委和军区首长们针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研究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战、麻雀战。邓政委对这次战术的运用解释说：“这次敌人‘扫荡’，采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捕捉奇袭、辗转抉剔等手段，企图把我们消灭在他们的合围圈之中。我们面对这样凶狠狡猾的敌人，不能硬打硬拼，也不能钻到山里，被动挨打，束手就擒。我们要采用小黄蜂蛰人的战术对付敌人。”邓政委环视了一周，又接着说：“小黄蜂战术，就是说我们面对日寇这只强大的野兽，要从四面八方，前后左右，向它进攻，叫它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零敲碎打地消灭敌人……。”邓政委操着浓重的四川话仔细地为大家讲解着，并且还讲了分散后要注意的事项等。

邓政委的这次讲话既风趣又有风度，他讲话的手势，语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部队分散后，邓政委和其他首长们住进了深山老林。没有房子，邓政委和大家一起动手搭起了草棚；没有桌子，邓政委就利用弹药箱垒在一起当办公桌；没有床，他和大家一样用于草铺在地上，睡地铺。他风趣地说：“这种床又软又暖和，睡上一定很舒服！”大家一听都哈哈地笑了。

山西高原的隆冬，寒风凛冽。邓政委每天夜里都点着昏暗的小油灯，在冰冷的草棚里分析情报，研究各部队的情况，利用电台与太行地区师部和太岳军区进行联系，掌握全局的情况，运筹帷幄。夜深了，草棚外不时传来呼啸的风声和狼嗥声，但邓政委仍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常说：“一个指挥员决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当儿戏，否则他就是一个罪人。”邓政委就是这样指挥着我们，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在这艰苦的日子里，邓政委与战士同甘共苦。当时的中条山地区，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实行“三光”政策，药品供应紧张，有些负伤的战士，因药品奇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献出了生命。邓政委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他对我们分区机关卫生处的同志说：“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办法。我国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记了两千多种草药。这么大的中条山，一定会有许多草药。比如野菊花、柴胡、马齿苋等这些都是中草药，采回来用不是很好嘛！”在他的启发下，我们分区卫生处的同志到附近山坡上采集了许多中草药，解决了一部分药品不足问题，使伤员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投入了战斗。后来吃粮也越来越困难，邓政委用手指着对面的山岭对战士们说：“现在是三月份，天气渐渐转暖了，对面山头的背风向阳处可能有能吃的野菜，可以挖回来充饥嘛。当年红军就是靠野菜维持生命，坚持斗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我们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再吃一次野菜嘛！”邓政委这么一说，大家果然找到了不少野菜，大家对邓政委渊博的知识和准确的判断都很钦佩。

部队分散活动后，生活极为艰苦。但大家一想到邓政委和我们一样

吃高粱面、黑豆面拌野菜，住山林，睡草棚，都毫无怨言。在邓政委的指挥下，我们运用游击战到处打击日寇，使敌人惶恐不安，晕头转向。在一个多月中，我们共消灭敌人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反扫荡的伟大胜利。反扫荡斗争刚刚胜利结束，邓政委就要离开中条山地区了。临走时，邓政委对我们军分区首长说：“你们今后要巩固根据地，发展和扩大八路军，发展党团组织，组织各种政权，发动群众，彻底消灭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土匪、汉奸、特务，争取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

邓政委走后，我们按照他的指示，逐渐巩固了中条山根据地。

（李敬申 王波 整理）

赤胆忠心为人民

成 普

彭德怀同志一生秉性刚直，胸怀坦荡，从不阿谀奉承，文过饰非，更忌圆滑诡诈，搞两面派。这是他一生为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品德。所以，他只要发现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不管对什么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及时指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解放平壤，收复三八线以北全部朝鲜国土以后，应让部队休整补充，同时，要好好总结一下出国作战的经验，以利再战。彭德怀同志趁胜利的空隙，亲自回国一趟，以便当面向毛主席汇报，免得用电报费时费事，且不易说清问题，致误大事。于是，他于行军途中，就在一个火车隧道的临时指挥所里，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说明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当第二次战役一结束，我们到达了君子里，在矿洞中设置了指挥所后，他即急忙上车，连夜回国了。

彭总回到北京后，急于要面见毛主席。可是，这时毛主席碰巧不在北京，已出巡外地。彭总就马上赶到外地。当他来到毛主席住地时，主席已上床休息了。警卫人员请彭总稍事等候，待主席起床后再见。他怕耽误宝贵的时间，便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推开房门，将毛主席唤醒，说有事要紧急报告。他便将在战争中遇到的补充不及时等新问题，向毛主席如实汇报，并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毛主席听了他的意见以后，赞叹地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毛主席对彭总的意见欣然同意。彭总很高兴地迅速返回朝鲜前线。但是，问题虽然得到毛主席的赞同，并不等于问题立即得到解决，因为实际工作总有一个过程。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对志愿军的补充，不能采取国内办法，而要采取一种特殊办法，即全国所有部队，以完整建制，轮番出国作战，都去摸摸“老虎”的屁股。这样，通过战争实践，既可锻炼提高我军各个

部队的作战能力，又可避免零星补充，不能凑效的弊病。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但是，调兵遣将出国作战，也不是一说即可办到，必须有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和各种扎实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增调新的生力军出国参战，还需一定时间。

毛主席和党中央考虑，志愿军打下了两次大仗以后，虽然存在不少困难，但乘胜利的余威，还可继续作战；如能将敌人再歼灭一部份，使之再向后退，则我军阵地可更牢固；于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一面命令国内部队加紧出国轮战的准备，同时命令志愿军要继续举行第三次进攻作战。

当时，彭德怀同志毫不犹豫地修正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处处从党和革命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自觉地坚决地服从毛主席的命令，他立即挥笔下令：“奉毛主席的命令，我军应坚决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奋勇作战，特决定举行第三次战役。”因此，1951年元月初，志愿军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三次进攻战役，歼灭了敌人近二万，一举解放了南朝鲜首府汉城，将敌人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至此，彭总调查敌我情势，采取了适可而止的正确决定，坚决拒绝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断然停止了追击，避免了孤军深入的危险。

上述历史事实足以充分证明，彭德怀是一个大公无私，丝毫不顾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革命家。可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全然不顾历史事实，诬陷彭德怀同志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历史已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谰言，阴谋家和野心家正是他们自己。

回忆到此，不禁使我想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同志以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不惧犯颜直谏可能带来的自身祸害，剖切陈词，切中时弊，充分表现了他那赤胆忠心的高尚品德。倘若能按照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纠正各种“左”的倾向，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就可大大减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可较顺利地向前发展。还是毛主席后来说得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也许真理在你（指彭德怀同志）那边。”

历史事实证明。真理是在彭德怀同志手里。

彭德怀同志为人，正象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这种优良品德，我们应该永远发扬光大。而他那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风格，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彭总心中装着人民

陈 明 庞雨水

彭总对人民群众非常尊重，处处以身作则，维护群众利益。干部战士谁要是违犯了纪律，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都严肃对待，酌情处理，绝不马虎。1948年4月，部队打完西府战役之后迅速后撤，走得人困马乏。当撤到离屯子镇不远的村庄时，领导上决定临时休息，弄点饭吃再走。当时，庄上群众疏散了，找不到一个老乡。我们好不容易在一户老乡家中找到一点面粉，做了顿面片吃。彭总胃不好，只吃了几片烤馒头片，喝了点清汤。彭总说：“老乡不在家，我们要把饭钱给留下，不能吃完了嘴一抹就走。”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放在桌子上。我们知道彭总口袋里总共只有五、六块银元，这是四科发给彭总急需时用的。我们感到用彭总的钱不合适，合计了一下，决定把打宝鸡时缴获敌人的白布留下两丈，并给老乡写了个条子，放在桌子上。彭总听了事情的处理经过，高兴地说：“这就对了。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遵守群众纪律，注意爱护人民的利益。”

在后撤的路上，彭总见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骑着一头毛驴，慢慢悠悠地走着，毛驴后面跟着一位老乡。彭总急忙上前问明了情况，原来，这位军人是某部的一位排长，感冒了，脚上又打了泡。彭总说：“毛驴是老乡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动用。我们办事情要处处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头痛感冒，脚上打泡，那是小毛病，挺挺就过去。你骑老乡的毛驴，就不怕落下罗圈腿？还不把毛驴让老乡牵回去！”那位排长并不认识彭总，还想说点什么。这时，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志插嘴说：“彭总胃病犯了，吃不下东西，有马不骑，还坚持走路哩。”当那位排长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彭总时，赶快把毛驴交还老乡，向彭总敬了个礼，转身快步追赶队伍去了。

兰州解放时，缴获马步芳一辆轿车。司机小马同志把轿车擦得油光发亮，非常爱惜。一天，一群老乡围着轿车，摸摸这，抠抠那、感到很

新鲜。小马怕把车弄坏了，劝老乡离开。有几个青年人不听劝阻，仍在车旁敲敲这边，拍拍那边。小马火了，解下腰上的皮带驱赶老乡，一皮带抽到一位老乡的身上。那位老乡很气愤地说：“解放军怎么动手打人！”这件事被彭总知道了，对小马说：“你打老乡，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应该好好反省！”事后，彭总还派人向老乡道了歉。

1948年夏，部队从河北接来一批新兵，准备开欢迎大会，彭总要讲话：为维护秩序，确保安全，我们警卫班的同志提前来到了会场。这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进了会场，朝戏台边走来。庞雨水同志急忙上前劝阻，请老大爷离戏台边远点。老大爷不听劝阻，继续朝前走。我们心中一急，言语态度就不大注意了。“对老乡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和蔼。”我们回过头来一看，见彭总站在背后。彭总接着说：“群众高高兴兴来参加欢迎会，不要规定这也不准，那也不行，有什么事要好好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做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位老大爷听了彭总的话，哈哈地笑了。

壶梯山战斗前夕，我们住在农村的一户老乡家中。一天，彭总正在起草电报，房东老大娘到彭总住的房子里找什么东西。彭总放下手中的笔，亲热地与老大娘拉起家常来。陈明同志怕耽误彭总的工作，就上前拽老大娘的衣服说。“大娘，有什么事你就找我，我们到外面去说吧。”原来，老大娘是找铁锨的。陈明帮她找到了铁锨，大娘就走了。事后，彭总对陈明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接触群众？”陈明说：“怕影响你的工作。”彭总说：“通过和老年人谈话，能了解到社会上许多情况，这对我们工作会很有帮助的。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多接近群众，多了解社情才对啊。”陈明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对，对，我以后注意。”

（马程 胡勤文 整理）

彭总在“百团大战”中

成田芳

1940年8月，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来到山西武乡一带指挥部队作战。10月下旬的一天，彭总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将指挥所搬到离前线只有十二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位于关家垴主峰东南面的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林木遮掩，位置隐蔽，但离前沿太近。我们警卫战士都紧绷心弦，时刻为指挥所人员的安全攥着两把冷汗。后来我们才知道，关家垴主峰山顶早被一个连的日军占领了，我们的指挥所就设在敌人的鼻子下边。大家对彭总的雄才大略无不从心底里敬佩称赞，同时也感到自豪和担负任务的光荣。

那些天，我每次站岗，总是看见指挥所人员出出进进，有的脸上淌着热汗。当时我心里还觉着奇怪，他们有时从我面前擦肩而过，竟象互不相识，连一句话都不说。有的甚至飞马来到跟前，顾不得擦去脸上的血迹就滚鞍下马，甩掉缰绳跑进指挥所去。我一看就知道是从前线来的，特别是认识的，也不多查问就放行了。根据这种异常紧张忙碌的情景，我估摸彭总正指挥着一个大的战役。

夜幕降临了，山峰被夜幕笼罩着，远看象无数巨人挽起臂膀顶住了那撒着稀疏星斗的夜空。嘀嘀哒哒的电键声象跳动的心脏，给大地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透射着灯光的窗上，有个人影来回移动，象迈着稳健的步子，在棋盘上正拨动着千军万马。为了抗战，为了胜利，我曾看到过多少个这样的日日夜夜，彭总一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们经常为彭总的健康担心，有时竟天真地希望指挥所窑洞的灯光能有一夜不亮，或半晚上不亮也好，能让首长休息一会。可是希望从未实现过，电键声有节奏的不停地跳动，远处的枪炮声时紧时慢，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四、五天后，我在岗位上发现人们神情突然变了，工作还是那样忙碌，但不象以前那样严肃紧张了。出进指挥所的参谋人员和来自前线的同志都满脸喜气，见面不光打招呼说话，迈小声叽叽咕咕议论一阵。通

讯营的战士不断送来前线的捷报。从这些变化了的神精和议论中，我们才知道，朱总和彭总，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这座普通的窑洞里，正指挥着震惊中处的正太路破袭战役（即百团大战），而且战斗已近尾声，胜利在望。我们警卫连所有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几个围在一起，悄悄地谈论猜测，越谈越来劲。我们羡慕前方的战友，心想：要是有机会，能让我们上前线也亲自参加战斗该多么好啊！

我的想法和要求实现了。彭总批准我们连参加战斗，并交待了任务。全连干部战士高兴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一个个摩拳擦掌忙着作准备。为了行动方便，大家把暂时不用的东西都集中放到连部，等待出发。我们连共一百五十多人，红军老战士八十多人，他们都是连队的骨干。其余六十多人是从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参军不久的新兵。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全连早早吃过晚饭，由连长带着经武乡、砖壁村向有炮声的关家垆方向前进。部队走石门河滩里停下来，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当一双双目光移到关家垆东坡上时，才发现有四、五个身影顺山路而下。“那不是彭总吗？”“彭总来了！”随着喊声，队伍顿时沸腾起来。有人说这是彭总特地赶来给大家送行的。彭总带着几个参谋走近，连长唐万成跑步上前作了报告，彭总还了礼，健步走到队伍跟前，面带笑容，操着很浓的湖南口音高声问：“同志们好！”我们齐声回答：“首长好！”彭总高兴地一边点头，一边缓慢地移动步子，挨个看着每个战士。最后他满意地笑着叫大家都坐下，便开始讲话：“你们是朱总司令的警卫连，是有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现在这次战役已到了关键阶段，所以要把你们拉上去，让你们在实战中学习作战本领，得到锻炼。今天，你们是战斗员，过上一个时期，你们都会变成优秀的指挥员。”

信任、关怀、鼓舞，使大家的热血象石门河里的水，激起层层波浪。彭总洪钟般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一字一句扣人心弦。人们竖耳静听，两眼紧盯住前面，好象现在才真正看清了彭总的身姿。他身上穿着同大家一样的灰布军装，腰间紧扎皮带，打着绑腿，显得格外魁梧精神。他讲起话来从容不迫，语意深刻，时而把手背在身后，时而伸出来作着有

力的示意动作。战士们听着浑身是劲。

彭总继续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今天，由我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你们打关家垴这一仗，歼灭敌岗峙大队这五百多人。参战的还有129师的385旅、386旅、新10旅、决死一纵队的两个团。你们手里拿的枪和手榴弹，都是我们黄烟洞兵工厂生产的，你们一定要英勇作战，起模范作用……”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从形势讲到战争目的、当前任务、战术动作、党团员模范作用等，内容生动丰富，声音铿锵有力。大家听了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彭总结束了讲话，向大家挥手告别后，回东山指挥所去了。我们连继续前进到石门村，林指导员又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并讲明我连的主要任务是：今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强夺关家垴主峰山顶。同志们一听象滚锅的水，争着发言表决心。有的说：“消灭关家垴山顶上这股敌人，就是保卫指挥机关和首长的安全，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要由我们警卫连来完成。”有些老红军战士说：“我们一定要给彭总缴获几个好望远镜。”还有的决心为首长们拉回几匹大洋马。我们这些新兵见老同志们决心那样大，也抢着说：“我们一定要抓几个活鬼子，决不给彭总丢脸。”话音未落，惹起大家一片笑声。是啊，对老战士来说，抓几个活鬼子已经是低标准了，他们的要求是刺刀见红，敢于胜利。否则，怎么能算是朱德总司令的警卫连呢？

晚上十二点全连吃完饭，两点从石门村出发，绕道向东山方向走了几里路，然后又向西，顺着一条大沟上去就是关家垴主峰。当时，我连右翼是385旅，左翼是决死一纵队。主峰三面都是我们的部队，只有西面半山坡上的关家垴村，驻的全是日军。我们悄悄摸到山顶，突然一排手榴弹甩过去，接着端起刺刀，同赶上来的兄弟部队一起，象猛虎扑食似的一举把敌人压了下去，攻占了山顶。可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动手整修工事，敌人就开始反扑，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天亮了，躲在东方山峦背后的大火球，象怕看见面前这场激烈的拚杀似的，迟迟不敢露头。山坡上摆满了麦捆似的敌人尸体。血腥味，焦糊味，同尘烟混在一起直刺鼻子。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占领山顶。回头

扫了一眼，在约二百多平方米的阵地上，躺着各种姿势的人，也不知坚守阵地的还有几个战友。我紧盯着山下，观察敌人的动静。虽说第一次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可我毫不害怕，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彭总亲自指挥，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敌人又开始增援了。飞机从长治方向飞来，象老鹰在头顶来回盘旋、扫射，投炸弹，企图把阵地炸翻。我抖落满身的碎石尘土，准备迎接又一场恶战。就在这时，上级命令我们连撤下去整顿，友邻部队接替了阵地。

离开关家垴主峰，副指导员带着全连包括轻重伤员共三十五人返回砖壁村。

有多少亲密的战友马革裹尸，血洒战场！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愧是朱总、彭总教导出来的好战士。这三十五名幸存者，是刚刚从炮火中锤炼出来的，是胜利者，不愧是朱总和彭总信得过的警卫连。

部队在砖壁村就地休整，对战斗进行了总结。几天后，彭总同左权副参谋长来看望我们，高兴地表扬了全体同志，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没多久，又从冀中来的地方干部和特务团等兄弟单位，抽调干部战士补充了我们连队。我们经过短期整训，士气高昂，斗志更旺。此后不久，就又高兴地回到朱总、彭总身边，继续担负警卫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光荣任务。

（梁瑞林 整理）

五元边币

卫一吾

1936年夏天，组织上决定让我到陕北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去学习，这一下可把我高兴坏啦！当时同去的还有十个同志，他们有汉族、回族、藏族的，都是刚参加红军的新战士。出发前，领导上指定叫我带队，并交待了到瓦窑堡去行军路上的注意事项。我们从曲子出发，一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已走到河连湾西口，正好碰上两个人在地头上看麦子，前面的那个人，身材魁梧，穿着一身半新的灰粗布军装，头上戴着红五星八角帽。他身旁的那个人，屁股上吊着盒子枪。我们快步走到他们跟前，那个红军首长和蔼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敬礼答道：“我们是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去学习的。”他又问道：“从哪里来？”我立即答道：“从曲子。”他看见我们几个人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急切地问道：“冶旅长咋不来？”我走近他面前说：“冶旅长在红军医院治伤哩！”他说：“我们把牛宰下等他呢！”我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宰的牛他不能吃！”他以略带惊讶的语气问道：“为什么？”我说：“冶旅长是回民，回民吃牛肉要阿訇宰哩！”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他关切地说：“你们走累了，就在这里住下吧。”我们顶着似火的骄阳，走得又渴、又饿、又乏，听到他温暖的话语，大伙儿高兴得连连点头。我望着他的神态，深深感觉到只有在红军队伍里，首长对士兵才这样关怀，这样亲切啊！我感动地说：“太感谢首长啦，太感谢首长啦！”我们跟着他走进河连湾，他吩咐警卫员给我们安排住处，又向我们扬扬手说：“你们跟他去吧。”

我们十个人住在一孔窑洞里。大家放下背包，刚洗完脸，正打算到伙房去吃饭，警卫员拉来一只大绵羊，高高兴兴地说：“彭司令员让我给你们拉来一只大肥羊，你们当中有回民，自己动手宰了吃吧！”大家听说是彭司令员叫送来的大肥羊，竟忘掉一天行军的疲劳，一齐围上来，异口同声地问道：“是哪个彭司令员？”他微笑着说：“还有哪个彭司

令员，就是咱们西征红军的彭德怀司令员嘛！”我高兴地说：“就是刚才在村口跟我们说话的那个首长？”他点点头说：“就是的。”我们十个回、汉、藏族战士，高兴地跳起来喊道：“我们见到彭司令员啦！”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我们正准备启程，一个干部来到我们住处说：“等一会，彭司令员来看望你们哩！”同志们听到这个喜讯，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有的忙着整理身上的军衣，有的重新绑腿，有的拿起扫帚扫地，顿时，小小的土窑洞里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氛。灿烂的朝霞射进了农家庭院，这时我们渴望已久的彭司令员来了。大家忙走出窑洞，欢迎彭司令员。同志们带着喜说的心情，一个个恭恭敬敬地向彭司令员行举手礼，他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走进窑洞后，他看到没有一个坐的凳子，右手一挥说：“按咱们的老规矩，都上炕坐吧！”我们上炕坐定后，彭司令员坐在炕边上，首先询问了一下前方的情况，又问到105旅被俘官兵的情况，我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彭司令听了微笑着频频点头。接着，我又向他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当他知道我们十个人中，有三个回民、四个藏民、三个汉民时，格外高兴。他拍着一个回民战士的肩膀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高等革命学府，组织决定让你们到红军大学去学习，是为革命、为北上抗日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干部。你们到红军大学要好好学习啊！”我们十个回、汉、藏族战士，目不转睛地望着彭司令员，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我代表大家向彭司令员表示。“我们到红军大学，一定好好学习，决不辜负司令员的期望。”他满面红光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真希望他能多坐一会，多给我们讲些革命道理。当彭司令员走出窑洞时，我们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把他送了好远好远。他不断向我们挥手，示意不要再送了。我们举起双手在头上挥动着，踮起脚尖，瞪大眼睛，依依不舍地望着彭司令员远去的身影。

彭司令员走后不久，一个干部来找我：“卫一吾同志，彭司令员想把三个回民同志留在前方，帮助部队做回民群众的工作，你看行不行？”我说：“彭司令员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坚决执行。”他笑着说：“那你就给三个回民同志做做思想工作。”我将这三个回民同志找到一块，把

彭司令员的意思跟他们一讲，三个人可高兴啦，说：“彭司令员这样看重回民战士，那我们就留在前方，跟随彭司令员参加西征的战斗吧！”

这天下午，我们快要动身时，彭司令员又派人来，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五元边币，让我们在路上零用。我过去也见过边币，用过边币，当我接住彭司令员给我们发的崭新的边币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听老红军说：“彭司令员用兵如神，待兵如子。”我们这些刚参加红军的新战士，一见到彭司令员就深深感到他这种神威和温暖了。这五元新的边币，我视如珍宝，在战争年月最艰苦的日子里，宁愿忍饥挨饿，都舍不得花一分钱，直把它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征集红军革命文物时，我才把这五元边币交出来，至今仍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里，作为对敬爱的彭德怀司令员的永远怀念！

“处处事事要想到群众的难处”

田成芳

1940年夏末，我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率领下，在山西武乡一带与日军作战。当时，总司令部就驻在武乡砖壁村。这个村子坐落在一群峰突兀的山脚下。全村有三四十户人家，青壮年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或支前民工队，有的跑到外乡去了，只剩下些老弱孤寡留在家里。村后山坡上沟壑纵横，土少石多，河渠干涸，林木稀疏，庄稼户种一点薄地也全是靠天吃饭。村子上下没有一口水井，老乡们只靠下雨天，把从山坡沟岔流下来的泥水，引蓄到村边的人工池里，这便是全村人畜赖以生存的唯一水源。每逢天旱无雨，就得跑到十几里或几十里之外去挑水，或者到近村有水窖的地主老财家里求水。每当这时，狠心的地主老财就把水窖封起来，一点水也不给。穷人只好眼巴巴的望着，敢怒而不敢言。

我们部队进驻村子后，开始大家对这里缺水情况不甚了解。战士们见老乡在池里挑水、饮牲口，也就来到池边饮战马，洗衣服，有个别人还在池边用毛巾擦澡。我们警卫连虽派有哨兵在池边看守，但主要任务是防止敌人放毒，对其它情况并没在意。

有天中午，轮我在池边站岗。头顶太阳象火一样烤得人口干舌燥，浑身是汗，我真想跳进水池痛痛快快洗一阵。正想着，猛抬头见彭总背着手漫步走来。他沿着池岸踱到我跟前，我急忙立正行了个持枪礼，彭总微笑着问：“你的任务是什么？”我大声回答：“防止敌人给池里投毒药。”彭总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沿着池岸又转了一圈回指挥部去了。我望着彭总远去的身影，心想，彭总一定是工作的太累了，出来散散步，吹吹风，解一解疲劳，这也是他的老习惯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在池岸上站岗，只见彭总领着管理员和我们的副连长，一行数人来到池边。彭总边走边指指点点的讲着什么，最后，走到我跟前神色严肃地说：“这里的群众吃水比吃油还难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处处事事要想到群众的难处。从现在起，哨兵的任务除防止敌

人放毒外，还要兼管部队用水，防止浪费。一、洗衣服、洗菜都要用盆子打水到池外去洗。二、牲口饮水要在池外，不能让牲口进入池内。三、这事要给哨兵交待清楚，传下去。你们管理科要很快给部队发个通知，讲明情况，使所有人员都主动节约用水，严格防止浪费水的现象再次出现。”

当天下午，部队对彭总的指示进行了认真讨论，都决心按上级通知要求办。自那以后，再没发现谁在池里洗衣服、饮牲口及浪费水的现象了。没多久，乡亲们也知道了这件事，激动万分，遇见我们就说：“彭总日夜忙着指挥千军万马打仗，还这么心细，操劳乡亲们吃水的事，他是有胆有识、文武双全的好司令。你们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啊！”后来。这个小故事在武乡一带很快就成为人人皆知，广为传颂的佳话了。

（梁瑞林 整理）

“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

陈 明 庞雨水

彭总一生中功勋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很尊重，充分表现出他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有这样一件感人的事，是我们终身难忘的。1949年冬，第一野战军总部住在兰州市三爱堂。当时住房较为简陋，有一个饭厅，平时，总部机关的一些干部在这里吃饭；开会时，就把饭厅改为会场。一天，政治部的同志把饭厅布置了一下，东边的墙上挂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西边的墙上挂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的画像，南北墙上还贴了几张红绿色的标语，整个饭厅，焕然一新。

有一天，总部开干部会，彭总提前来到会场。他缓缓在会场内踱步，当彭总走到自己的画像下时，停下了脚步，突然眉头紧皱，发起火来：

“这是谁叫搞的，怎么能把我的像也挂在这里，还不把它拿下来！”我们几个人急忙把他的像取了下来。这时，彭总怒气未息，又说：“我彭德怀，在旧社会，在地主老财眼里，连条狗都不如，党中央、毛主席功比天高，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那有我彭德怀的今天。怎么能把我的像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像挂在一起呢？我们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我们在场的同志，听了彭总的这一席话，都十分感动。

（马程 胡勤文 整理）

赏罚要分明

张成有

彭总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处理问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令人信服。一次行军，我负责设营。部队住下后，我看了看炊事班、饲养班的住房情况，并布置了工作。特别是对饲养班的工作，作了具体交待，要求把鞍具修整一下，把马喂好。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饲养班，只见地上东西放得很乱，鞍具坏了没有修理不说，马也没有好好喂，而两个饲养员却躺在草窝里呼呼睡大觉。这时，我心中非常生气，叫醒了两个饲养员，劈头盖脑地批评了一顿。两个饲养员对我的批评一时想不通，结果，来了个不辞而别，开小差走了。

“司令部饲养员开小差”，同志们议论纷纷，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深刻检讨。当时，我认为饲养工作失职，应该作严肃批评，没有错，不愿作检讨。领导上看我不检讨，就要给我以纪律处分，我心里更恼火。一天，一科科长对我说：“张成有，你的运气真好，今天彭总保了你的驾！”我忙问是怎么回事？一科科长说，领导上研究要给你处分，彭总为你说话了。我问彭总说了些啥？一科科长学着彭总的腔调说：“马夫不喂马，这是失职。张成有大胆管理，严肃批评，这是为了革命。战士失职，又听不得批评，一批评就开小差，那是他们不对，如果严格管理还要背个处分，今后谁还敢严格管理部队？赏罚要分明嘛！当然啰，张成有的批评方式可能有缺点，是要引起注意和改正的。”我听了这一番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一方面感激彭总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深感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使彭总为我的工作操心。

不料过了几天，那两个饲养员回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忙叫炊事班同志给做鸡蛋面条，亲手端给他俩。饭后，我又找他俩人谈心。首先，我检查了自己处理问题急躁，批评不讲方式，言语过重伤人，诚恳地向他俩表示歉意。接着，我请他俩对我的缺点提出批评。两个饲养员回来是准备挨批评受处分的，见我对他俩的缺点过错一字未提，还

一个劲地检查自己，再也坐不住了，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一受批评就开小差。”通过这次谈心，相互之间内心的疙瘩解开了，感情也更加亲密了。彭总知道了事情的处理经过，说：“张成有聪明起来了。”

（胡勘文 整理）

我为彭总喂战马

汪秀田

1938年初的一天，管理科长通知我去给彭总喂马。我一听高兴极了，立刻赶到彭总那里报到。彭总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听说你喂马很有办法，好好干吧。”我点点头说：“我一定好好干。”从此，我就在彭总身边工作了三年。

爱 马

彭总有一头黑驮骡，一匹枣红马。这头骡子黑鬃黑尾，浑身像披着一幅枣红色的锦缎，漂亮极了。枣红马性子乖，胆子大，跑起来非常平稳，逢沟越沟，逢崖跳崖，彭总非常喜欢它。彭总有胃病，平时只能吃些烤干的馒头片。但他在行军时，只要情况不紧急，就舍不得骑马，总是手扶着马鞍步行，走累了才骑一程路，要是走山路，彭总绝不骑马，而是拽着马尾巴，慢慢地朝山爬。一到宿营地，他总是嘱咐我先给马和骡子伴上草料，把牲口喂饱，我看彭总喜爱枣红马，喂的时候特别当心，尽力把它喂好。

在太行山那阵，我们总部经常转移，有时也在一个村庄住上十天半月。这时候，我们饲养员不但要天天遛马，而且隔几天还要压马。所谓压马，就是给马备上鞍具，跑上一、二十里地。这是为了锻炼马的使役耐力。那时我年轻气盛，喜欢骑马。压马时故意把马打得飞快，自己觉得很惬意。

有天，我骑上枣红马，把鞭子一甩，枣红马扬蹄如飞，在大道上来回奔驰。老百姓看见枣红马雄姿勃勃，四蹄生风，交口称赞。我更来劲了，两腿一夹，枣红马跑起来象飞一样。这时恰巧叫彭总看见了。他高声喊道：“站住！”我吃了一惊，急忙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向彭总敬礼。彭总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回答说：“报告彭总，我在压马”。

“压马跑这么快干啥？”彭总气乎乎地问。

我看彭总很生气，不再说话了，等着挨批。彭总走到马跟前，用手摸着马背心痛地说：“你看看，都累出汗了。马和人一样，跑这么快还不累垮了？”枣红马也喷着响鼻，用嘴亲昵地拱着彭总，仿佛在向主人诉说我对它的野蛮驾驭。我看到彭总这样爱马，以后在压马时再也不策马疾驰了。

让 马

彭总虽然爱马，更爱战士、爱同志，待我们情同手足。行军中他常常把马让给同志们骑。

那时行军，彭总的行李和办公用品都由黑骡子驮着。我怕东西多累坏了骡子，就把自己的背包背上走路。彭总看见了就问：“小汪，你怎么不把背包让骡子驮上？”我说：“骡子驮得多，我怕把它累坏了。”彭总说：“你晚上喂牲口，休息不好，背着背包走怎么吃得消，把背包驮在马背上吧。”我听了彭总的话，后来在行军时就把行李分开架在驮骡和枣红马上，走起路来轻松多了。一次行军，我感冒了，头痛恶心，四肢发软，彭总知道后，硬是让我骑在马上，他却扶着马鞍步行。

一天，我们正在行军，遇到了从前线下来的一队战士。其中有一个战士胳膊负了伤，鲜血渗透了绷带。彭总看到后，就让这位战士骑他的马。这位战士不认识彭总，就说：“首长，我能走路。我不骑马。”彭总说：“你负伤流了血，身体弱，骑一会吧。”说着便把战士扶上了马。彭总扶着马鞍，一边走，一边还和这位战士拉家常。战士几次要下马，彭总就紧紧地按着他的腿，不让他下来。

走了约有六、七里路，我们要和战士们分手了。彭总间明此地离这个战士的营地还有一里多路，就说：“小汪，我们先走一步，你把这位同志送到营地后再来赶我们。”我遵照彭总的命令，牵着马把这个战士送到了目的地，然后骑马赶上了彭总，彭总这才骑上马，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脱 险

彭总在指挥作战时，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火线上去。我们都知道他的习惯是“不见敌人不走”。有好几次我们跟着他上火线，他都是在指着敌人下达了作战命令才转移。大家常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汗。

1940年5月24日，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我们总部在辽县（后为左权县）的南岩堡被日军包围了。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火炮，向我们猛烈轰击，一时间硝烟滚滚，弹片如雨。总部机关的七十多匹战马和彭总的驮骡，都倒在血泊之中。我们刚刚印制的还未盖章的边币也抛撒了一地。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了，险象丛生，情况异常危急。彭总镇定地指挥总部人马奋力冲出重围，向安全地带撤退。我们边打边撤，部队一时无法收拢。彭总带着一个警卫员，合骑着枣红马，一口气翻越了四座大山，来到了一个叫砖壁的山村。他俩一下马，枣红马就扑倒在地，嘴吐白沫，四蹄不动，直喘粗气。彭总看到马累成这个样子，心里很难过，他让警卫员一步不离地守在枣红马旁边，看护着它，枣红马躺了一天一夜，竟然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后来我们找到了总部，看到彭总安然无恙，大家才放了心。枣红马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大功。

情 谊

1943年春天，总部派我跟随王政柱和罗健同志蓟延安，给朱总司令送一头驮骡。首长告诉我，彭总不久也要回延安，让我到延安后不要再回山西，就在朱总身边工作。

临走之前，我去向彭总告别，彭总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想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从前线回延安应当穿得好一些才象个战士，可我的衣服又破又脏。于是，我就提出请彭总给我解决一套单衣。彭总为难的说：“你的衣服是破了些，可是你知道咱们很困难，总部连一套衣服也拿不出来。我的衣服也没有新的。衣服问题不好解决。”

我知道彭总说的都是事实。彭总一向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有时我们发两套衣服，他只要一套；我们发一套，他干脆不要，把衣服节省给前方的战士。因此，他穿的衣服也是打着补丁。可我提出让他解决衣服

问题，这不是出难题吗？我后悔自己太糊涂，就赶紧说：“那我就不要衣服了。”

彭总热情地说：“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我要送你一件东西作个纪念。”

我说：“我的工作没作好，黑骡子也牺牲了。我不缺啥东西。我走了以后，你叫新同志好好喂枣红马。”

“你放心走吧。”彭总想了想说：“我有一条新毛巾，一直没舍得用，送给你用吧。”说着他让警卫员把毛巾找出来，送给我。

我说：“毛巾我有，这条你留着用吧。”

彭总说：“你的是你的，我给你你就拿着。这次送骡子任务重，路上小心一些，到延安向朱总问好。”

我回答说：“是。”就给彭总敬了个礼，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当时我拿着彭总送的毛巾，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一条毛巾价值不大，但这是彭总能拿出手的唯一新东西。小小的白毛巾，凝聚着彭总对我这个普通战士多么深厚的情谊啊！我把毛巾带在身边珍藏了好几年，一直舍不得用。直到日军投降后，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我才把它拿出来用了。

几十年来，这条白毛巾一直是我牵魂扰绪的珍贵记忆。我常想，这条毛巾不正是彭总一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真实写照吗？毛巾那雪白的颜色，不正是彭总那纯洁、晶莹、高尚的心灵的美好象征吗？

敬爱的彭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音容笑貌，您的高贵品质，您的亲切教诲，您的深情厚谊，您的丰功伟绩，还有您送给我那条洁白的毛巾……。

（陈绪生 整理）

回忆彭总二三事

杨 兴

一碟南瓜菜

1947年6月，我军攻克环县之后，挥师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进军。“三边”地处塞外，风沙弥漫，气候干燥，生活条件很差。部队长途行军，顿顿是盐水小米饭。我们都感到彭总明显地消瘦了。为此，大家都很着急，总想给彭总搞点蔬菜吃。一天，我们总部在靖边县张家畔宿营，张副官在老乡家买了个小南瓜，炒了炒端给彭总。彭总高兴地问：“哪来的南瓜？”张副官说：“买的。”“大家都有吗？”彭总又问。张副官为难地说：“只买到一个又嫩又小。”彭总不高兴地说：“好嘛！大家吃盐水小米。我吃炒南瓜。”张副官解释说：“大家都说你最近瘦了，所以……”，“所以我就应该搞特殊，是不是？”彭总生气地打断了张副官的话，一字一句地说：“这里人民生活很苦，一个南瓜秋后长大了，够一家吃一天。可南瓜还嫩，你就把它买来了，一个南瓜也吃不胖我。同志，今后要记住，我们部队任何时候都要照顾群众利益，我们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快把菜端回去，让大家都尝一尝。”彭总说着端起小米饭，倒了一点盐水，就大口吃起来。张副官只好把南瓜菜端了回去，劝大家分着吃了。

一次党小组会议

1947年8月，我军准备攻打榆林，一连几天的急行军，大伙儿都累得要命。一天，我们总部到了米脂镇川堡以东的白羊岔。为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圆满完成战斗任务，总部机关党组织指示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当时，彭德怀同志和我们警卫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在开会之前，彭总的随从卫士孙理科去叫彭总开会。他一进门看见彭总正站在地图前沉思，知道彭总正在筹划战斗部署，于是就退了出来，向大家说明了情况。大家认为彭总工作忙，参加不参加小组会没关系，就没有叫他。

第二天，彭总知道了开党小组会的消息，就问孙理科：“开党小组会为什么不叫我参加？”孙理科说：“我看你忙，就没叫你。”彭总说：“我要是忙，可以请假嘛！你应该通知我才对。”孙理科说：“你是首长，这次你有特殊情况。”彭总严肃地盯着孙理科，开导他说：“领导部队指挥作战，我是首长。可是在党内，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和同志们一样。我们共产党里可没有特殊党员。以后开会。一定要通知我。”此后，我们党小组凡是开会，就及时通知彭总，他总是很高兴地参加会议。有时因为工作忙来不了，就事先请假。

一次特别的招待

清涧，是胡宗南在陕北的一个重要据点。1947年10月11日，我军攻克了清涧县城，缴获了很多军用物资，其中有一架无线电测向机，还有四门美式山炮，四挺美式战防枪，更令人高兴的是活捉了国民党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旅长张汉初。廖昂是湖南人，和彭总是同乡，老相识。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把廖昂押到总部。廖昂浑身是土，精神紧张，样子非常狼狈。这时，彭总迎上前去笑着说：“久违了，廖先生。在这里见面，想不到吧？”廖昂战战兢兢地说：“我认输，我认输。”彭总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先休息休息，回头我们再谈。”廖昂一个劲地说。“是、是。”战士们便把廖昂押走了。

那天吃饭时，一向俭朴的彭总竟破例吩咐炒了两个菜，招待廖昂。后来，彭总又派部队用自己的驮骡把廖昂和张汉初送过黄河。

当时，我们对彭总这样宽待俘虏还有些想法，但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这正是彭总的伟大高明之处。俗话说，降敌降心。宽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而彭总则是运用这一法宝的典范。

（陈绪生 整理）

“我们当干部的要以身作则”

张成有

在战争年代，彭总为党为国日夜操劳，运筹帷幄，呕心沥血。长期的戎马生活，使彭总得了肠胃病。彭总当时身负重任，不能住院治疗。那时医疗条件也比较差，所以也不能根治。如遇饮食不适，他经常大便带血。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同志，总想使彭总吃得好些，以免犯病，能保证他身体健康，好指挥我们多打胜仗，但往往被彭总拒绝。

1947年7月，西北野战军在靖边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西北战场的作战问题。彭总对我们说，纵队司令、政委和旅长们，在前线打仗很辛苦，这次会议你们要把伙食搞得稍好点。我们四科根据彭总的指示精神，买了一头猪，几十只鸡，来改善参加会议的人和机关干部的生活。一天中午，主食是馒头，菜是红烧肉。我们给彭总增加了个炒猪肝。开饭时，彭总来了。他很高兴地说：“今天是很难得的改善一次生活啊。”彭总问我们：“机关同志今天是不是也吃肉？”我们回答说：“与会议人员一样，也吃红烧肉。”彭总看了看摆在炕上给他准备的饭菜，又去看了看参加会议同志的饭菜。当时，因条件差，纵队司令、政委等人，都蹲在露天地里，七、八个人围在一起共吃一盆菜。彭总转了一圈，回到炕边坐下，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他把高科长叫去批评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应吃一样的饭菜，为什么单单给我增加炒猪肝？不能搞特殊嘛！否则，上行下效，就把部队作风给带坏了。从今天起，把小灶撤了。这一顿饭，我不吃了。”说完后，彭总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叫炊事员做了点面条，烙了点饼，给彭总送去。彭总说：“我说过这顿饭不吃，就是不吃。”高科长说：“批评归批评，吃饭归吃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一定改，但你总不能不吃饭嘛？”彭总说：“眼下，我们的经济还很困难。部队广大指战员，有时还要吃糠窝窝头，生活很苦啊。我们当干部的要以身作则，要与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只有这样，才能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撤去小灶，我已讲过多次，你们就是不听，要是还象你们说的那样‘批评归批评，吃饭归吃饭’那就会产生特殊化的毛病，造成脱离群众的严重后果。”这顿饭彭总硬是没有吃。

彭总撤小灶的事，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专门指示我们司令部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身负重责任，身体也不好，你们对他的生活要多加注意。彭总知道后，对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深为感动。司令部领导同志也告诉我们。对彭总的饮食，既要注意节约，又要做得可口，以保证他的身体健康。但彭总在生活上总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毫不特殊。

(胡勤文 整理)

彭总看望伤病员

霍永贞

1949年8月，我军攻打兰州，当时，我在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任参谋。8月25日拂晓，我军对马架山、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等敌据点展开了全面攻击。我们营奉命攻占位于兰州市西南面的沈家岭。当天下午，我左臂尺骨被敌人的炮弹片打断，经战地医护人员及时抢救，伤势有了好转，过了几天又被送到医院治疗。

这所医院位于兰州市小西湖，紧靠黄河南岸，是原国民党西北中央医院。兰州解放后，刚被我军接收过来，实行军管。我们师的伤病员大部分送到这里治疗。住院部是个两层小楼，楼前有个小院，院的南北有些平房，我就住在二楼的一间小病房里。房里共住了四个伤员，除了我能走动外，其余三个都是重伤员，躺着不能动弹。有一个伤员因伤口疼痛，不时地发出低沉而痛苦的呻吟声。

9月初的一天早上，刘护士长来通知我们说：“今天上午首长来看望伤病员，请大家不要远离病房，要把内务卫生整理好，迎接首长到来。”于是，我和护士就很快行动起来，忙着扫地，擦桌子、擦窗户，整理铺盖，收拾个人衣物等，并帮助重伤员整理被褥和个人衣物。我一边忙着整理内务卫生，一边心里在想：今天到医院来看望我们的是哪一位首长呢？会不会是彭总呢？我又想，兰州刚解放，好多事情都要他决策，如筹建地方政权机构，发动人民群众支援部队向河西和新疆、宁夏、青海等地进军，消灭盘踞在那里的敌人，争取早日解放大西北，军政大事都忙不过来，那能腾得出时间到医院来呢！但我心里又是多么盼望着能够见到指挥我们打胜仗、与我们生死与共、在军内外深受群众信赖的彭总啊！

上午9时左右，医院军管组邵组长，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健步来到我们病房。只见他身穿普通灰色旧军装，头戴灰色解放帽，脚穿旧布鞋，脸庞黑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他就是我们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

怀同志。邵组长介绍说：“彭总在百忙中抽空看望我们来了。”

彭总来到我的面前，顿时弄得我手忙脚乱。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脸上热呼呼的，赶忙起立，向彭总敬礼。彭总点了点头，连声说：“坐下，坐下。”其他三位伤员坐不起来，但都使劲挪动身体，把头转向房门口，表示迎接彭总的到来。有一位重伤员在彭总到来之前，还不停地呻吟着，但当他听说是彭总来看望时，呻吟声没有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彭总站在病房里，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解放兰州光荣负伤，为解放大西北流血流汗，这是光荣的，西北人民世代忘不了你们。”我们回答说：“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接着，彭总走到每个伤病员的铺前，握手问候。一个重伤员握着彭总的手，心情十分激动，好象有什么话要给彭总说。只见他嘴角上抽动了几下，眼里就流出了泪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彭总亲切地对他说：“你伤重，但不要着急。这里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伤口会慢慢愈合的。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巩固的后方，伤病员也在打游击，医药也很困难，有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牛奶、饼干了。今天你们在这里住院，条件不错。要安心休养，争取早日重返部队，再立新功。”

9月初的兰州，早晚凉，白天还有些热。医院病房小，伤员多，住得比较拥挤，屋里空气不好，但彭总在我们病房里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似的，他一会儿轻轻揭开躺在铺上的伤病员的被子，查看伤情，询问伤势，一会儿又征求我们对医疗和生活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大伙对医疗和生活都很满意，邵组长经常到病房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有时还让各病房派代表参加院务会议。医院军管组的政治工作做得好，我们在医院生活得很愉快。”彭总听了连连点头，高兴地说：“好，团结互助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好作风。就是要走到那里，做到那里。”

彭总还问我在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山头负的伤，伤着骨头了没有，现在治疗得怎么样？我向彭总都一一作了回答。我说：“负伤后得到战地医护人员及时抢救，转到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又精心治疗，现在伤口愈合得很好，疼痛已基本消除了，就是感觉到很疲乏。”彭总

听了，笑了笑说：“扶眉战役结束后，我们接着就是一千多里的急行军，直奔兰州。到达兰州后，部队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打了六、七天，每天吃不饱饭，喝不上水，你们又负了伤，流了血，身体一下子恢复不过来！”我说：“医院对我们的生活调剂得很好，早饭是牛奶、饼干，午饭有肉和鸡蛋，这比在家里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彭总随后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全国解放了，将来的兰州市一定会建设得更好，人民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这些都是大家用血汗换来的。”最后，他还亲切地勉励我们说：“安心养伤，好好恢复身体，返回部队后要担负更重的担子。”我激动地向彭总表示：“感谢彭总对我们的关怀，你的教导我一定牢记心中，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取早日归队，参加解放大西北。”

彭总来到一位面色苍白憔悴的重伤员的铺前，他的半截身体露在外头。彭总便弯下身子，用双手把被子轻轻地给他盖好。这位重伤员向彭总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彭总亲切地对他说：“好好休息，好好养伤。”随后，彭总又走到重伤员刘炳仁同志的铺前，握住刘炳仁同志的手，亲切地问道：“你是哪里人，怎样参军的，现在那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是在什么地方负伤的？”刘炳仁同志觉得躺着同彭总说话不礼貌，赶忙用双手撑着铺，竭力想坐起来。彭总连忙伸出双手扶着刘炳仁同志的肩膀说：“躺下、躺下，不要起来，睡下慢慢说吧。”刘炳仁同志心里很激动，眼里含着泪水，他回答彭总说：“我是四川人，去年冬被国民党从学校抽兵补到青年军，后来又调到西北来打内战。5月21日在陕西省麟游县解放入伍，入伍后，在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兰州战役开始后，分配我到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作战地宣传，在沈家岭战斗中负了伤。我负伤之后，各位领导和同志对我十分关怀，经常来看望我，今天彭司令员又亲自来看我，我感到很惭愧，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彭总见他的胳膊露在被子外，便轻轻地给他盖好，并问他：“你对医院的护理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刘炳仁同志说：“很好。医生、护士都是刚解放过来的同志，但他们在工作中都很负责任，诊断很仔细，护理也很耐心。”彭总听了很高兴，转过头来望着军代表和跟随的医生、护士，

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后勤的同志还要多想些办法，把伙食办得更好些，在医疗上还要继续提高技术水平，端正服务态度，尽量减轻伤病员的痛苦，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当我们怀着崇敬和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彭总之后，我的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别忘了有病的同志”

张成有

彭总对部属很关心，有谁病了，他总要抽空看望，问寒问暖，安慰有病的同志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1948年8月，部队准备打澄城、邙阳。行军路上，我负责设营。这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部队冒雨行进，步履艰难。我们设营的几个同志急着赶路，心想早点到宿营地，号好房子，使同志们一到就能进房休息。在过一条大沟时，因马失前蹄，我连人带马摔到了沟里，把脚脖子扭伤了，寸步难行。同志们把我扶上马，才赶到驻地。彭总知道我摔伤了，特地抽空来看我。他一进门就说：“张成有，摔得厉害吗？不要紧吧？”我一见彭总进来，急忙坐起来说：“不要紧的，只是脚扭伤了，脚脖子肿起来了。我的左脚1942年在冀中打日本时负过伤，又经这么一摔，走路不大方便，但过几天就会好的，请彭总放心。”彭总说：“好好休息，伤好了，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去做哩。”

彭总走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彭总是西北野战军的统帅，军务繁忙，日理万机，对我这么一个普通干部，这样一点小小的伤病都挂在心上。这种阶级深情和爱兵精神，是多么高尚纯真，难能可贵，感人肺腑啊？彭总不光是关心我，对其他同志也同样关心。每逢党中央给他送来国际友人赠送的糖果、饼干、香烟等礼品时，他总是叫警卫员分给司令部各科同志，共同品尝，并特别嘱咐别忘了有病的同志。每当我吃着彭总转送的糖果时，真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彭总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床上再也躺不住了。等脚脖子消了肿，我就又担任了设营任务，腿一拐一拐地重新上路了。

更使我感动的是彭总始终把我们伤病记在心上。西安解放后，部队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比较重的伤残疾病也有地方治疗了。彭总亲自批准我去住院，叫我把脚上的弹片取出来。我在西安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脚上的病基本上治愈后，就赶到兰州，又回到了彭总的身

边。

(胡勤文 整理)

彭总生活小故事

陈明 庞雨水

彭总在生活上艰苦朴素是全军闻名的。在战争年代，彭总有一个习惯，每顿吃剩下的饭菜总是让警卫员带上，下顿热热再吃，我们嫌麻烦，有时当着彭总的面也说几句俏皮话：“当司令员的，不管走到哪里，还怕没有饭吃，经常带剩饭剩菜，真寒碜。”当他听到我们“带刺”的意见时，也不生气。总是微笑着耐心开导说：“人民生产的粮食我们要爱惜，不能浪费。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苦，我们应该节衣缩食，能有剩饭剩菜吃就不错了。”记得1948年3月在宜瓦战役中，国民党第29军中将军参谋长刘振峙被我军俘虏，因工作需要，一天，彭总接见了，谈话后留他一同进餐。刘振峙一走进饭堂，见饭桌上只摆着四个很一般的菜，吃的饭是苞谷压碎做的糝子饭。刘振峙愣住了，惊讶地说：“彭总司令德高望重，生活这么俭朴，堪称中华民族的楷模，钦佩，钦佩。在我们那边，团长、营长的饭菜，不知要比这好几倍哩。”彭总说：“我平时的伙食，要比大灶强多了。今天要不是为了欢迎你，是不会做这么多菜的。”刘振峙听了彭总的话，不停地点头，对彭总艰苦朴素的美德，赞佩不已。

全国解放后，彭总常到事务处检查帐目，了解他的粮食、菜金是节余还是超支，要求很严格。1950年春季，正是兰州蔬菜青黄不接的季节。管理人员见彭总整天操劳，想弄点新鲜蔬菜，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一天，管理人员拿来点新鲜黄瓜，炊事员高高兴兴地做好放在饭桌上，心想这一下可给彭总开开胃口了。彭总一走进饭堂，见饭桌上摆着一盘新鲜黄瓜，就皱起了眉头，忙把管理员叫去，问黄瓜是哪弄来的，多少钱一斤？当他知道黄瓜四千元（合四角钱）一斤时，就循循善诱地说：“买这么贵的黄瓜给我吃，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为这件事批评你们，你们会感到冤枉。同志，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还有许多困难。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人民群众来，要好得多

了。往后，再不能买这么贵的蔬菜了。” 管理员听了彭总的话，深受教育。

彭总在穿的、盖的、用的方面，也非常俭朴。夏天，他穿一套灰色单军服，洗得颜色发了白，还不肯换；冬天，穿一身粗布棉衣，袖口和膝盖磨得油光发亮，同战士没有两样。太原战役前夕，彭总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去北京开会，车进城门时被哨兵挡住了。因彭总穿的是粗布棉衣，不象个司令员的样子，哨兵盘问了一会，才让通过。这件事在干部战士中当作趣闻，传为美谈。彭总酷爱读书，养成了夜晚看书的习惯，在战争间隙也不例外。一天晚上，彭总围着火盆看书，因注意力高度集中，木炭火崩出来，把他的棉裤烧了碗口那么大的一个洞也未发觉。第二天，各野战军领导请彭总去合影，彭总因棉裤上烧的窟窿未补好，就婉言谢绝了。彭总盖的是一条又旧又薄的军被，管理人员多次要换，他就是不同意。西安解放后，我们和彭总一起搬进原国民党航空俱乐部的房子。一天晚上，因房顶上的电线拴得不牢，电灯泡滑了下来掉在床上，把被子烤了一个洞。四科（即管理科）的同志说，这一下被子总该换换了吧。彭总说，不就这么一个洞吗？补补还可以盖。彭总有一支又粗又长的骆驼牌钢笔，不知用了多少年了，笔套上的挂钩都断了，使用携带都不方便。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批钢笔，管理人员要给彭总换一支新笔。彭总说：“钢笔能写字就行。我这支笔虽旧，用惯了，还舍不得换哩。你们把新钢笔发给没有钢笔的同志吧。”

（马程 胡勤文 整理）

“要开会‘斗争’你哩！”

陈明 庞雨水

就在这时，彭总有几次未带警卫人员，一个人外出，来到街头巷尾，与人民群众交谈，了解社会情况。这可把我们警卫人员急坏了。我们警卫班同志通过集体讨论，想出一个好办法，决定召开一次班务会，请彭总参加，严肃认真地对他进行批评，制止他私自外出。一天上午，陈明正式通知彭总：“今天晚上我们开班务会，请你一定要准时到会。”彭总问：“有什么事？”庞雨水同志做了个鬼脸说：“要开会‘斗争’你哩！”彭总笑了笑说：“好吧，我一定准时到会。”会议开始后，大家发言很热烈。这个说，彭总常私自外出，这是违犯纪律。那个说，首长外出，当然用不着向我们这些当小兵的请假，但总要给我们说一声，这个要求并不高，也是能够做到的。有的说，彭总今天要明确表态，看我们大家提的意见对不对，并要说说你准备怎样正缺点？彭总自始至终很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有时连连点头，有时称赞某个同志的意见提得好，会议开的生动活泼，彭总高兴，大家也满意。彭总最后说：“今天大家提的意见很好，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今后，我外出时，一定和警卫班的同志打招呼。但我也给大家提一条建议：制定警卫制度，一定要有利于接近人民群众，有利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民群众的反应。”

（马程 胡勤文 整理）

贺老总在我们中间

周 龙

雪山、草地、奔走，战斗，漫漫二万五千里，留下了无数官兵生死与共的动人故事。我在贺龙同志身边当警卫员时有两件事使我至今难忘。

绝不能丢下一个伤病员

那是1936年的4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康藏高原。孟夏时分，该是百花盛开的季节，然而，这里却是白雪皑皑，终日严寒。变幻无常的天气，一会儿卷起积雪，抛向天空，一会儿露出一脸笑脸，投下几缕阳光。过不多久，又是凛冽的寒风。即使是全晴的日子，太阳只象一个淡红的火球，虽好看却不发热。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红军穿得又很单薄，粮食也不足，加上大家对高山反应一时难以适应。要通过一座座雪山是多么的不易啊，要付出多少惊人的代价呀！

记得离开巴安的第三天，一座雪山又横在我们面前，堵住了去路。我们警卫班紧紧跟着贺老总和总部领导前进。望着巍峨的雪峰，看看贺老总虚弱的身体，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多么希望雪山突然消失，给红军让开一条大道呀！即使雪山依然挡道，能换上个好天日也好。老天爷好象不理解我们似的，还是拚命地刮着寒风，飘着雪花。贺老总似乎看透了这些十四、五岁小鬼们的心总，大踏步走到了前面，兴致勃勃地说：“队伍走到前面了，我们还能落后？”说罢，迎着寒风加快了步子，不一会就把我们甩到了后面。我们受了鼓舞，很快赶上了贺老总，无形中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可是，越往前山越陡，我们由走改为爬，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贺老总喘着粗气，一边艰难地走着爬着，还不时转过身来招呼我们。雪越来越厚了，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脚上像坠了石头迈不开步子，胸口象压了磨盘喘不过气来，肩上象压着千斤重担难以支撑身体的平衡，我们不得不走几步停下来喘一喘气。这时贺老总给我们做了

个手势，示意大家手拉着手前进。我们互相依靠着，踏着两尺多深的积雪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有的同志腿肚子被锋利的冰渣划破了，流着血走；有的草鞋陷进了雪窝里，赤着脚走。刚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狂风裹着雪片卷起积雪，一时间天昏地暗，分不清东南西北，前后左右，迈不开步，睁不开眼，风雪严重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我们一时没了主意，惊恐地站在没膝的雪窝中不知所措。这时耳边忽然响起了贺老总的声音：“同志们，传我的话，打开背包，把被子披起来，不能停，一定要爬过这座雪山！”凶恶的暴风雷虽然吞噬了他的声音，但是，他的话很快就传到了同志们的耳朵里，大家迅速打开了背包，披上了被子。我们也照做了。借着一阵风雪滚过的瞬间，我看见贺老总裹着一条军毯站在积雪里，全身披着白雪，黑胡须上也挂了白，他那明亮的眼睛透着坚毅的神色。他见同志们照着做了，这才转身又迈开了步子。正走着，贺老总又停了下来，我们定睛一看发现不远处的雪窝里坐着三、五成群的战士，他急忙对我们说：“快去问一问，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前一看，只见他们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周身打战。一打问，才知道他们是因饥饿疲劳掉队的。由于长时间受寒，营养不良，虚弱的身体也无法支撑了，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谁都知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死亡的威胁。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贺老总走到了跟前，知道情况后，二话没说，用命令的口气对我们说：

“快扶他们上马！”

在暴风雪中，贺老总身体那么虚弱，他都舍不得骑马。上山以来，马一直是让我们牵着的。我们对马象对一位无言的战友那样爱抚，在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下，它就是我们的最好助手。如果按贺老总的命令办，首长要是万一……

“还不快一点嘛！”贺老总见我们迟疑不决，懂得我们的心思，就说：“救他们要紧。”接着，便和我们一起把一位同志扶上马，然后他对其余的同志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把他送过山就来接你们。”路上我们轮换着在前面牵马，贺老总一步不离地跟在马后面，催促我们赶路，他心中惦记着还留在身后的战士。翻过雪山，我们见他十分疲劳，

劝他不要去了，我们一定会把留在山上的同志安全接下山的。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他干脆拉上了马，对我们说：

“我比你们能行哩。”

我们只好依了，跟着他又上了山。就这样，我们来回翻了四次雪山，开始一匹马驮一个人，后来就驮两个，马走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有的同志身体过于虚弱，在马上坐不住，贺老总就在马旁扶着他们。当我们帮助三十多位掉队的同志翻过雪山，已是深夜了。贺老总说：“再给各师申述我的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绝不能丢下一个伤病员！！”

一把青稞见深情

翻过雪山进了草地，严寒过去了，饥饿却没有解除，我们还处在长征途中最艰苦的阶段。长时间的饥寒交迫，贺老总那宽宽的脸膛瘦成了长方形，浓黑的八字胡竟占去了脸部的四分之一，身体是那么的单薄，本来合身的衣服，也大了许多。我们看着这些，心里非常难过。作为警卫战士，没有照顾好首长，这是失职。可贺老总常常劝慰我们：“饿了才有决心走出草地，长征胜利了自会有吃的。”听了他的话，我们更不安，路还远，前面还有无数艰险，他是全军的总指挥呀，不能倒下。于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弄吃的，想照顾好总部首长的身体。

一天，宿营了，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块老乡收过的青稞地，心情十分激动，心想这一下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了。我立即喊来了其他的几位警卫员，我们一粒一粒地从地缝里扒，一粒一粒地从土块里拣。可是，青稞是那么的小，心越急，越觉得小，拣呀拣，一个多小时去了，还不足一把。我们把一块地走遍了，才拣得、三两，只有一大把，虽然有些丧气，可毕竟比没有强呀。我们看着一粒粒青稞，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啦，我们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跑回了营地，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茶缸，生怕掉了一粒。我们围着火堆，有的架柴，有的吹气，盼着火旺，盼着早熟，似乎茶缸里装的不是青稞，而是我们的心。

青稞终于煮好了，我们端到了贺老总的面前。他一见，笑了，说：“小

鬼们，改善伙食，有办法哟。”

我们听了很高兴，心想，他一定会吃一点的，领下我们的一片深情。可他连一粒也没有吃，笑着推给了坐在身边的关向应同志，关向应又递给了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接过又放在贺老总的跟前，他们推来让去，谁也不肯吃一口。

“大家不吃，你们另行处理吧。”贺老总微笑着把缸子递给了我。望着缸子，看看贺老总，我的心情象翻腾的江河难以平静。草地行军的最大困难是缺粮，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十来天的粮食，原预计半个月就可到达阿坝，可是，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结果走了二十多天才到阿坝。这个地区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之红二方面军是全军的后卫，沿途筹粮就更加困难。虽然红四方面军和先头部队尽量调剂留粮，我们自己也省吃俭用，但粮食还是很快就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整个部队，贺老总领着大家挖野菜、野草，剥树皮、摘树叶充饥。草地上虽然草多，可大部分草是不能吃的，有的草还有毒，吃了全身浮肿，有生命危险。为了防止中毒，贺老总命令全军各部队，组织少数最优秀的党团员干部成立试验组，亲口尝试。他还带头当试验员，亲自品尝野草，鉴别是否有毒，每当发现一种能吃的草，他那消瘦的脸上就出现了笑容，并立即通知部队。有时，前边的部队把路边的野菜挖光了，我们连可吃的草根也找不到了。贺老总又和大家一起寻找羊马牛骨头，这些东西也找不到时，就解下皮带，煮着吃。这些东西吃光了，贺老总就号召大家到河沟里抓小鱼吃，甚至抓飞的蚂蚱吃。他说：“同志们，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嘛！可不能饿死一个人啊！”贺老总啊贺老总，为了整个部队，你也要吃啊，就把这缸青稞吃了吧，这是我们的心愿！想到这里，泪水不由得滚出了眼眶，他一看，忙站了起来，和蔼地对我说：“大家都在挨饿，我怎能咽得下？我们红军官兵平等，有吃的大家一块吃，没吃的大家一块饿着。困难要大家克服嘛，不能只叫你们克服，我们就不能克服啦？我们一起把裤带再勒紧点，到前面就有吃的了！”他又看了看我们围着的几个人说：“明白了吧？送给伤病员们吧，他们更需要补养身子。”看着他那充满期待的目光，我

们只好端着茶缸出来了，把青稞分成了几分，分头送给了总部机关的几个伤病员。

（杨志鹏 整理）

“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

谭友林

1936年，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我得了伤寒病。开始，我还以为是感冒，也没有在意，可是，体温却越来越高，四肢无力，浑身痠疼，头部痛得尤其厉害。同志们虽然时常用炒面给我煮面糊糊吃，可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一天、两天过去了，后来只能喝点开水，什么东西也不想吃。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简直象两根木棒似的。不几天，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更讨厌的是在湘鄂川黔边区打伤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会倒出半杯脓血来。

草地里的气温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走了几天，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上午通常是晴朗的，下午三点钟以后，风雨或冰雹就会猛然袭来。因此，我们行军通常就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宿营。

可是，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一天中午，草地就象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对面飘来一片阴云，霎时，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气温突然降低，大风呼啸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

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爽，没有及时盖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篷。暴风雨一来，我被浇得象个落汤鸡。可是没有料到，这场暴风雨几乎把我的命葬送掉。

暴风雨过去不久，部队就宿营了。当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两条腿绵软无力，眼前金星飞进，天旋地转，还没有迈步，就一头扑倒在帐篷底下，昏迷过去了。

忽然，我觉得一股热气流入了口腔，我用力睁开眼一看，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正在小心地、一勺一勺地向我嘴里灌炒面糊糊。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

这时，我心里想该是日落西山的时刻了，怎么太阳还那么亮呀？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装具，赶快去找东西吃，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

他们跑来跑去干什么？牲口驮子怎么还不放下来？

“好一点了么，老谭？”师长关切地问。我吃力地点点头。

“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

“怎么刚住下来又要出发？”我思忖着。再看看外边，帐篷都拆了，有的战士已经开始行动了；再看看太阳，它又升高了，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显然现在已不是傍晚的太阳，我的天，我不知怎样度过了一个夜晚，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啊！

“还是骑牲口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同志又摸了摸我的额角说：“还是那么烫。”

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昨晚我一直昏迷，师卫生部长连夜赶来看过一次，并给我灌了些药。今天，还要等他来看过，然后再走。

不一会儿，师卫生部长黄家龙同志来了。他蹲在我的身旁，用体温表试了试体温，又听了听心脏，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后来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

这时，部队已经踏上征途，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师长找来一副担架要我躺上。可是，我怎么能躺担架呢？进入草地以后，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不要说抬着一个人，就是空手走路，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我不躺。”

“那怎么行呀！”师长惊异地瞪着我。

“我一个人倒下就倒下吧，决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我断断续续地说。

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了我半天，我仍旧不服从。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

走了一程，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的颠簸！一上一下，象一束针扎似的痛。我知道，由于得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后来变换了姿势，疼痛也难以忍受。于是我就伏在马背上。可是右臀伤口又象火烧般的痛，伏也伏

不稳，有几次，我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把我绑起来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警卫员小李说。

开始他不肯，后来看我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这样，我又昏昏沉沉过了一天。

宿营后，吃了几片药，病情仍旧没有减轻。看来这不象感冒，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我。更糟糕的是，西药已经用完了。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草地里到哪儿去找西药呢？

后来，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方面军首长的健康，他还要负责。在他的建议下，我又被抬到总指挥部。

可是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已终日昏睡不醒。一天，我神志稍微清醒了，耳边突然听到阵阵叹息声，接着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太可惜了。”稍停又说：“杨医官，想想办法吧，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他边说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前额。

“是啊。”另一个人回答。

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一个魁梧的蓄着黑胡子，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和另一个比较苍老的，脸颊瘦削的人，蹲在我的担架旁边。

这是谁呀？我仿佛认识他们。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终于从他那坚毅有力的嘴角上认出来了：贺总指挥！那个年纪稍长的，就是杨医官。

我好象有什么委曲似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过去，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在贺总指挥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到他，我就象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十分温暖。

此后，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中挑选出几个强壮的战士抬我，而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亲

自煎汤药给我吃，或者请炊事员同志为我做点什么可口的东西。到了包座，我的身上开始脱皮，病渐渐好了。这时，我不忍心再坐担架，要求领导上发牲口给我骑。从包座出发的那天，我刚跨上骡子，那匹不驯服的畜牲，后腿突然一跳，把我摔下来了。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骑上去很平稳。

走了半里多路，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地对我说：“五十服草药呀，整整五十服。”

是啊，我想救活我的不仅仅是五十服草药，而是用数字无法计算的阶级友爱，贺总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正是敬爱的贺老总、任政委和贺师长、杨医官及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中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士，用他们那颗充满阶级友爱的心，把我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使我再次获得生命。

一袋炒面的故事

陈仕南

长征途中，我在贺龙同志身边担任副官。1936年9月初，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的行军，爬雪山，过草地，来到了甘肃的哈达铺。一到这里，贺龙同志就下令清查人数。当发现还有不少同志没跟上来时，心情十分沉重和焦急。他惦念着掉队同志的生命安全，便马上把供给部的同志叫去询问：“我们的干粮还有多少？”供给部的同志回答说：“还剩下百余斤炒面。”贺龙同志就把我叫到跟前，要我找一头骡子，把仅有的这一点儿炒面驮上，并带一个骑兵连，立即返回草地，去寻找掉队的同志。他以深沉而又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掉队的同志都是洪湖地区的老同志和骨干，是我把他们带出来革命的。我们走出了草地，他们都掉了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要救活每一个人。仕南同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吧！”虽然当时我很疲劳，但看到贺龙同志对阶级兄弟大海一样的深情，怎能不被感动！我立即按贺龙同志的吩咐，返回经过千难万险才走出来的草地。

草地苍苍茫茫，一望无际。天气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阵风一阵雨，一时雪一时冰雹，反复无常。沼泽地更是危机四伏，一不小心陷了下去，没人拉你就很难爬上来。说实在的，我们能从草地活着出来的确不容易。如今要返回草地，大家心里未免都有点儿嘀咕。但想到掉队的战友，想到贺龙同志的殷切嘱托，大家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夜以继日的向前赶。

原先部队在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时，按路程估计十五天完全可以走过来，所以每个人只准备了够吃十天左右的炒面。由于道路艰险，气候恶劣，加之部队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结果，有的人走了十来天，才走了一半路程，但口粮却快吃完了。当时，上级通知叫一天的口粮要分两天吃，其余的挖野菜、草根来代替。但到后来，连草根都挖光了。在断粮的情况下，又遭受风雨、冰雹的袭击，掉队的同志有的就是在这种极

端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倒下去了。我们在草地整整找了三天，发现掉队的战友一个个都是气息奄奄了。有的同志被拉起来后，一放手就又瘫了下去，我们赶紧用水搅拌着炒面喂他们，等他们慢慢苏醒过来，就鼓励他们继续前进。我们让这些同志骑在马上，没有马骑的，我们就抬着或搀扶着向前走。就这样，我们收容了近百名同志。当这些同志得知是贺龙同志专门派人来寻找他们的，而自己吃的炒面又是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一口一日省下来的时，一个个热泪盈眶，感动地说：“贺老总这袋炒面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们带着掉队的同志返回哈达铺后，贺龙同志的愁眉舒展开了，脸上现出了笑容。他高兴地说：“仕南同志，你们救回这么多同志，任务完成得很好！”

时间的帷幕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贺龙同志离开我们也好多年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长征途中这段往事，脑海中就浮现出贺老总高大的形象，耳边就好似又响起他深情的话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替他打保票”

谭友林

在周逸群、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湘鄂西地区的工农红军曾经得到极大的发展，组成了红二军团（后改名为红三军），创立了长江两岸的大块根据地，革命形势大好。但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派到湘鄂西地区的夏曦同志，下车伊始，就给红三军扣上了一项“一贯右倾”的帽子，下令取消了红三军的番号，撤销了军、师指挥机关，把部队整编为五个大团，由他自己直接指挥，排斥了贺龙同志的领导。结果给革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对着接踵而至的挫折，夏曦同志不但没有丝毫的反躬自省，反而更加错误地断言：“湘鄂西的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湘鄂西的苏维埃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洪湖苏区之所以失败，主要是肃反不彻底，是有国民党改组派在红军内部捣乱”。于是，他以中央代表、湘鄂西分局书记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把贺龙同志排除在外的“肃反委员会”、大搞“逼、供、信”在红军内部抓起“改组派”来。一大批跟随贺龙同志多年，创建湘鄂西根据地有功，对错误路线不满的同志，被捆押，甚至惨遭杀害。当时，贺龙同志的处境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要求他必须坚决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也只能在党章党规所允许的范围内来开展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贺龙同志自己也被他们划入审查范围。只是由于夏曦自己不会打仗，敌人来了，毫无办法，加之贺龙同志在红军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所以才没敢明目张胆地触动贺龙同志。眼看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自己却无力制止，可想而知，贺龙同志当时在精神上是忍受着怎样的痛苦了！

只要是真金，就不可能让它不发光。尽管环境如此恶劣，贺龙同志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宝贵的力量。

贺龙同志不相信有这么多的“改组派”，但又不完全了解一些同志

的全部历史，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而夏曦却能拿出用“逼、供、信”手段得到的一整套“罪证”。所以他才硬着脖子喊：“铁证如山！谁驳得倒？”要驳倒它，必须在全国范围作实事求是的周密调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能办得到呢！

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贺龙同志就咬住不放，力争到底。贺炳炎同志是湖北松滋县人，从小在一家铁匠铺学徒。1928年，贺龙同志从上海回到湘鄂西，发动洪湖地区的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立了苏维埃政权。那年，贺炳炎才十四岁，他的家离苏区不远，听说红军是为工农群众打天下的军队，便自动跑到苏区来，给红军喂马。喂了几天，大家嫌他年纪小、个子矮，又想不要他了。他嚎啕大哭，闹得不可开交。恰巧贺龙同志从那里走过，见他哭得伤心，就说：“好，好，好，留下就留下！讲好一个条件，不准哭！”就把他带到身边。不久，人们发现，别看他个子矮小，打仗却很能干，一听到枪响就往前冲，按也按不住。有一次，他赤手空拳地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支枪。贺龙同志也有意识地把放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去锻炼。一次部队刚从洪湖拖出来，非常疲惫，敌人的追兵却越来越近。想要停下脚，杀他个回马枪，又摸不清敌人的情况。贺龙同志有意考验贺炳炎：“有个危险任务，你敢不敢去？”贺炳炎说：“你说嘛！”“抓他个俘虏来！”贺炳炎满口答应：“可以！”贺龙同志严肃地说：“娃儿，不要开玩笑的哟！”这句话好象伤了贺炳炎的自尊心，他不以为然地撅起嘴：“那你等着看嘛！”说罢，紧了紧腰带，转身就不见了。不出一天，果然抓了一个俘虏回来。那家伙，个子比贺炳炎高一头，半截塔似的，却被他倒剪双臂捆起，嘴里塞了破布，制得服服贴贴的。后来，贺炳炎在汉川独立团当团长，在天门、应城、荆门、当阳一带独立活动，神出鬼没，声威大震，有力地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翼侧安全。打起仗来，他总是冲在最前，退在最后，因此，负伤次数也最多，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两次。但是，他满不在乎，裹着绷带照样打冲锋。他负了伤，好得也快。人们说他的血好，他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塌塌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这样一员土生土长的革命虎将，而且跟夏曦一起打过许多仗，

可以说，夏曦能够活下来都是靠他保驾的。“肃反委员会”却因为某个“改组派”供出来和他一起下馆子吃过饭，就说他们是开黑会，搞阴谋，竟下令把他捆了起来。贺炳炎当然不服。

贺龙同志发现后，亲自去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吗？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吗？他十四、五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拣回来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别人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清楚！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难道对我也相信吗？”夏曦无言以对，被迫把贺炳炎放了出来。

樊哲祥同志是军部参谋处的油印股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红三军公认的秀才。就因为他有文化，平常又爱帮人写个信、念个信，也被当成“改组派”抓了起来。但是他很坚决，既未屈打成招，也不乱咬别人。由于没有证据，只好放掉。可是，没有多久，又因别人牵连被关起来了。这一来，军部就没人写字了。“这怎么行呢！”贺龙同志找到“肃反委员会”，建议把他放掉。得到的回答是：正在审查，不能放。贺龙同志拗不过，只好说：“审查可以，必须保住他的双手！不然，审查完了，不是改组派，可手被捆坏了，写不成字，谁负责呀！”在贺龙同志的一再催促下，过了一段时间，樊哲祥终因“罪证”不足，又被释放。

一个人被定为“改组派”，必定会有很多同志受株连。原红八师师长被打成“改组派”，谷志标同志是八师的政治委员，于是就成了“当然的反革命”。贺龙同志听了，气得脸发青，怒气冲冲地说：“道吗？他是老子从洪家关带出来的。他是不是反革命，我还不晓得呀！别人我不打了保票，谷志标我打保票！我向党负完全责任，他要是反革命，连我贺龙一起捆！”说到这种程度，谷志标同志才算保住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长遭杀害，当警卫员的也不得脱身。我给红九师三位政治部主任鲁易、刘赤光、吴瑞卿当过警卫员，他们先后被杀之后，我也被捆了起来。那是1932年下半年的事。当时，蒋介石正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单是进攻湘鄂西的白军就在十万人以上。由于洪湖地区遭受水灾，庄稼歉收，部队粮食无着落，加之弹药短缺，伤员无处安置。为了不被敌人消灭，我军主力打到豫南，准备去

和鄂豫皖地区的兄弟部队会合，因敌军封锁严密，就取道陕南、川东，兜了一个大圈子，准备回到山高林密、基础牢固的湘西地区去。七、八千里路程，除了跟饥饿疲劳、凄风苦雨作斗争之外，还要随时随地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确实是非常艰苦。尽管如此，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我被看押着行军。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一年前的一天，部队正在攻打郝穴，那里离我的家乡谭家巷不远。我站在一条大河的桥头上，远远看到我们村头上的土地庙，心里盘算：打下郝穴来，我就请假去看母亲和妹妹。正在这时候，从背后走来几个人，最前面是一个身材魁梧、长方脸、留着一字胡子的首长。虽然那时我还没见过贺龙军长，但从那胡子的特征上，我却一眼就认定：准是他！我的心直跳，闪到一边，想躲开他。但他却看到了我，问道：“这是哪个？”我急忙立正，报告说：“鲁易主任的警卫员，我叫谭友林。”贺龙同志大嘴一咧，爽朗地说：“啊！是谭娃儿啊。”大概是他听出了我的口音，又扶住我的肩头问道：“家住哪里？”我给他指了指那座土地庙。他望了望：“嗽！谭家巷嘛。”又问：“家里还有啥子人？”我说：“母亲和妹妹。”贺龙同志惊异了：“咦！还是个孤娃娃！”他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体贴地说：“好嘛！打完郝穴，回家去看看。”我应了一声。大概是他见我始终那么拘束，想跟我开个玩笑，他眉毛一扬，忽然冲着身边的警卫员发问：“你们看，谭娃儿像不像个老学究？就差戴副老花眼镜了吧？”紧接着，他从随行人员的手里抓过一管毛笔，喊道：“来呀！快给谭娃戴上一副！”说着，就举起毛笔朝我走来。那几个警卫员也跟着起哄，一拥而上，把我按住，嘻嘻哈哈，在我脸上胡涂乱抹起来。我躺在地上死命地叫着，哇哇大哭起来。贺龙同志一边帮我擦泪、洗脸、掸土，一边笑着说：“这娃儿不识耍，这娃儿不识耍。”贺军长真像个娃娃头儿似的，一点架子也没有。

想想那时候，上下级之间是那样亲密；看看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这时候，能碰上贺龙军长该多好啊！”我心里这样念叨着。但我也明白，这只不过是空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知道，红军还没有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为了把部队从敌人的虎口里拖

出来，带到安全地区去，他一直在前卫指挥部队跟敌人周旋。军情这么紧，他哪里顾得上其它？再说，被捆的“改组派”这样多，每个团都编了一个由“改组派”组成的“第三连”，贺龙同志即使浑身长手，又能按得住几条鱼呢！何况我是个娃娃，只跟他偶然见过一面，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事情又那么多，怎么还能认得我呢？

我正在低头走路，突然路旁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这不是谭娃儿吗？”

好熟悉的声音！我不由心头一震，难道是贺龙军长？我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存着侥幸心理，扭过头，朝说话的方向望去。啊！浓黑的一字胡，方脸，魁梧的身材，正是他！

原来，经过野三关之后部队就进入了鹤峰地界，这是红军多年活动过的地方，一到这里，就比较安全了。因此，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才有可能腾出身来，站在路边，察看一下后卫的政治机关的情况。

看到贺龙军长，我好象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贺龙同志见我双手被捆起，还让人牵着走，很生气地嚷起来：“你犯了啥子纪律？”

牵我的战士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同志一听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个‘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娃儿嘛！”说到这里，他的声调都有点变了。

我心里一热，军长统帅千军万马，竟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娃娃记得这么清楚！

站在他身旁的关向应政委也说话了：“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意放哩！”

贺龙军长听了，对关押我的一个“肃反委员”说：“快把谭娃娃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

绳子松开了，我扑过去，叫了一声“军长！”腿一软，就像一捆稻草似地晕倒在地上了。……

我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又被接回到贺龙同志的身边。他高兴极了，让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碗鸡蛋炒米饭，我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自己蒙冤被捆的经过。他坐在一旁叼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插话：“还有呢？”“后来呢？”我讲着讲着，慢慢地他不再插话了，抬头看时，我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呆了。只见他叼着烟斗却忘了吸，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好象不认识我似的。鼻孔大张着，一抽一抽地，一字胡的两角也上下急剧地抖动着。突然，他猛地抽泣了一声，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急忙站起身，躲开我的眼睛，急步来回走动起来，好半天，才平静下去。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贺龙同志曾经营救过我和许多无辜的同志。我们对他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的无畏精神，是镂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没有牺牲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王明路线的屠刀下，竟然会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每想到这里，我总是无限愤慨，无比痛心！

让我们真正学得聪明一点，更聪明一点，永远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吧！让我们象他老人家那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勇敢地捍卫我们亲自创建的伟大事业吧！

“要讲讲风格啊”

谭友林

贺龙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一贯尊重党中央，十分关心兄弟部队，只要是对革命有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他常对部属讲：“要讲风格啊！打仗不是靠那一家嘛！”“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在晋西北工作的时候，本来那儿条件就非常艰苦，但他总是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兄弟部队。

1940年底，我作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来“七大”延期举行，我们这些从敌后来的军队代表于1941年上半年组成军事六干队，学军事、学政治。杨勇同志任六干队队长，我任支部书记。当时，敌人正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六干队刚成立时，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困难。我们这些同志都是从敌后各个解放区通过重重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的，大家除了身上穿的几件单薄的衣服外，其他一无所有。杨勇同志和我商量说：“能不能派人到晋西北，向贺老总求援？”我说：“可以去试试。”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了两个同志到晋西北去找贺老总。过了不多久，这两个同志赶着几匹骡子给我们驮了一大批军需品，有衬衣、鞋子、毛巾，还有牙膏、牙刷、纸张、铅笔、笔记本等日常生活用品。另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费。回来的同志讲：“贺老总看完你们的信以后说，困难啊！我们大家都很难，但是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更困难，我们自己要勒紧裤带，尽力支援兄弟单位，减轻中央的负担。”一二〇师的同志支援我们的消息，象春风送暖一样，很快在全体队员中间传开了，大家都非常感动，决心以好好学习的实际行动来感谢贺老总和一二〇师同志们的深情厚谊。

请将不如激将

谭友林

贺老总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足智多谋，粗中有细。他威震敌胆、驰名中外。他一辈子打了许许多多的大仗、恶仗和胜仗。他用兵有方，赏罚严明。

1935年上半年，蒋介石调集湖南、湖北二十多万反革命武装对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敌军多我十几倍，众寡悬殊。贺老总胸有成竹，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诱敌就范。他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利用湘鄂西山区的有利地形，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当时，我在红二军团六师新组建的十七团任政委。这个团只有一营是老部队，二、三营都是刚扩充的新兵，装备也比较差，好多战士拿的还是梭标。因此，方面军首长很长时间没有把我们当主力使用，我们多次求战均未批准。看见兄弟团队打硬仗，当先锋，而没有我们的份，全团干部战士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对于我们的心情，贺老总是十分了解的。当时我们团的干部都是二十岁左右，荣誉感强，不甘落后。贺老总对年轻干部的脾气摸得很透，常常用激将法激我们。他总是说我们翅膀没有长硬，打不了大仗、恶仗，急得我们团的干部一个个都气鼓鼓的。

三月份，在攻打高粱坪战斗中，敌人居高临下，在起伏不平的山坡上构筑了一些简易工事。山下是一片还没有插秧的水稻田，田间小道泥泞难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兄弟部队已经打了两天，虽然给予敌人很大的打击，但还没有把全部据点拔掉，非常需要增援部队。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团的干部又一次推举我去向贺老总求战。贺老总见我又去求战，从他微露笑意的眼神中，我猜出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早就想找一个合适的战机来锻炼一下我们这个新组建的部队。但是他在表面上，却仍然装出不大放心的样子说：“你们能行吗？这可是一块硬

骨头呀！”贺老总严肃起来，两眼炯炯放光，深沉地看着我：“这块骨头再硬也要啃掉它，因为它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拦路虎’！”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团保证拿下这些据点！”贺老总看我如此心切，爽朗地笑了起来，并和关向应政委交换了个眼色。关政委对贺总的意图心领神会，就以调解的口气说：“十七团的同志们求战心情既然这么急切，不妨让他们上去试试看吧！这也是考验他们有没有战斗力的好机会。”贺老总又饶有风趣地答腔了：“好，看在关政委的面子上，让你们十七团上去试试看吧！”尔后，他简短明了地向我交待了注意事项，教我如何动员部队，如何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地接近敌人，如何使用突击队和预备队，等等。

真是请将不如激将。从贺老总、关政委那儿受领战斗任务后，我一路小跑赶回了团部，迅即向全团干部、战士作了简短的动员，整个部队群情激奋，个个磨拳擦掌，决心打个漂亮仗，来个“开门红”，为新编十七团争个好荣誉。黄昏时刻，我们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敌人发起了攻击，由一营打先锋，二、三营尾随而上，一鼓作气拔掉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剩下的敌人狼狈逃窜，我们乘胜追击几十华里。高粱坪一仗，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共击溃敌人两个保安团，重创敌增援第十六师两个团，并歼其一部，缴获很多枪支弹药。从此，我们全团的梭标统统都换成了长短枪了，轻重机枪按编制还有多余的。

贺师长和我们一起搬神像

张 钦

1937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太原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十几个平时比较要好的青年，原在阎锡山的兵工厂、机器厂里做工，听说城郊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就决心逃出魔爪，参加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

1938年7月下旬的一天，终于在太原西北郊的上兰村，找到了八路军120师3支队的李秋月同志。我们向李秋月同志说，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有的是车工，有的是铣工，有的是锻工，有的是钳工，有的是木工，能制造机器，生产枪炮，要求参加八路军，扛枪打日本，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李秋月同志知道我们都是有七、八年工龄的技术工人后，连忙说：“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第二天一早，三支队长曾来古同志，派人把我们送到120师师部驻地——岚县。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贺龙师长要开会欢迎你们。”听到这一喜讯，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过不几天，贺师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那天，他穿着灰色的军装，朴素、整洁、大方，脸上堆满笑容，态度和蔼可亲。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并说：“欢迎同志们，欢迎同志们。”初次与贺师长见面，我们大伙的心情是既高兴又紧张。贺师长问我们是哪里人，在工厂里都干些什么活？我们一一作了回答。贺师长说：“工人兄弟参加自己的队伍八路军，是件很光荣的事。你们都是技术工人，不但能修枪修炮，还能造枪造炮，我们部队非常需要象你们这样的人才。我们有一部分枪炮坏了，得不到及时修理，你们的到来，真是‘雪里送炭’啊，你们的技术在部队里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说句笑话，你们可是我们部队的‘宝贝蛋’哩。”贺师长的话，不但把我们说笑了，同时，我们也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接见后，贺师长特意设宴款待我们。席间，他先给我们每人敬了一杯酒。过了一会儿，他端起酒杯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120师修械所正式成立！我们共产党人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今天，我们要在古庙

里办修械所；明天，我们要打开太原城，进军西安市，解放全中国。我们将来要修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希望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应有的贡献。干杯！”贺师长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站得高，看得远、出语惊人，落地有声，铿锵作响，令人振奋。大家情绪无比激动，端起酒杯，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开过欢迎会，我们穿上了军装，成了八路军的正式兵工战士。第二天，陈处长带领我们到南门外一座破庙里看了一下。庙里满布蛛丝，神像东倒西歪，看样子早已断了香火。处长让我们把这些残缺不全的神像搬掉，把工房建起来，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干一番。我们听了陈处长的话，由于文化低和旧的迷信思想的束缚，当场就议论纷纷：有的说，听老人讲，神像是千万动不得的，否则，神灵发怒，就不得了；有的说，一动神像，眼要瞎，耳要聋，肚子要痛，身上要长疮流脓，那就活不成了……这些情况被贺师长知道了。一天，他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作了简短的动员。贺师长说：“中国的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经济上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思想上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封建迷信的毒害。我们干革命，就是要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制度，使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要使自己的思想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建迷信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他又说：“神像是泥塑木雕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奴役我们穷人的精神枷锁，吓唬我们，欺骗我们，不准我们造反，不准我们革命。妄想使我们服服贴贴地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鬼把戏！”贺师长这一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既新鲜，又有道理。接着，贺师长和我们一起，用绳子捆在那些断臂少腿的残破神像上，一个又一个地把它拉倒。每当推倒一尊神像时，贺师长就大声问我们：“同志们肚子痛不痛啊！”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贺师长和我们一起搬神像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课。此后，我们就在古庙里建起了工房，修枪修炮：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多次受到贺师长的赞扬。

（胡勤文 整理）

贺老总送我两件“宝”

曾 征

初次见面

提起贺龙同志，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平时，同志们总是亲切地叫他贺老总，也有的老干部，背地里称他“贺胡子！”说起“贺胡子”，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呢。听人说：贺龙同志从十八岁开始留胡子，可有些资历了。他之所以留胡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们看，那些地主、老财总是爱留胡子，闲暇无事，就爱摸摸它，显得威风凛凛！我也要留胡子。我不是想当地主、老财，而是要和他们比一比，看谁的胡子留得好！留得好看！这类传奇式的故事，是真是假，我听了不少，可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贺龙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贺老总，是在1937年元月中旬的一天。

1936年10月，我在红29军256团任团长。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带行李去“红军大学”报到。说来也巧，刚放下背包，就碰见江西“红大”时的老同学周士第同志。课余时，周士第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贺龙同志的故事。我常想，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名震遐迩的贺老总该有多好啊！

在学习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

元月的陕北，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加上刚刚下了场大雪，整个大地一片白茫茫的。由于我们急着收拾行装，准备赶路，谁也顾不上欣赏那美丽的雪景。我们告别了“红大”，踩着积雪，向南急进，于元月中旬的一天中午，赶到了三原县的云阳镇——前线总指挥部。

第二天，前总将我们五、六个人介绍去二方面军二军团指挥部报到。

我们刚走进指挥部大院，就看见上房有一个留着胡子，身体魁梧的人，我心里猜想：这可能就是贺老总吧？

周士第参谋长看到我们几个一进院，忙迎出来，接我们进屋，并向贺老总一一作了介绍。贺老总笑容可掬地握着我的手说：“曾乃固同志，你们辛苦了，欢迎！欢迎！”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顺口说：“首长

好，首长好！”接着，周士第同志把我们介绍给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和六师贺炳炎师长、廖汉生政委。我们互相热烈握手、问候。

当时，我被分配到六师任参谋长。

从屋内的情况看，似乎刚刚在这里开过重要会议。于是，我转过头去问在一旁的师长和政委：“部队是不是有行动？”贺师长笑着说：“难怪是参谋长，看问题尖锐！”廖政委接着说：“是的，部队明天晚上就要出发，转移到富平县地区。”

为及早传达前总命令，我们告别了各位首长，急忙向师部驻地——泾阳县燕王镇地区走去……。

送我“火车头”

四月份的关中北塬，真是美丽极了。田野的麦苗一片碧绿，油菜花阵阵飘香。干部战士在田间帮老乡锄草耨地。富平底店村南日高大的白杨树上，几只喜鹊叽叽喳喳在枝头欢跳着叫个不停。

当时针指向十一点时，电话铃叮铃铃的响了，接电话的参谋告诉我：贺老总来我师检查工作，马上就要到了。我立即向师首长报告，接着我们便一起去村口迎接。

当我们刚走出村口，老远就看见贺老总骑着他那匹枣红马，带领着随行人员向我们走来。

老总在距我们五、六十米处就跳下马来。我们几个人赶忙迎上前去，向老总敬礼、问好，表示欢迎。

老总笑呵呵地说：“消息传得不慢呀，都出来列队欢迎了嘛！”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同意贺老总的说法。

贺老总对我说：“老表！怎么样，习惯吗？”我拘束而机械地回答：“习惯，习惯！”

“‘只要能上前线，哪里都乐意去’是不是？”贺老总紧接着说。

我真没想到我的话，竟这样快的就给贺老总知道了，而且记得那样准确，一字不差。心想：准是周士第参谋长向贺老总汇报的。

老总先说明关向应政委因事未来的原因。在他和我们交谈中，随着

他的手势和身体的摆动，他胸前挂的那银白色的“U”形链子不停地摆动。我好奇地问：“老总，你那链子是干什么的？”贺老总很快摘下链子，拿出左上衣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我的眼前：“这是块怀表，德国造的，‘火车头’牌。”又说。“不要看它旧，走得可准呢！”

“你有没有呀？”他紧接着问我。

“没有。”我简单地回答。

贺老总马上又伸出手说：“没有就给你，当参谋长的没有袭那能行呀！”“有了它，可以掌握部队行进的速度，可以发出统一时间进攻的号令，打仗时都得依你参谋长的时间为准！”

我异常激动，已顾不得什么礼节了，赶忙郑重地用双手接过这珍贵的礼物，说了声：“谢谢老总的关心！”我真后悔当时忘记给贺老总说，我有马蹄表。

老总和大家看到这种情景，高兴得大笑，不知是为我庆幸，还是笑我过于激动。幸亏贺老总一句话解了围：“我们的参谋长还动了感情呢！”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这样珍贵的表，激动的心情确实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这时，贺师长，廖政委似乎也眼馋了，笑着给贺老总提意见：“老总！我们跟你这么长时间，可没给过我们什么东西呀！”

贺老总笑着说：“你们要什么东西？你们看我有什么东西，看上了随便拿就是了。”接着他又换了个口气：“至于给你们什么东西，没给什么东西，我已记不得那么多了。”在老总转过身向前走时，贺师长、廖政委同时向我吐了吐舌头，无声地笑了。看他们的表情我可以断定：贺老总肯定是给过他们什么东西的。

我们漫步边走边回答着老总的提问，向师部院子里走去。

随着怀表有节奏的走动，仿佛督促着我们紧跟贺老总那坚定的步伐，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在战争岁月里，有了这块表，我掌握行军、打仗的时间方便多了，它真是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件“宝”啊！

黄灿灿的“派克笔”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了。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分别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120师师长为贺龙同志，那时我在358旅716团当参谋长。独立第二旅组建后，我被调到独立第五团当团长。

1940年4月份，组织上调我去120师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要学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还有艾思奇同志编写的《大众哲学》等。

训练班设在兴县东关外靠近蔚汾河的小村子里。这里有不少土窑洞，我们一人住一间，条件真够优越的了。当时，我没有钢笔，想要写点心得，只好向住在隔壁的黄新庭（当时是716团团团长）同志借笔写上几段，以加深记忆和理解。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刚听完大课，准备讨论，听到外边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正想出去看个究竟，这时，黄新庭同志进来告诉我说：“贺老总来了，我们看看去！”

我兴奋地一手扶着他的肩膀，一手抓着他的胳膊，一同出了窑洞。

老总老远就说：“曾乃固，你也来了？”

我忙举手行礼，并笑着说：“老总！我改名叫曾征啦。”

“噢！谁让你随便改名字呢？”贺老总不解地问。

“我写了个报告给彭绍辉旅长，他批示：‘同意’后来还上报了师部，对下也发了通知”我赶紧作了说明。

关向应政委说：“是有那么个报告，你那几天正好不在。”

贺老总说：“士第同志给我说过一次，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接着他又说：“人名，只是个代号，不一定去改他。你也不要再改了，叫曾征也好。”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贺老总知道我文化程度低，又问我：“学习有什么困难吗？”

我直爽地说：“其它困难到可以克服，就是没有笔，记笔记很不

方便……”

还没等我说完，贺老总就拿出他的钢笔给我，说：“拿去用吧，这还是支美国‘派克’金笔哩，可好用啦。”

我赶紧又一次郑重地接过贺老总送给我的第二件“宝”——黄灿灿的“派克”金笔，高兴地说：“这下可好，这下可好了。”

黄新庭同志在一旁看到贺老总给我的钢笔，向我投以羡慕的目光。

过了片刻，他来到了我的窑洞，说：“老表！贺老总总是送给你东西，那你怎么不送给我点什么东西呀？”

“我有什么东西你能看上的？看上了你随便拿就是了。”我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贺老总曾经说过的话。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话可要算数哟！”他穷追不舍地说道。

我顺口答道：“那当然。”

不一会儿，黄新庭同志抱来了他那条较为破旧的淡黄色的毛毯，拿起我的朱红色新毛毯，口里不住地说：“交换、交换！”

我心里还想着贺老总给我笔的事，黄新庭同志要换我的毛毯，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就把我的新毛毯换走了。

我用这支笔，记下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我用这支笔，记下了在贺老总的指挥下，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创的部分事迹；我将用这支笔，记下那些为革命洒下最后一滴鲜血的先烈们的英雄业绩！

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董彦林 整理）

亲切的教诲

李福田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早晨，我们吕梁军区警卫连连长罗重山同志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排长，贺龙司令员到我们军区视察工作来了，还要接见咱警卫连的几位干部，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听了这个消息，心中又惊又喜，心想：这一下我又能见到贺老总了。我素知贺老总军容严整，仪表端庄，对下级干部要求也很严格。于是，就赶快穿好军装，戴上帽子，整好军容，随罗连长向吕梁军区机关驻地——山西离石县风山村出发了。和我们同去的还有指导员米国强、一排长和司务长。

二月的山西高原，天气很冷，北风嗖嗖地向我们袭来，冻得人直打战，但是，大家怀着马上就要见到敬爱的贺老总的迫切心情，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们一边欢欣雀跃地走着，一边心情激动地谈论着。

罗连长说：“贺老总是两把菜刀起家，砸了盐务局，夺了敌人武器，带领穷弟兄上山闹革命的。当地老百姓都称他‘活龙’。”米指导员说：“1927年，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老总，特务处处搜查，但机警精明的贺老总最后还是绕开了敌人，到洪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听着大家的议论，我对贺老总更加敬佩了，心里暗暗称赞道：贺老总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不大功夫，我们就来到了军区司令部大院。一进大门，我们就看见贺老总左手拿着烟斗，右手插在腰间，正乐呵呵地一边散步，一边和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彭绍辉谈话。他穿着非常朴素，身上的灰布军装已经褪色，裹腿上边的膝盖处已打了补丁，留着八字胡，身材魁梧，威风凛凛，看上去格外精神。我们拘谨地走上前去向二位首长行了军礼。这时，彭绍辉副司令员用右手指着我们对贺老总说：“老总，这就是我们军区警卫连的几位干部，他们是专门来看望您的。”贺老总听了非常高兴，微笑着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春节好啊！请到屋里坐。”说着，就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屋。

来到屋里，他关切地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参加革命

的时间……。我们分别一一作了回答。

当他听说连长罗重山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战士时，哈哈大笑说：“好哇，你们还有个红军连长呢，条件不错。”他的话把我们也惹笑了。我们笑着围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感到他亲切可敬，平易近人。

接着，贺老总把脸转向我亲切地问：“小李，你也在这里工作？”“是的。”我听到贺老总唤我小李，就随口问了一句：“老总，您还记得我吗？”

“怎么不记得，你不是四五年和我一起离开延安来到晋西北的嘛。”听了贺老总的話，我心里真是又惊奇又激动，不禁想起了当初警卫护送贺老总的情景。

那是1945年8月，我从延安医院住院伤愈就要出院了。有一天，医院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找我谈话，让我参加警卫护送贺老总等几位首长，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晋绥革命根据地。受领任务后，我心里很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很快办完了出院手续，整理好行装，第二天一早，就跟随贺老总等首长踏上了东进的路途。途中，贺老总和我們同吃同住，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爱护下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在绥德休息时，大家由于一路的奔波实在疲劳，一躺下就睡着了。贺老总却很有精神，没有一点倦意。他满面笑容地把我叫到身边，亲切地和我谈话：“小鬼，你叫什么？哪年参加革命的？”我回答说：“我叫李福田，是1937年在家乡参加革命的。”他还教育我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进步……。贺老总的亲切教诲，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到了吕梁军区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留在吕梁军区警卫连工作。就这样，我与贺老总分别了。

这件事已过去好长时间了，没想到贺老总军务繁忙，至今还记得我这样一个年轻战士。

接着，贺老总又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们连队的情况。

“你们啥时候组建了這個连队呀？”贺老总关切地问。

“报告首长，我连是去年新组建的。”罗连长马上回答。

“那么说你们连队新战士一定很多吧？”

“是的，全连共有八十多人，除了五个干部外，都是当地新入伍的青年战士。”连长回答得很干脆。“嗯，这说明你们很重视宣传、发动群众和吸收新战士的工作，对不对？”贺老总以赞扬的口气反问我们。

“我们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性质和任务，讲述革命道理，号召青年人踊跃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斗争。”

“连队现有多少党员？”贺老总又问。

“只有五个干部是党员。”指导员回答。

贺老总听了指导员的回答，沉思片刻后说：“你们连八十多人，只有五个干部是党员，骨干太少了。十几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提出：‘连有支部，排有小组。当时由于支部建在连上，党员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所以红军虽处困境，却并没有溃散。’”

贺老总继续说：“你们建连一年多时间了，应该重视一下培养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现在，国民党又在策划新的内战阴谋，形势很严峻。大家对这一形势要有明确的认识，要有充分的准备。再说，你们连队的战士，都是工农出身的子弟，成份好，有文化，条件很好嘛！”说到这里，贺老总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好象思考着什么。忽然，他停住脚步，面向我们说：“今后你们要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发展党员要注意三条：第一，不能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两个发展两个；第二，不合格的不能拉到党内来，工作要严肃认真；第三，培养党员方式要多种多样，不能光上党课。”

听着贺老总的亲切教诲，我们心里明亮了，眼界也开阔了。

紧接着，彭绍辉副司令员又强调说：“贺老总的指示很重要，回去后你们卜一定要召开党支部会议好好研究，认真贯彻落实。”

“坚决按首长的指示办！”我们坚定地回答。

贺老总和彭副司令员听了我们的回答，微笑着向我们点了点头。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会议，认真讨论了贺老总的指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连队战士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党支部的培养和教育，到1949年，连队党支部共发展党员近百人，其

中二十多名党员锻炼成长为连、营级指挥员。还为兄弟部队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党员和干部，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贺老总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敢申、王治民整）

“审问”陈毅司令员

晓 军

故事发生在193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部接到上级一封信。信中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同志最近几天到纵队检查工作，要纵队派出一支得力的小分队前去迎接，并提出：一要注意保守秘密，二要保证陈毅同志的安全。纵队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研究了前往迎接的部署。当时，在通往江苏丹阳北边纵队驻地的路上，敌人设置了不少关卡，特别是有一条宽约几十米的大运河，水流湍急，又有敌人一个大队把守陵口渡口，要想安全地把陈毅同志接到纵队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怎样才能使陈司令员安全渡河呢？坐船吧，敌人已将沿岸的船全部搜走了，即使找到了船，但目标太大，也不安全。怎么办呢？大家心里都为这件事着急。这时，纵队参谋长郭猛同志把眉毛一扬，象发现了什么似的，高兴地说：“有了！我看咱们叫河岸两边的交通站搞几个大木盆，把木盆两头拴上长绳子，人坐上以后，一边放，一边拉，不是又快又保险吗？”对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大伙都拍手叫好。接着，他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各种应急措施。

第三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在微弱的月光下，陈毅同志精神抖擞地带着三十多个同志沿着一条小路，绕过了敌人把守的渡口，来到了河边纵队设立的一个小交通站。这时，纵队管文蔚司令员、郭参谋长带领部队已在此等候。一见面，陈司令员向纵队领导和同志们表示问候。随后，交通站的几个同志便把早已准备好的三个大盆和两个小木盆抬到河边，警卫部队布置在附近，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这时，陈毅同志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怎么，准备让我们用河水洗澡啊？”，纵队领导笑着回答说：“陈司令，这就是咱们准备渡河的工具，别看木盆不大，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说完，就让陈司令员和另外两个同志先登上了一个大木盆坐好，河这边的同志向河对岸打了一个暗号，随后，只见木盆象离了弦的箭一样向河对岸驶去。不一会功

夫，木盆就被拖到了河对岸。陈司令员一走出木盆，便对前来迎接他的纵队领导同志说：“这样有趣的渡船，真是一大创造，不用橹，不用桨，这么快就过了河。我们在敌人的眼皮下渡过河来，他们竟一点也不知道，这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一席话，说得周围的同志都小声笑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功夫，三十几个同志都分批安全的渡过了河。

午夜，部队在一个叫陈家庄的小村子里宿营。吃罢饭，陈毅同志正和纵队领导在聊天，忽然，听见屋子外边几个警卫战士在哈哈大笑。纵队领导马上走到外面，见几个小鬼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便惊奇地问道：“你们笑什么？声音太大了，把我们的谈话都打断了。”有个警卫人员压低了声音对他说：“首长，我们是在笑昨天晚上审问陈司令员的事。”“什么？审问陈司令员是怎么回事，快说！”他好奇地追问。原来昨天，陈司令员带着警卫排向咱们部队住的一个小村子走去，当时天已经很黑了。刚走到村口，哨兵就端起枪，大声问是什么人，并喝令站住。这时警卫排的同志正要答话，陈司令员却马上阻止住了，说：“你们莫要作声，我来看一看。”说完，他就跳下马，慢慢地走进了村子。这时，村里的几个战士听到哨兵的询问，也端着枪走了出来。他们一见陈司令员走过来，忙问是什么人，陈司令员从容的回答。“是自己人。”几个战士一听是自己人，便凑到眼前细细地端详起陈司令员来。因为大家都没见过陈毅同志，所以，觉得又象自己人，但又有些可疑。于是便把他带到了连部。陈司令员顺从的被他们押到连部后，先是一个排长盘问他。这个排长以前也没见过陈司令员，他先是随便问了几句，正当他准备严厉地审问时，连长进来了。连长是个老同志，以前见过陈司令员。他一进门，看到抓到的人竟是陈司令员时，大吃一惊。他忙向陈司令员敬了个军礼，然后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他的举动把排长和周围的几个战士弄得手足无措。当他们听说这个人竟是陈毅司令员时，都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时陈司令员反倒显得非常高兴，对这位连长说：“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有没有警惕性？刚才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很好！很负责嘛！要在全连表扬，让大家向他学习。”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很有感动。这个故事，在新四军中广为流传。

任用“管半仙”

晓 军

“管半仙”真名叫管有为，江苏丹阳人，他家境贫寒，早年在上海以“奇门相术”为业混饭吃，自称“管半仙”。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他不满敌人的侵略行径，回到了家乡，重操旧业，混迹江湖。

有一次，有个同志顺便向陈毅同志提起了这个人。陈毅同志听说这个“管半仙”算命很有一套，就让人把他叫来想当面试一试。“管半仙”被找来以后，陈毅同志先和他打了个招呼，问了他一些经历，就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看看我这个大老粗的‘手相’如何！将来能不能当个皇帝？”管有为不知他就是陈毅，见他口气这么大，就细细地端详了一番陈毅的脸面。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约七、八寸长的小尺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刻划着许多细纹。然后，让陈毅同志把左手伸出来，用尺子在他左手沿小指下方仔细量了一下，再把随身带的一本相书查阅了一通。最后，他闭上眼睛，嘴里念叨了一阵子，这才睁开眼对陈毅同志说：“你是大将之才，八面威风。”陈毅同志听后哈哈大笑，说：“我有这么大的福份吗？你是瞎猜的吧？哪有什么八面威风！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不准摆威风，摆威风就要撤职，群众就要将他打倒。照你这一说，我将来是该被群众打倒的了。”几句话，说得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管半仙”也不好意思了，只说：“对不起，我只是瞎说说罢了。”

事后，陈毅同志对这个“管半仙”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对同志们说：“我认为此人有用！镇江敌人那边，很需要有人去摸摸情况。我看派他去最合适。因为那里的日寇几个队长都信迷信，管的这套江湖骗术，他们可能相信。如能让他打进敌人内部，就可收集到敌人的情报，而且这些人替我们做工作，敌人也不太注意。”

随后，陈毅同志就派人把管有为找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接着他对管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准备派你到镇江去做情报工作。你是有爱国心的人，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能当此重任。你走了以后，

以算命看相作掩护，条件十分有利，一定能为国家和民族立功。你回去再考虑一下吧。”管听完陈毅的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坦率地说：

“这个事情弄得不好，是要杀头的。但是，为国为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顾惜不得啦！”于是他就把这项任务承担了下来。

此后，管有为在镇江伪军驻地附近挂上了“管半仙”的招牌，很快，他的名气就在全城传开了。起先，伪军的士兵找他算命、相面，后来，当官的也去找他，日军翻译也去找他。消息传到日军那里，日军的一个联队长也把他请去算命。在联队长那里，管有为天南地北地乱扯了一通，结果竟把这个联队长骗得团团转，夸他的相术“大大的灵”，就叫伪军把他留在营房里住，专门给部队算命。

敌人越来越信任他了，有时连日、伪军“扫荡”都要让他先给算算什么时辰出发，朝哪个方向最为“吉利”。管有为利用这些机会准确地把敌人的情报送到我们部队手里。结果，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他给我们部队送来了大量的情报，敌人一直没有察觉。他们只把在战斗中的损失归于共产党、新四军的“狡猾”。

有一次，他给敌人算完命后，敌人的一个小队几乎全部被我消灭，这才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陈毅同志为了保证管有为的生命安全，就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将他转移。但这时管有为已被敌人扣起来了。在审讯他的过程中，他始终推说自己是个相命的，有时可能也算得不太准，说这次一个小队的失利，是算得大意了。结果敌人已不信他这一套说法了，还是把他杀害了，但他至死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陈毅同志得到管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痛心，并对他表示沉痛哀悼。

陈毅同志就是这样把一个在旧社会里东飘西荡的“算命先生”、“江湖术士”引导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他的长处来为中国革命服务。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生动事例，为我们今天进行的“四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苏鲁 整理）

在林老身边

任峰华

林老和我们一起纺线线

我调到林老（林伯渠）身边工作的时候，正值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当时的边区政府设在延安南关外西山，机关工作人员居住在山下的一排石窑洞里，林老就在窑洞里办公，我们警卫人员住在林老窑洞的隔壁。边区政府的工作很忙，林老的工作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天不是外出，就是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批阅文件，常常工作到深夜。尽管林老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经常抽出时间带我们去机关菜地除草、浇水。除此而外，我们每人都有一架纺车，每当林老办公时，我们就在家学文化、纺毛线。工作之余，林老常来和我们一道纺线，给我们讲革命故事。林老是中央和边区政府中的四老之一，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看到林老这样为革命日夜奔忙，大家都为林老的健康担心。

我们常劝他：您这么大年纪了，工作又这么忙，就不要纺线了。林老总是笑着说：“我的年纪大了些，开荒种地没有你们年轻人力气大，干得多，要说纺线，恐怕你们还不是对手呢！不信，咱们比比看。”说着，林老盘起腿，右手摇纺车，左手拿羊毛卷卷拉起线，嗡嗡地纺起来。

为了让林老多休息一会儿，后来，我们几个警卫员商量好，悄悄地把林老的纺车藏起来了。林老又来纺线，见没了纺车，望了大家一眼，我们装作不知道，谁也不吭声。林老看出是我们“捣了鬼”，指着我的鼻子笑着说：“你们这些小鬼，真‘鬼’呀！今后谁再‘捣鬼’，我可要打屁股了。”林老说着便拿起高粱秆，在石板上搓起羊毛卷卷来。

林老教我打草鞋

大生产运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粮食、蔬菜、油盐都达到了自给有余。但由于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不适

宜种植棉花，棉布供应还相当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布匹，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夏秋两季，边区部队的干部战士直至中央首长大部分人都穿草鞋。

记得1944年夏天，我仅有的一双布鞋，已穿了半年多，补了又补，还是磨破了，露出了大脚指。我当时还不会打草鞋，又不想给同志们添麻烦。一天中午，我从山坡上割来马兰草，便照猫画虎地动手打起草鞋来。一只草鞋，我打了拆，拆了又打，怎么也不象样，急得我满头大汗。这时，林老走过来了，我急忙站起来。林老和蔼地问我：“小鬼，你在忙啥呀？”我说：“首长，我在打草鞋。”林老弯下身子，拿起我打的草鞋看了看，风趣地说：“你在织席片啊？”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回答：“首长，我还不会。”林老亲切地说：“看你这小鬼，怎么不早说呢？不会不要紧，就怕不学嘛！来，我教你。”说完，林老蹲下身子，手把手的教我打草鞋。林老还问我会不会种田，会不会缝补衣服、拆洗被子？我说：“会。”望着林老那慈祥的目光，聆听着他老人家亲切的话语，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惭愧。心想，林老肩负革命重任，日夜操劳，还这么体贴入微地关心我们警卫战士，我真不该打扰他老人家。

在林老的耐心指导下，我学会了打草鞋。一次，我把精心打的一双草鞋拿去让林老看，林老接过草鞋仔细地瞧了又瞧，满意的点点头，连声说：“好，好！”

林老教我学文化

当时，边区连队的干部、战士识字的人不多，找个文书都比较困难。我调到林老身边的时候，部队正开展扫盲运动。我是放羊娃出身，没上过一天学，自然是扫盲的对象。林老对我们警卫战士的学习很关心，要求很严，经常抽空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一天下午，林老正在办公，我坐在窑洞外面的石凳上，俯在石板上聚精会神地写生字，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小鬼，写得不错呀。”原来，林老已站在我的身后一会儿了。我站起来回答：“不好。”林老问我能识多少字了，

我说不多。林老说：“一天识上五个字，一月就是一百五，几年以后，你就成知识分子了。”说着，他老人家笑了，我也咧着嘴笑了。

1945年秋，一天，我们跟林老骑马去绥德调查。回来的途中，因为长途跋涉，天气又热，马累得浑身直冒汗，林老让休息一会儿再走。于是，我们便在山脚下阴凉处坐了下来。林老拿出随身带的一张《解放日报》，指着一篇报道要我念给大家听。我想，这是林老又来考我了。我双手接过报纸，坐在林老身边，结结巴巴地读起来。因不时地“卡壳儿”，惹得大家暗暗发笑。我臊得满脸通红，头上的汗直往下流。每遇到一个生字，林老都给我耐心讲解：这个字念什么，是什么意思，怎样写。因为生字太多，巴掌大的一篇文章，我竟读了足有二十分钟。

要说林老叫我读报纸，倒不如说是林老在教我学文化。

读完，林老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小鬼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知识不行啊！”

我们骑马上路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林老呵，你为我们青年战士的成长，真是操尽了心哪！

离别延安已经三十年了。每当我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今，人们再也不需要用手工纺线了，也不需要再穿草鞋了。但是，那种同志间的爱，那种艰苦创业精神，不正是我们要永远发扬的吗？

（宋双全 整理）

难忘的纪念

谭友林

在新四军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同叶挺军长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接触时间虽短，但叶军长留给我的印象，给予我的教诲，却是终生难忘的。

那是 1939 年 6、7 月间的事情。

我们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自河南竹沟镇东征以来，跃马扬鞭，纵横驰骋，大胆深入敌后，迅速点燃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烽火。游击支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原先的两个连，不足二百人，发展到三个团、一个总队，五千余人枪。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游击健儿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旺盛，认为老是叫“游击支队”已经不相称了，应该有一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

有一次，叶挺军长由江南来到江北指挥部。彭雪枫司令员听说此事以后，便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商定，要我即日动身前往江北指挥部，主动找叶挺军长汇报我游击支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并争取要有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回来。

我第一次听到叶挺的英名，那是在洪湖苏区闹革命的时候。贺老总常给部队讲叶军长严格治军的故事，讲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声震中外的北伐战役，讲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他和叶军长结下的深厚情谊。贺老总每次讲起叶军长时，总是怀着十分钦佩和难以抑制的激情。要去见赫赫有名的叶军长，我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能亲眼见到号称“铁军”团长的北伐名将，是一件极大的幸事，可以增见识，长学问。

我在高兴的同时，免不了也感到有些紧张，情不自禁地暗自嘀咕：“不知叶军长好不好接近，爱不爱训人，愿意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正式番号？”

我怀着这种心情上路了。

我当时在游击支队二团任政委。部队驻在皖北蒙城县境内，离驻扎在庐江地区的江北指挥部比较接近，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我带着一个警卫班，避开日寇控制的铁路线，绕道而行，第三天下午就赶到了庐江东汤池。

指挥部住在一家依山傍水的大户地主的四合院里。背后有一座小山，树木葱茏苍翠，门前有一口水塘，宅院幽深雅静，凉爽宜人。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多年风雨的剥蚀，砖木显得有些陈旧。院内青砖铺地，四周是瓦房，房前有过厅，窗户很小，尽管墙壁上涂了一层白灰，但室内光线仍显得有些暗淡。

在指挥部参谋人员的引导下，我们先见到了张云逸指挥。张指挥问明了我的来意后，即打发人把我带来的警卫班安排在指挥部警卫分队的住处住宿，然后叫秘书把我送到叶军长的卧室兼办公室。这时，叶军长正独自站在屋内，端视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分省地图，好象是在凝思着什么。我的一声“报告”打断了叶军长的沉思，他掉过头来。叶军长上身穿一件白色府绸衬衣，下身穿一条呢军裤，衬衣扎在裤腰里。衣着整洁，身材魁梧，举止干练，目光威严，炯炯有神。

叶军长弄清了我的来历后，便和蔼地说：“你坐下来，详细谈谈你们游击支队的情况吧！”

我靠办公桌左角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显得有些局促。按照原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叶军长听得很认真，时而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数字、人名、地名什么的。在听我汇报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插话，面部表情自始至终好象没有变化。

我暗自惊叹：“叶军长的寡言多思，深沉不露的风度真是名不虚传啊！”

叶军长听完我的汇报后，扼要地讲了四点意见。叶军长的四点指示，语言朴实，言简意赅，通观全局，分析透彻。对我游击支队的工作既有肯定，又有希望，既交待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又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顿时，使我感到心明眼亮，干劲倍增。

叶军长作完口头指示以后，习惯地抬起左手腕，看了看手表。也许

是开晚饭时间还不到的缘故，他不慌不忙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包香烟，问明我不会吸烟后，便给自己点燃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又突然问起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来。他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军的，原先在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当他得知我原是贺老总的部属时，他通常紧蹙的眉头，缓缓地舒展开来，睁大眼睛，无限深情地说：“贺胡子这个人好啊，爽快得很！”

叶军长语气轻松地讲起了贺老总的为人，讲起了他们之间密切配合，风雨同舟，共同参加了“八·一”南昌暴动的往事。

如果不是警卫员跑进来通知开晚饭，打断了叶军长的谈话，也许他还要讲个把小时哩！

叶军长、张指挥陪我共进晚餐。席间，叶军长言语不多。张指挥谈兴很浓，问了我很多关于游击支队开展敌后军事、政治斗争，开展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吃罢晚饭，叶军长，张指挥嘱咐我在这里休息几天，并打发参谋人员把我安排在大院南面的一间客房里。

第二天深夜，我已经进入梦乡。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叶军长打发警卫员约我一起到村外的稻田去捉田鸡。叶军长吩咐我们不要大声喧哗，免得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其他同志。我打着手电筒，副官和警卫员一人提一只木桶，尾随叶军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宅院。到了田间，叶军长一面叮嘱不要踩了秧苗，一面捋起袖子，亲自下手捉田鸡。当我们满载而归时，叶军长很高兴，一扫平时那股威严的将军风度，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离开指挥部那天一清早，叶军长又把我叫去叮咛了一番，他说话的声调仍然是缓慢而有顿挫的：“指挥部已经弄到几万发子弹和一些轻重机枪。从庐江到蒙城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你带的人太少了，这次不能带。你回去后报告彭雪枫司令员，让他派一支部队来领取，如何保证途中的安全，务必认真考虑，严密组织。你回去后，请代问彭雪枫司令员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好！你要走了，送你几件小东西，作个纪念。”

叶军长说完话之后，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办公桌子的抽屉，取出了他自己的一张小照，一个装文件的皮包，一枚新四军的纪念章和一支白色

的左轮子手枪，一起送给了我。

我怀着万分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接过叶军长送的四件礼物，并当即向叶军长表示：“请军长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把军长的指示传达好，落实好。”我向他行了个军礼，便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在返回蒙城县的途中，我的心情总是不能平静。我想到了叶军长，还想到了贺老总。他们都是使国内外敌人闻风丧胆的我军高级将领，都有自己的风度和个性。但也有其共性，他们都有很强烈的爱，爱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爱人民，爱部属，重友情；他们的骨头都很硬，如铁似钢。

我赶回游击支队司令部以后，立即向党委作了汇报。彭司令员等领导同志得知叶军长同意我游击支队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都很高兴，并当即决定派特务团程团长率一个加强连，到江北指挥部领取枪弹。我游击支队得到这批武器弹药的补充后，如鸟入林，如虎添翼，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不久，我彭雪枫游击支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一年以后，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敬爱的叶军长了。

1940年底，我离开新四军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中，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军长率皖南部队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陷身囹圄。他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党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出狱。4月8日，叶军长和王若飞、邓发等同志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黑茶山不幸遇难。党中央在延安为叶军长等殉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他的业绩，他的品德，连同他的英名，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留芳千古。

一颗比金子还亮的心

郭凤文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对晋绥边区不断进行拉网式大“扫荡”，铁蹄所到之处，火光冲天，一片焦土。阎锡山顽固派又配合日本侵略者，大搞反共磨擦，调动大量兵力向八路军和决死队进攻，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日伪反动派对边区频繁的军事进犯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严重困难。我们向晋绥边区进发时，亲眼见到沿途人民群众衣不遗体，食不果腹、房屋烧毁，尸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当时，我们部队连黑豆糊糊和野菜也难以填饱肚皮，很多同志由于长期缺盐，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和夜盲症。艰苦的环境，重重的困难，并没有吓倒晋绥边区广大军民，它更激发了边区军民团结奋斗，共度难关，粉碎封锁，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心。

那时，我在120师特务团党训队当指导员，战斗和工作在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身边。记得1940年元月的一天，我们师直属队的连以上干部到师部驻地开会，总结反“扫荡”作战经验。在一个小山丘上布置了会场，会场中央放着一张条桌和一条长凳。队伍刚刚集合完毕，关向应政委首先来到会场。他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面容清瘦，双目炯炯有神。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坐在长凳上，从口袋内掏出纸和烟丝，熟练地卷好一支烟抽将起来。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着。我们看到这种情景，真想上前劝关政委把烟戒掉。

大家都知道，长征以后关政委患了肺结核病。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在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得不到休息和及时治疗，他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无不关政委的健康而担心。不一会儿，贺龙师长也来到了会场。他挥手向大家说：“同志们静一下，我们欢迎关政委作报告！”关政委站起身来，招了招手，就开始讲话了。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连咳嗽声都听不

到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关政委报告的内容，用心记着笔记。关政委的报告总结了反“扫荡”作战经验，深刻分析了敌、我、顽三方的斗争形势，如实地摆出了边区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号召我们大家节衣缩食，献钱献物，支援人民，共度难关。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粉碎日寇的“扫荡”，打垮敌顽的进攻，巩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他的讲话声音宏亮，铿锵有力，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这次讲话之后，在边区机关和部队中迅速掀起了一个捐献运动，关向应同志带头将自己过去在白区工作时积存的五两黄金，全部奉献给晋绥边区政府和人民。当时，地方政府和同志们都劝他留下一些买药治病，或者买点补品保养一下身体，但他摇摇头说：“我个人身体事小，现在边区财政这样困难，应当把它拿出来解决点困难。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虽说只是五两黄金，这份量却比泰山还重，这是一个赤子对党对人民奉献的一颗比金子还亮的心啊！为了表彰关向应同志为党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当时的《战斗报》曾报道了此事，在边区广大军民中有口皆碑，传为佳话。党的“七大”之前，我们敬爱的关政委病情加重，离开部队回延安治病。后因医治无效，他于1946年7月21日与世长辞。关向应同志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崇高品质却光照千秋，与日月同辉。

跟刘志丹“闹红”

白仲元

1935年5月，我的家乡陕北清涧县“闹红”，我跟父亲从地主家逃出来，投奔了红军。父子俩都在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81师一团当兵。这个团有三个成人连，一个娃娃连。当时我才十六岁，被分到娃娃连——“少年先锋连”。连里有六十多人，都是十来岁的娃娃。刘志丹同志很关心这些“娃娃兵”，不管是行军作战，还是战斗休整，都经常来我们先锋连，战士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虽然是三十好几的人，但和我们在一块却有说有笑，亲亲热热。我就是那时认识刘志丹的。

流 动 课 堂

到先锋连的第二天，我就参加了战斗，出吴堡、进延长、下甘泉、上定边……没黑没明地行军，没完没了地打仗。害怕了几天，新鲜了几天，以后的感觉就是累。对我们这些苦孩子来说，苦累还能对付，最叫人头疼的是学文化。

有一次，在安塞休整，连长作完战斗讲评后。文化教员就教我们识字，我和一些小伙伴们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了。文化教员叫醒了这个，又睡着了那个，气得他没有办法。这时，正好老刘到连里来，他一看到我们睡得横七竖八的样子，就把排长折劲功叫来说：“为什么不组织战士洗脚睡觉？”

排长说：“连里安排上文化课。”

“不休息好，能上好课吗？”

排长感到委屈，想反驳，嘴张了两下，又闭上了。

老刘瞪了排长一眼，转向我们大声说：“娃娃家，快起来吃蒸馍咧！”呼啦一下，我们都从地上爬起来，把老刘围得严严实实，争着要蒸馍吃。他哈哈大笑：“你们不好好识字，还想吃蒸馍，快找周公去要吧！”说罢又笑了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他这样同我们开玩笑是常事。

有个战士嘴快：“哼！一家伙教那么多生字，谁能记下？”

“就是！周公也记不下。”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开了。这时，有个平常不大说话的战士拿着件破衣服走近了，说：“大衫破了还没补好，一打仗又补不上了。”老刘伸手接过大衫，一边补着，一边看着我们，沉思着。过了好一会才说：“你们说得对。”他把衣服补好后，起身向连部走去。

第二天出发前，文化教员笑咪咪地拿来几十张各种颜色的纸片，发给每人一张。我接过纸片一看，上面写着“打靖边”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我再看看周围同志手中拿的纸片，写的都是一样的字。没等我们发问，文化教员就说：“同志们，都把纸片夹到背包上，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就是纸上写的‘打靖边’三个字。大家一边行军一边识字，不打瞌睡又学文化。这是老刘出的主意，他说咱们这是‘流动课堂’”噢，原来是这样，老刘可真想到我们心里了。大家七手八脚，打好背包，夹上纸片，乐呵呵地上路了。

打那以后，战斗休整时，我们先锋连的主要任务是休息，很少再上大课了。“流动课堂”里，我认识了家乡“清涧”，知道了我的祖国“中国”，明白了不少革命的道理。我们文化教员还编了段顺口溜：“流动课堂就是好，傲啥学啥记得牢。打仗学习双胜利，人人摘掉文盲帽。”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战斗生活的情景有些已经淡忘。而“流动课堂”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篮 球 教 练

红军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每次战斗结束后，部队除了总结经验、补充兵员外，还要组织集体游戏，开展体育活动。

那是在兰田坪整编时，一天晚饭后，排长对我说：“小白，昨天咱们缴获了几个篮球，叫几个人来，学打球好不好？”

“好是好，可咱不会打呀。”

排长说：“不会就学嘛。”

“那谁来教咱？”我感到很为难。

“我来教。想当年在黄埔军校我还是个球迷呢。”啊呀，又是老刘，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

就这样，老刘当上了我们的篮球教练。他见我个子大，叫我当队长。接着，找来几个战士一凑合，先锋连篮球队组建起来了。我很得意，练球也卖劲，练了几次，就同成人连比赛，还赢过一回呢。

每回练球，老刘都和我们一块摔打。有时小伙伴们把他撞倒了，他也不生气，爬起来继续练，还一个劲鼓励大家猛打猛冲。他说：“打球的目的是锻炼身体，增强斗志，培养作风。”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排和二排对阵练球。因为以往二排不是对手，所以这次较量，我不大在乎，仗着个子大，横冲直撞，不打配合，练了一会，老刘叫停，突然把我们一排的队员去掉一名，继续练习。这么一来，怎么打也不带劲，结果我们输给了二排。我正在赌气。老刘走过来。问大家：“你们说，今天为啥一排输球了？”

“人少嘛！”大家答道。

“再想想，红军为啥能打胜仗？”老刘又问。

“红军不怕死！”“有老百姓帮助！”有人回答。

“对！有陕北成千上万的父老兄弟支援，红军才能打胜仗。这是人民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老刘很激动，一句比一句声音高：“离开了集体，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大家说对吗？”

“对！”

同志们的吼声象炸雷一样，把我的头炸懵了。过了好半天，我才慢慢抬起头来，看着老刘的眼睛，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我真想叫老刘骂上几句，可他只是对我笑了笑，再没言语。

集体主义思想的幼芽，就是从那时候起，在我这个放羊娃心里扎了根。

清 涧 离 别

1935年7月的一天，我们连随大部队攻打清涧老君殿。打了一下午，战斗才结束。部队撤出时，天已经黑了。我实在困得不行，边走边打盹，

走着走着，突然脚下踩空，心里一紧，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已躺在一位老乡的家里了。连里的战友和团里的领导围了一屋子。原来我是从崖上摔下去，把右腿骨摔碎了。这时，我才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真想大哭一场。说哭真有人哭，只听身边有抽泣声，借着油灯光亮寻声找去，看到连里最小的战士周金国在哭。小周十二岁，在战斗中挂了点花，着实叫人心疼。房东大娘一边安慰他，一边偷偷抹泪。

就在这时，老刘端着两碗小米粥，来到我的炕前，递给我一碗，又递给小周一碗，然后依炕坐下，轻轻摸着我的双腿，劝我们快吃饭。我想，连里战士数我年纪大，在老刘面前可不能装熊。我故意说：“老刘，我不饿，给讲个故事吧。”在往常，老刘准会答应我的。可今天他是怎么了，好象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脸色很不好看，一个劲地盯着我的腿。突然，他一下把小周搂在怀里，象父亲搂着自己的儿子，大滴的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我再也忍不住了，不由两眼一热，扑向老刘，放声痛哭起来。我哭得是那么痛快，就象受了委屈在妈妈怀里大哭一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刘为我擦干眼泪，哽咽着说：“同志们，你们说，是谁把我们的娃娃害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让不成年的孩子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一句话，说出了多少人的辛酸啊！排长忍不住了：“小周十岁上家破人亡，一人流浪。小白两个妹妹送了人，一个弟弟饿死，走投无路才当兵。这都是地主老财逼的呀！”顿时，小屋的气氛，由悲痛转为愤怒，你一言，我一语，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小周不哭了，大娘也不哭了，我似乎感到伤痛也减轻了，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劲，说：“老刘，别搁下我们，我要打民团，给亲人报仇！”

听我这么一说，老刘从口袋里拿出一双布袜给小周穿上，又叫人拿来两袋小米，交给房东大娘，然后对我说：“小白，组织决定你留在大娘家养伤。小周伤轻，随部队出发。等你伤好，我派人接你。”一听说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我死活不干。后来房东大娘和同志们一再劝说，我才答应了。临分别时，我拉着老刘的手说：“伤好了，我一定找你们去，可别忘了我。”说着说着，我喉咙哽咽、泪水模糊了双眼，再也说不出

话来。

谁知那次分别后，我再也没见过刘志丹。伤好归队，才知道这位陕北红军的统帅、士兵的兄长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我们这些放羊娃，都成老战士了，要是刘志丹在九泉之下得知我们的今天，他一定会含笑的。

一件寻常的小事

王四海

1934年的7月下旬，我和另外三个同志赶着牲口去送修一批枪支。由于任务急，我们到军委换了介绍信，没喘口气就又上路了。刚离村二、三里路，后面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回头望去，原来是刘志丹和马锡武、习仲勋等首长各乘一匹快马赶来。

志丹见我们的牲口驮着枪支，就热情地问道：“你们是去修枪的吧？”

“是的，刘总指挥。”我们高兴地回答。

“那我们是同路喽。”志丹边说边下马，和我们一起步行，攀谈起来。志丹认真地问问这，问问哪，内容比开调查会还细致。不知不觉我们已走了二十多里路，来到豹子川西岸边。志丹突然停住脚步，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我们谁也意想不到，他问了一句：“你们身上有没有虱子？”

听至这话，把我们都逗乐了。一个总指挥，问这个干嘛。一直没有插上话的年龄最小的战士白玉祥抢先说：“有，夏天虱子就少了。”

志丹看了看天，又看了看表，十分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走了几天，一定辛苦，到修械所用水困难。今天是大晴天，在这里洗澡，捉虱子，洗洗衣服好不好？”

“太好了。”我们都带着孩子气的齐声叫道。说真的，自开春以来，行军打仗不停，哪有洗澡时间。刘总指挥让我们在这儿洗澡，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忙拴好牲口，高高兴兴地象小鸭子一样连蹦带跳地跑向河边。

志丹拴好马，也跑到河边对我们说：“你们修枪任务紧，时间可不能洗得太长，只给一个钟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时间太宝贵了。”他顺手拿起白玉祥的衣服：“哎哟，不光有跳蚤、虱子，汗碱把衣服都渍硬了，一股汗臭味直往鼻子里钻。”他把衣服放到水里涮了涮，转身向森林边走去。我们还以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抬头望去，只见他捋了

一大把灰条叶拿到我们跟前说：“这个东西可当肥皂用，不要怕把衣服染绿，过两天色就褪了。”他边说边做给我们看。不一会儿，一件衣服就洗好了。听首长们常说，刘志丹不仅是一个“活地图”，而且象一部“百科全书”。这话一点儿不假。他对天文、地理、物产、习俗、无所不晓。对陕甘边区一带，无论是哪条川，哪个村，他都熟悉。哪座山有什么石头，哪条川是什么土质，长什么庄稼，用什么方法耕作，哪里水甜水苦，哪里树多树少，哪里庙大庙小，哪个村有几家地主，几户贫农，无不了如指掌。黑夜行路，他从不迷向，摸摸山边石头，捏捏地里泥土，就能判断到了什么地方。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个小本子随时记点什么。

刘志丹边给小白洗衣服边象个老妈妈似地说：“洗衣服、洗澡要选好天气，要挤时间，这样就不会生虱子了。”小白看总指挥给自己洗衣服很难为情，要自己洗。志丹说：“我给你洗一次，下次你自己就会了。现在，你抓紧时间洗澡。”小白争不过，就十分感动地又下河尽情洗澡去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洗了个痛快澡，衣服也很快洗好了。可湿衣服咋拿呢，我们还要赶路呀！我正寻思着，志丹已让警卫员找来一根两三米长的树杆对我们说：“来，把衣服搭上，俩人一抬，走到修械所就干了。”还是志丹办法多，这样一来，赶路、晒衣服两不误。我们都暗自敬佩他真是个好领导。

志丹和其他首长因还有许多工作，把我们安排停当，就上马要走了。他在马上对我们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后面来，咱们修械所再见。”为了能争取和刘总指挥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我们几个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向修械所疾进。

（黄战雷 整理）

一个难忘的夜晚

王四海

1934年10月，楼坊坪奔袭战击溃敌人后，饥饿、瞌睡向我们袭来。为了安全，刘志丹命令部队翻过山到白豹镇宿营，并派人先行安排食宿。刘志丹在王沟门看着将伤员、伤马运走，又把一个伤员扶上自己的马，这才随部队步行。

黄昏前，部队到达了白豹镇。镇外要道已由赤卫军派出警戒，饭也准备好了，同志们都为刘总指挥的周到安排所感动。近三十个钟头没有合眼的指战员，有的人饭端在手里，没吃几口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饭倒了一身也不知道。

凌晨两点，正是天气寒冷的时候，我十分警惕地起来查哨。真巧，我二匿驻地正南方向发现情况，有三个人过河而来，看样子，不象敌人。我们埋伏下来，等待时机，看个究竟。在离我们哨兵约两三丈远的地方，我已认出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他不是别人，是总指挥刘志丹等三个同志前来巡营。我立即迎上前去。

刘志丹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就要去巡营查哨。我连忙恳求说：“首长，你要很好休息呀！看你又消瘦多了。”说着，我眼里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热泪。难道刘志丹是个铁打的人，他就不知道累！他肩负重担，比我们休息要少很多，可他……

他风越地说：“我睡了两个钟头，精神已经很好了。别看我瘦，可不闹病。你问他们是不是这样？”他手指旁边的两位营长。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刘总指挥每走到一个哨位，都十分关切地问：“冷不冷？睡了一觉没有，饭吃饱了没有？”哨兵们见刘总指挥深夜亲自巡营，并问得那么仔细，大家心里都感到温暖，很有精神地回答了首长的问话。我们为了不多耽误他的休息时间，就说：“敌人已经逃走了，你还来巡营？”

刘总指挥听出了我们的话外之意，笑了笑后认真地说：“平时巡营

查哨是为了战时应用。平时不养成好作风，战时就会出问题。我们突然长途奇袭了敌人，敌人不是傻瓜，也许会杀回马枪。我们是革命军队，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目前，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强大。这次奔袭只是杀伤和击溃了敌人，并没有消灭敌人。我们的战士肩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任务，平时如不注意养成良好的战斗作风，稍一疏忽，战时就会吃亏。这是有血的教训的，麻痹不得呀，同志！”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可心里总是过意不去，首长们的确太辛苦了。

“你们有步哨、巡逻哨吗？”他又询问开了。带班员抢先回答说：“有。”他满意地说：“对，部队越疲劳，越要加强警戒。我们在哨位上说话多了，今后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一句话造成的，我真恨自己，办了个事与愿违的傻事。我们跟着志丹向村里走去，路上他又叮咛说：“天冷，战士们都疲劳，哨兵要勤换。”他真是战士们的贴心人！

村子里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战士们有节奏的鼾声。志丹打开手电，逐个查看熟睡的战士。嗨，不光窑洞、房子里睡着人（主要是伤病员），院子里柴草垛周围都睡着我们的战士。他们怀中抱着枪，身边搁着饭碗。志丹见有的把盖在身上的草蹬开了，就轻轻的盖好（当时部队都没有被子，所以铺的盖的都是草）。他小声问我们：“为什么院子里还睡这么多人？”我们说：“房子少，不愿再给老乡添麻烦。”他自言自语感慨地说：“我们的战士太好了，太疲劳了。”我心想，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有刘志丹这样的好领导，还愁带不出好兵！

他要到邻近的骑兵部队去了，但又一次嘱咐我们：“赶快检查，把草蹬开的都给盖好，不要打搅，让他们好好睡一觉，你们干部要加强查铺，严防冻病、冻伤。”说完，他迈开大步消失在夜幕中。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了。此时此刻，我望着他的背影，噙着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黄战雷 整理）

一项及时的命令

王四海

1935年8月27日下午6时，红军做好了一切准备，向靖边城挺进。刘志丹和一些师团首长在一个高坡上谈笑风生。晚霞映照着他们红润的脸膛，显得很精神。首长的战马在不远的地方一字排开，双双耳朵竖立，好不威风！懂事的战马好像也知道要打仗了。

对于打靖边的作战方案，干部战士都觉得万无一失，信心十足，颇有瓮中捉鳖，十拿九稳之感。因此，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疾进，也不觉得累。沿途村庄的男女老少手提黄杏、炒豆、炒面、烙饼往战士手里一个劲塞。年轻的姑娘、媳妇都把心爱的花针扎扎（针线包）、荷花香包，赠给红军战士。人民群众赞不绝口地说：刘志丹的队伍过来了。这热烈的场面，更加激发起我们杀敌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

午夜时分，各路部队都到达指定位置，刘志丹也把指挥所设在了前沿阵地。

总攻前的靖边城，死一般的寂静。此刻，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孔团长看了看怀表：3点56分。离发起攻击的时间只有四分钟了，战士们的心在伴随着怀表的嘀哒声激烈地跳动着。

由于情况有变，战斗推迟了几分钟才开始。我们架好云梯，摸掉哨兵，很快进入城内围歼敌人。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城内的敌人才清醒过来。狡猾的敌人想负隅顽抗，就把群众弄在一起，作为人墙阻挡我们前进。怎么办？打吧，肯定要伤害群众，不打吧，敌人就在眼前，时间拖久了，会给敌人造成反扑的机会。部队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刘志丹派人传令：“部队散开，就地利用民房、院落、小巷，把群众放过去后，再冲上去分段消灭敌人。一定要保护群众！”刘志丹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爱护人民群众。

打到天亮，其它部队继续追歼残敌。我奉命带两个排到东大街各巷口堵截逃敌，保护已上了东门楼的刘志丹所在的“指挥所”（我当时任

二团一连指导员，连长刚负伤，我又兼任连长）。我们刚进入阵地，刘志丹派人来叫团长或政委到指挥所去。我说：“他们追击敌人去了。”交通员急促地说：“那你去！”看他那神态，刘总指挥一定有急事吩咐。我忙安排好部队，跑步上了东门楼。

指挥所里，只有刘志丹和两个警卫员。他左手握着望远镜，右手指着西山寨外长城下，严肃地对我说：“你看，义勇军要拼命了。”

我抬头望去，只见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有好几杆红旗在飘动，战士们一窝蜂似地向南城冲去。刘志丹已觉察到义勇军急躁的原因。他命令我说：“你马上派两名得力的同志，跑步出南门上西山，给义勇军司令、政委说，要按第二方案打。另外，我已命令进城部队攻击西山寨，以吸引敌人火力，解除他们的困境。”我一字不漏地复诵了命令后，他顺手把早已写好的纸条交给我说：“快，快，快！快去！”

刘志丹无论在多么紧急的情况下都十分沉着从容，从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今天连说四个快字，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以最快的速度派人通知了义勇军。不到二十分钟，再抬头望去，义勇军的队形改变了。

这样一项及时的命令，不知减少了多少不应有的牺牲啊！如果没有这个及时的命令，那么，后果将是多么不堪设想。我不禁更加敬佩刘志丹总指挥深邃的眼光。义勇军的同志们知道情况后，一个个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战斗结束后，总部要求连以上干部分两批上西山寨看地形。我们登上长城，举目远眺，祖国风貌尽收眼底，一个个惊叹不已。刘志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关于长城的故事，不知不觉来到了南寨墙。他话锋一转，谈起了今天的战斗情况。他说：“我们的义勇军一贯很能打仗，屡立战功。今天是因为向导带错路而没能按时进入战斗。他们因心里难过而发生急躁情绪。所以，开始战斗队形密集，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这件事要给全体同志讲清楚，要记取这个教训。这个西山寨最后还是被他们拿下来的嘛！要号召部队学习他们这种不屈不挠、顽强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刘志丹同志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下级指挥员的过失的。

寥寥数语，既解除了义勇军同志的压力，又消除了各小单位之间的误解。刘志丹这一项及时命令的巨大作用，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黄战雷整理)

“他是难得的人才”

王四海

1935年9月袭击横山城前夕，我们团和总部住在一个村庄里。一天下午，我们都在屋子里擦拭武器，做战前的准备工作。大家正在谈笑，忽听“叭”的一声枪响，老乡的一个菜缸也应声而碎。这一枪，吓呆了那个擦机枪的战士，惊动了大家和刘志丹同志。

刘志丹听到枪声，当时就把我叫出去询问情况。

“为什么打枪？”

我讷讷回答：“擦枪时走火了。”

“是谁，是老兵还是新兵？”

“是在吴堡尽不拦沟战斗中俘虏晋军的老机枪手。”

“嗯，老机枪手走火？这个人有多大年纪？”刘总指挥警觉地提出了怀疑。

“三十九岁。”我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心里就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你怎么知道他是老机枪手？”

“在他被俘时，就在敌前卫连打机枪。”

“缴他的机枪时表现如何？”

看样子，他非刨根问底不可了。刘志丹对待每一个严肃问题的处理，总是谨慎细心。他从不凭感情冲动和主观臆断去解决问题。想起这些，我的神经稍为放松了一些，就认真地把当时情景讲给他听：“那次战斗他在敌前卫连的第二梯队。当我们把敌第一梯队击溃后，他在后面二、三十公尺处就不打枪了，并且双手高举机枪，帽沿向后，跪着直喊：‘缴枪，饶命！’在他的影响下，有二十多个士兵都举枪缴械了。”

“哦，是这么回事。”志丹喃喃自语。“那他过来这一段表现怎么样，他的身世你知道吗？”

听他问这些，我倒有些高兴了，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向刘志丹同

志叙述了一遍：“他叫孙继贤，原籍山东，早年因受不了当地反动政府和地主的压迫剥削，又加灾荒，为了糊口，就跟着父亲到东北当苦力，后来被军阀拉去当兵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进关内，他所在的部队就垮了。他在东北做工时，听说苏联红军好，曾有人叫他去苏联当红军。他想：苏联红军好，中国红军也一定好。他打听到陕甘有红军，就慕名而来。谁知，途中经山西时，又被阎锡山抓去当兵。他到咱们部队后表现很好，干什么工作都积极主动。”

刘志丹对上述情况听得很认真。他说：“按这个人的年龄看，情况还真实。苏联革命成功时他已二十多岁，懂事了。那么，枪走火以后，他紧张吗？”

我赶忙回答：“很紧张，不但紧张，还再三要求按军法处置呢。”

刘志丹弄清了情况后，消除了疑虑。他当即指示：“没伤人还好，打破了菜缸要赔偿，向群众道歉。要教育那个战士知错认错，改了就好，教育部队不能再有类似问题发生。”这个问题，按志丹的要求就这么恰当地处理了。孙继贤为领导对自己的过失没有处分而感激不尽，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红军处理问题通情达理，领导干部都是好人。

第二天横山战斗，我攻城部队遇到了敌火力阻击，几次登城都没有成功。刘志丹令炮兵轰击敌主要火力点——西城外的娘娘庙，配合攻击部队登城。炮架好了打了几炮，没有命中目标，有几发炮弹还落在攻击部队的阵地上。见此情景，大家都急得直跺脚，炮兵也急得直冒汗，眼看就影响整个战斗进展。“要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炮手多好。”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切，孙继贤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他定了定神，毫不犹豫地跑来向我报告说：“我会打炮！”这真是使人喜出望外。我顾不得细问，带他跑到我团政委面前。政委听罢，就带我们向已在我团阵地的刘志丹同志作了报告。刘志丹用信任的目光看了看这位曾经擦机枪走过火的老兵，说了声：“让他试试。”

孙继贤从志丹的目光中得到了支持、信任和期望。他速跑到一门迫击炮前，举起右手，用大拇指测量了距离，把升降机调了几下。为了准确无误，他又测了一次，随手拿起一发炮弹，冷静地说：“官长下令！”

响，整个动作不到一分钟。胡政委一挥手，喊了声：“放！”只见炮弹飞上天空，刚好落在娘娘庙院里的一棵柏树下开花。大家窃窃私语地赞叹道：“他还真有两下子！”再看刘志丹和其它首长，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孙继贤把炮又校正了一下，拿了三发炮弹放在一边，说了声：“官长下令！”

为了抓紧时间，胡政委也顾不得纠正他的称呼，大声下令“放！”“轰！轰！轰！”三发炮弹在娘娘庙院墙内外爆炸，把院墙炸塌了，为攻击部队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战士欢呼雀跃。

刘志丹走过来兴奋地问我：“你们有这样好的人才，为什么不早报告？”

我内疚地说：“根本没发现他还是一个炮兵。”

刘志丹责怪说：“你们的工作太粗糙了。”他告诉胡政委：“靠战斗结束后，尽快把这个同志调给炮兵，要发挥他的特长，要很好爱护他。”战斗打得很激烈，虽歼敌三百多，但我军伤亡也不少。因此，总部命令我部撤出战斗。

我们奉命刚撤蓟城四五里墩附近，从城里飞来一颗流弹，恰巧击中了我们的“神炮手”孙继贤。他“哎哟”一声栽倒在地。我们急忙上前查看，他的左小腿被这颗罪恶的流弹打断了。可孙继贤还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刘志丹要我们爱护这个“人才”，可现在成了这样，咋向他交代呢？我直怨恨这颗子弹为啥偏偏打在他的腿上！

当天下午，部队到了李家坨子吃饭，刘志丹来看望伤员。他一眼看到了孙继贤，感到很吃惊，问我：“他什么时候受伤的？”

我回答说：“快到五里墩时，飞来一颗流弹打伤的，左小腿断了。”刘志丹很惋惜地问：“子弹取出来没有？”“没有。”我同他走到孙继贤跟前。孙继贤见蓟刘志丹来了，想坐起来。刘志丹连忙说：“哦，不要动，不要动，我看看伤得怎么样？”他马上向我交代：“你负责给护送伤员的同志说好，在路上要很好照顾他。并且要给医院负责同志讲清楚，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是一个‘神炮手’，要想方设法给早点治好，

让他好发挥作用。”

听刘志丹同志的赞扬和关怀，孙继贤眼里含着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从他的眼神里，我们懂得孙继贤此时此刻在想什么？

（黄战雷 整理）

盲大娘的心愿

折仲恺

三月的陕北高原，气候虽然还未完全转暖，有时还伴随着阵阵的寒风，飘落点零星的雪花。但毕竟已冬去春来，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特别是红军队伍所到之处，一片热烈气氛，更给人一种春意盎然之感。

193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来到佳县和神木县之间的凉水井宿营，刘志丹也随队来到这里，当地群众闻讯都来欢迎我们。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群众不顾几十里路程，赶来看望刘军长。老人送来儿子，哥哥送来了弟弟，妻子送来丈夫，要求在刘志丹队伍里当红军，打敌人，解放穷苦百姓。欢迎和看望的人群川流不息。那天，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六十来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手执拐杖，由一个年轻小伙挽扶着来到凉水井，边走口里还边叫着：“刘志丹在哪？刘清官在哪？我要看看。”欢迎的群众不解地问：“老大娘，您老人家眼睛不好，怎么看得见老刘呀！”老大娘激动地说：“我是离这十几里地一个小村庄的人，我就这一个儿子（用手摸着挽扶她的小伙），前年被人抓去当兵，是老刘去年带领红军消灭了敌人，救出了我的儿子，使我们母子团圆。今天听说刘志丹要路过这，我专程让儿子扶我来拜见恩人的，我看不见还摸不着吗？”刘军长听罢立即走上前去，站在老人家面前，双手拉着老大娘的手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大娘得知站在她面前的就是刘志丹，心情很激动，用她那一双饱经风霜、长满老茧的手，将刘志丹从脚摸到头，老泪纵横地说：“老刘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今天能见到你，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心愿总算实现了，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啊！你不光使我这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婆子母子团聚，还使许多穷苦百姓家人团聚，你真是咱陕北人民的救命恩人呀！”老人家说着说着，激动得讲不下去了。刘志丹同志连忙把老人家扶住说：“老人家，这全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啊！”

在场的红军战士和欢迎群众，都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志丹查哨

张金铭

1935年8月，我军在绥德县不提沟打了一个大胜仗后，刘志丹率领部队来到延川县冯家坪休整。总指挥部设在村西头一家大院里。我们“少年先锋连”立即派出岗哨进行警戒。到了深夜，天阴沉漆黑，大地象扣上一口大黑锅，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正是我连年纪最小的战士李占山在指挥部门口站哨。只见他背着一支与自己身长差不多的步枪，静静地站在哨位上。凌晨约一点多钟，突然天空电闪雷鸣，震耳欲聋。接着，大雨唰唰地下起来了。不大功夫，地面上水汪汪的。此时，坚守在哨位上的小李全身衣服被雨水淋透。陕北高原的秋夜，本来就有几分寒意，再加上大雨不停，气温急剧下降。小李被冻得牙齿打架咯咯响，浑身直打哆嗦。心想，这时能有一件棉衣穿该多好呀！正在这时，总指挥部院内传来了嚓嚓的脚步声。小李顿时打起精神，注视着渐渐走近的人影。当人影靠近时，小李大声问：“谁呀！”对方连忙回答：“小鬼，我是老刘。”小李听到这温和而熟悉的声音，便知是总指挥刘志丹同志来查哨了。

原来，刘志丹同志不顾一天行军的疲劳，正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工作，聚精会神地思考着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突然，一阵冷风从窗口吹进来，刮灭了油灯。他向窗外看了看，雨仍在不停地下着。这时，他想起了正在冒雨站岗的哨兵。于是，他顺手拿了一件棉衣向院外走去。

志丹同志走到李占山的跟前，非常亲热而关怀地说，“小鬼，辛苦了。”他边说边把手里拿的棉衣往小李身上披。小李连忙推辞说：“首长要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身体要紧，还是留下你自己穿吧。”志丹看到小李推辞，就郑重地说：“我和大家一样，也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应该爱护身体，时刻准备上战场奋勇杀敌。”说话之间，志丹同志一把拽住小李的胳膊，硬是把衣服披在小李的肩上。

然后关心地问：“今年多大了，夜间站岗怕不怕？”小李坚定地回答：“我今年十三岁，打仗、站岗都不怕。”志丹听后满意地拍了一下小李的肩膀！“好小鬼，有你的。”接着，志丹同志又问：“你参加过战斗吗？”“参加过。”小李又接着说：“在高桥寨追歼安塞敌人援兵时，我们都跑到三连前面了。”最后，志丹同志又问：“打靖边城时你去了没有？”小李说：“在兄弟部队还未攻下山顶敌人碉堡时，我们就冲进城里。战斗结束后，我们还在山根下挖出了好多子弹。在南沟岔消灭国民党艾团长的部队时，我们也参加了。”志丹同志听后高兴地说：“你还是一名老战斗员呢。”话说完后，他转身向指挥部走去。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

（李敬申 整理）

本色

孙家裕

1959年2月的一天，驻湖南某军突然接到衡阳火车站电话。从北京来了一行三人，请派车去接。——事先没来电话，坐的是普通客车，随行人员又这么少，嗯，看样子不是大领导。

“只要一个带路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在军政治部通往招待所的路上，法院院长孙家裕心里直犯嘀咕：“那么大个总参谋长，让我这个机关干部去陪同，太不相称了。一转念，又想起军首长给他交待任务时说的话：“去吧，总长不要我们陪同，说只要一个带路的。”想到这里，孙家裕似乎，下增添了勇气，迈开大步，向招待所走去。

“你是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吧？”孙家裕一上楼，就碰见了黄克诚总长。

“报告首长，我是来给您带路的。”孙家裕啪地一个立正，行举手礼，有点慌里慌张。

“欢迎，欢迎，给你添麻烦了。”黄总长十分客气，热情地握手，孙家裕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

“那些人是干啥的？”黄总长指着站在楼门和大门口的干部战士问。

“是为首长布的岗哨。”

“看，看，怕的就是我来了你们兴师动众。”黄总长风趣地摊开双手，笑了笑又说：“这完全没必要，有你就行啦。给你们军长说一下，赶快撤了。”

“这……这……”孙家裕直摸后脑勺。

“那我给他打电话……”

无法，只好撤去了所有哨兵。

“总长丢啦”

第三天吃过晚饭，孙家裕照例来到黄克诚同志的房间，连喊了几声“报告”，没人应。咦？总长不在。赶忙去隔壁房间，王秘书和警卫员刚吃饭回来。一问，都说总长吃完饭前头回来了。三人到处找了一遍，不见踪影。这下可着慌了，孙家裕撒丫子向回跑去。

“报告军长，总长丢啦！”他慌乱之中，有点语无伦次，半天才讲清是怎么回事。

“快，组织人分头去找！”军长象在下命令。说完，自己先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孙家裕找到离军部一里多路的小街上，突然，他听见从一个小院里传出爽朗的笑声。莫不是总长？他赶忙跑进去，啊！总长坐在院中的一块石头上，正跟一位抱着小孩的大娘拉呱呢。

“首长，您在这几。”孙家裕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跟这位大嫂拉拉家常。哦，我出来时忘记告诉你们了。”黄总长笑了笑，又和那位大娘说起话来。

“理应我上门去”

黄克诚同志每到一个地方离开时，都忘不了去看望炊事员和送过他的司机。一次去邵阳地委途中，在邵东县吃了一餐饭。临走时，他专门到伙房，和炊事员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当时，孙家裕没进去。行车途中，他就对孙家裕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应戒骄戒躁，尊重别人，别人为你付出了劳动，就应上门致谢。”

一天下午，黄总长给孙家裕说：“你给衡阳军分区打个电话，问骆司令员在不在家，晚饭后我去看看他。”

孙家裕说：“如果在，就去车接他来。”

“不要这样，既然我要看他，理应我上门去，让他来不礼貌。”

吃罢晚饭，黄总长和孙家裕来到了骆司令员家。那时节，天气还很寒冷，骆司令家生着火箱。这火箱是个约有办公桌大小的木柜子，四边有座位，中间置火盆，湖南一般人家都有。他们就边烤火边谈话。

“吭吭吭……”突然，黄总长剧烈地咳嗽起来。

“总长这几天奔波，太劳累了，又患了重感冒。”孙家裕在一旁说。

“那赶快去医院吧。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也不带个医生。”骆司令关切地劝说着。

黄总长笑了笑：“还能那么娇气，吭吭吭……咱们湖南人烧广柑吃不是可以治咳嗽吗？烧几个怎么样？”

“首长还是老脾气。”骆司令起身拿来几个广柑放进火盆，好大一会才烧熟了。

黄总长先拿出一个，打净灰，递给孙家裕“尝尝”，然后自己拿起一个咀嚼起来。

孙家裕看总长吃得似乎很香，便咬了一日，呀！又苦又涩，皱起眉头闭紧嘴，舌头都不敢动一下。黄总长见状，哈哈大笑，又风趣地说：

“年轻人吃不得苦嗽……”

“一个人 影响多数人不好”

第十天下午，黄克诚同志从某师检查工作回来，一进招待所就问孙家裕：“你能不能想法让我洗个澡？”

“行，我去给街上澡堂的领导说一下，停止营业个把小时。说着，转身就走。“喂，喂。”黄总长赶忙叫住孙家裕：“那不行，我一个人影响多数人不好，还会影响人家澡堂收入呢。”

“那部队没澡堂，怎么……”孙家裕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这么办吧，我看到你们那个厕所里有个澡盆，烧点水就在那里边洗吧。”

“什么？厕所！”孙家裕一听不禁吃了一惊：“那怎么行！天这么冷……”孙家裕憋得脸都红了。

“天冷不要紧，烧一盆木炭就行了嘛。”说完，便让孙家裕和警卫员，一个去生木炭火，一个去伙房里提水。

“颜色褪光了才是本色”

这天夜里，天突然变了，寒风飕飕，一团团乌云在天空滚动。孙家

裕一进门，见黄总长穿上了一件很旧的军呢大衣，就说：“首长，你这件大衣穿得也够意思了，怎么不换件新的？”

“这是抗战时缴获日本人的，不是挺好吗，换新的干啥？”

“你看，黄颜色基本褪没了，皮子烂得都掉下来了。”

“是吗？”黄总长欠着身子看了看，哈哈地笑了：“那黄颜色是染上去的，褪光了才是本色哩。”

本色？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家裕不由心头一动，觉得黄总长的话里似乎有某种寓意。没来得及细想，只见黄总长把那片掉下来的烂皮子捞在手里说：“修一下倒很有必要，不过我总是抽不出时间，你能帮个忙吗？”

“行。”孙家裕立即用自己身上的大衣换下了黄总长的大衣。当天，孙家裕把大衣送到街上一个小裁缝铺里，花了一元五角钱修补了一下又穿在身上了。

“按时到达”

时间过得真快，黄克诚同志下部队一晃半个月了。这天，他要在邵阳地委参加一个会议后回北京，仍是孙家裕跟随送行。

下午，北京突然来电话，要他明天上午八点钟赶到长沙，乘飞机直接去郑州开会。

“总长，晚上的会就不开了吧？”地委领导赶来问。

“按原计划进行。”

……

“铛，铛……”时钟以敲过十下，地委会议室里仍亮着灯光。

“看样子总长今天不会走了？”在另一个房间里，孙家裕向警卫员投去询问的目光。

“难说。”警卫员摇了摇头。

听了这话，孙家裕焦急的心情又添了一层忧虑，快步向屋外走去。

“唉呀，起雾啦！”孙家裕大声地喊道。

警卫员出门一看：浓重的自雾笼罩着大地。

“总长这一下肯定不会走了。”孙家裕坚定了自己信念。

这时，黄总长和地委领导同志走出会议室。

“马上出发，按时到达。”黄总长一进门就说。

“首长……”孙家裕嘴唇刚动了一下，王秘书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悄声说：“再说也无用。”孙家裕只好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吃了一点简单的夜餐，黄总长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就冲破浓雾缓缓向前。霎时，车窗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防雾灯也难以阻止浓雾的侵袭；刮雨器不知疲倦地来回摇摆，孙家裕的心提到了喉咙眼：十公尺外看不见地面和任何目标，路两旁不时有停驶的车辆……

他再也忍不住了，真想说一句“回去吧，总长。”可是，当他看到黄总长那坚定而沉着的神色，便转了话头：“首长，你看路边那么多车都不敢走了。”

“哦。”黄总长微笑着转过身来：“生活中许多现象是令人回味的，不敢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敢让了路。”他又指了指车外：“你们看，他们不敢走了，路上车很少，不就等于给咱们的车让路啦。”

……

就这样，黄克诚同志连夜行车近八个小时，按时赶上了飞机。当他登上机仓口，频频招手时，孙家裕看见黄克诚身上那件大衣的颜色，是那样洁净。

（王俊魁 整理）

彭雪枫同志的故事

纪 锋

“如果是别的同志，怎么办呢”？

1941年5月，彭雪枫任新四军四师师长，邓子恢同志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同年九月，彭雪枫和林颖结婚。邓政委对他俩的事很关心，建议把林颖从地方调到部队来工作。彭师长怕影响工作，没有同意。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颖同志看望彭师长后，要返回工作单位去。但天不作美，忽然下起大雨来。锥子雨越下越大，箭头风越刮越猛，天慢慢地暗下来。林颖不断地用两眼瞅着天空，雨丝毫没有停的兆头，她开始有些犯难了。警卫班的小鬼们也为她心急火燎，早就把马给备好了。但是，大伙都知道师长的脾气，谁也不敢开口，更不敢擅自作主。屋外风急雨紧，屋内彭师长却坐着不动声色地批阅文件、电报。警卫班的小鬼们你看着我，我瞧瞧你，都有些憋不住了。大伙使眼色推举文书小王为代表，替林颖向师长说情。小王不负重托，走到师长跟前说：“师长，你就答应派马送一下林大姐吧！”彭师长听后没有马上回答，只见他脸色略沉了一下，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大伙，又看了一下门外，显然这个情况他是考虑过的。接着，他用平静温和而又坚定的语气说：“如果是别的同志，怎么办呢？没有马，下雨，难道我们就不能行军、打仗了吗？”他的话很象是老师在考问学生，屋子里一下子静极了，只听见屋外令人讨厌的风雨声。这时，只见林颖将裤脚高高卷起，鞋子一脱，拎在手里，向门外走去。彭师长这才满意地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大伙一直望着林颖一步一滑的背影，消失在风雨交加的苍茫暮色之中。

“端出去，分给同志们吃了！”

有一次，彭师长和张震参谋长到某营检查训练工作。吃中午饭的时候，营里干部感到首长不常来，就叫炊事班另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鸡蛋炒粉条，一个是虾皮炒韭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这就算是特别照顾

了。菜刚刚端上桌子，彭师长就把营长、教导员叫来问道：“战士今天都吃同样的菜吗？”“不是，是因为首长来了，增加了两个菜。”彭师长马上以严肃的口气说：“端回去，分给同志们吃了！”跟随彭师长检查工作的几位参谋从旁边劝说道：“已经做了，首长就吃了吧！下次不做就是了！”“不行！这次吃了，下次还会做！”过了一会儿，彭师长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现在是抗战时期，部队供应很差，生活是困难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就更艰苦。我们如果特殊了，就脱离了群众，谁还支持我们，相信我们啊？”营里干部听了彭师长的话，就把增加的两个菜端了回去，换上了菜汤，彭师长这才和大家有说有笑地吃起午饭来。他边吃边风趣地拿起细长的山芋和高粱面窝窝头说：“我们吃的是无产阶级的‘香肠’和‘牛肉干’呢！老百姓不是说杂面窝窝蘸辣椒，越吃越添膘吗？我看这就很好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雪枫堤”

1942年8月，正是淮北地区的雨季。国民党只管鱼肉百姓，从来不管人民的死活。淮河沿岸的堤坝连年失修，每逢雨季人民群众总是提心吊胆。这年雨比往年下得猛，接连几场暴雨，淮河水位急剧上涨，洪水咆哮着拍打堤坝，险情危在旦夕。当时，彭师长正在开会。他闻讯后，心想再也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双重灾害了。于是，他立即停止开会，带领部队，冒雨沿河查险情、堵决口。时近中午，彭师长刚来到大柳巷，暴雨也接踵而来。一时间狂风卷着暴雨，暴雨助着洪水，像一头猛兽向堤坝扑来。倾盆大雨浇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地方上的宋区长看彭师长面容消瘦，身体不好，就劝说道：“雨大风急，又没雨具，彭师长你等雨小些再上堤吧？”彭师长大声说：“我能等，淮河水不能等啊！”说话之间，就听“哗”的一声，堤坝决了一个几丈长的大缺口，洪水向堤外猛冲出来。彭师长大喊：“同志们，决堤了！冲上去，堵住它！”喊声未落，只见彭师长随手抱起一大捆麦秸，纵身跳入急流之中。同志们见师长跳入水中，紧接着都跳了下去。附近的群众也闻讯赶来全力抢险。彭师长指挥两千多军民，在风雨中打木桩、堆草袋，和洪水展开了

激烈的搏斗。从当日下午开始，一直战斗到第二天天明，终于把缺口堵住，把洪水制服了。他望着洪水驯服地滔滔东去，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驻地。接着，彭师长又抽调三个连的兵力，和当地群众一起，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面加固了东西长四十余里、宽十多米的堤坝，冬季又在堤坝上植了树。大柳巷的人民群众每当看到蜿蜒伸展的大坝，对为民造福的人民军队，对敬爱的彭师长赞不绝口。

1944年9月，师彭长在河南夏邑县指挥八里庄战斗中英勇身，疆耗传来，大柳巷的人民群众，无不捶胸顿足，泣不成声。为了纪念这位战功卓著的抗日英雄、爱民模范，当地人民群众就把大柳巷这段新修的淮河防洪大堤，命名为“雪枫堤”。这位革命先烈的光辉名字，伴随着大堤万古长存。

“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

彭雪枫同志重视用文艺武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鼓舞人民奋起抗日。早在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时就创建和培育起一朵文艺鲜花——“拂晓剧团”。这朵文艺园地中的奇花，深受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爱戴。群众都亲切地称它为“彭家班”。

1939年冬天，徐海东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由陕北延安到华中敌后淮南新四军二支队任支队长时，要路过新四军六支队驻地涡阳县的新集。彭雪枫司令员闻讯后，指示“拂晓剧团”抓紧准备一台文娱晚会，隆重地欢迎徐海东同志光临。剧团接到任务后，只有一天多的准备时间，但他们就地取材，集体创作了一出《徐海东将军粉碎日寇扫荡》的京剧，突出排练，第二天晚上就在欢迎晚会上演出。文艺晚会开始后，只见帷幕拉开，在锣鼓声中，日军一名指挥官上场，自报身份道：“吾乃武贵八郎是也，今日奉命扫荡徐海东部八路军。只因久闻徐将军骁勇善战，此行恐怕凶多吉少，不免令我胆颤心惊……”

接着，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扮演徐海东将军的演员上场了，只见他撩战袍，舞战刀，亮相后报名道：“吾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氏，窑工出身……”

这时，正在台下观众席上陪同徐海东同志看戏的彭雪枫同志不禁仰头哈哈大笑起来。他对徐海东同志说：“昨天我才交待他们搞一个晚会欢迎你，不想今天他们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戏，而且是就地取材，连你是湖北人，窑工出身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写进戏中……”

徐海东同志也连连点头称赞：“演得好，演得好，你们这里人才多啊。”同时又惊奇地问起：“在敌后的艰苦环境里，你们是从哪里弄来这套京剧行头的？”

坐在他身后的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拂晓剧团’，是我们游击支队东征敌后途中组建的。因为他们善于自编自演抗战内容的京剧，深受这一带老乡们的欢迎，群众叫他们是‘彭家班’……这些行头嘛，也是就地取材，你看那战袍，是将颜色画在布上，再将布糊在硬纸片上，有的是贴上金纸缝制成的，汽灯一照真是金光闪闪哩！”徐海东同志听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他说：“搞得好，雪枫同志这‘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晓军 严武 整理）

跟彭雪枫师长在一起的日子

杜国军

—

我第一次见到彭师长是在1937年冬，那时，他是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处长。我刚到办事处通信班当通信员。在十二月的寒冬里，外面下着大雪，我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呢大衣，在办事处同志们中间，显得很特殊。站岗送信时我穿着那件呢大衣显得很神气。有一天我在门口站岗，彭处长在内办公。忽然里面叫了一声“通信员！”我回答了一声“有！”立即走了进去。他望着我。像是开玩笑又象是批评的说：“嗨！穿着呢子大衣，架子可不小哩！”过后我想，这个处长真有点怪，一定不好接近。

谁想到了晚上他又派人来找我。我心里噗通噗通直跳，以为我又犯了什么错误要挨批评。我走进办公室，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接着，问我什么时候参军，在那个部队，干过些什么，我不安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我告诉他：“我是1933年入伍的，原在四方面军工作，来办事处前在一二九师当通信排长。”他又问：“你还想当通信员吗？”我说：“愿意。”他说。“为革命多负责任是应该的，不会就学，有什么难的！”

这是彭师长和我第一次谈话。当晚我又想，处长虽有点挑毛病，倒是怪和气的。从那以后，我常常给他送信。有两次我把信送到临汾大柳庄北方局杨尚昆书记那里，接信的是杨书记的爱人李伯钊同志。送信回去后，处长向我要收条，我伸出手去给他看，他笑着念出：“收到”两个字，说：“很好！”第一次得到了处长的夸奖，我高兴地想：“处长还是蛮好的！”

不久，办事处领回了几挺苏式转盘机枪，崭新的家伙，扛起来挺得劲儿。这时上级要我当通信班长，我说啥都不肯干，非要去当机枪手不可。处长又找我谈话，批评了一顿，结果还是没去成。因我还没入党，他就问我：“我们军队是谁领导的？”我说：“共产党呗！”心想这个你还能考得住我。他又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兵，还没入党，真丢人！”

这一下说到我的短处，心里怪难受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晚上他又把我叫去。进到屋里，他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我搬了张凳子让他坐下。他要我去再搬个凳子，我莫名其妙地问：“还有谁来坐呀！”“你坐嘛！”他指着我说。我挨他坐下，他就亲亲热热地给我拉起家常来，问我在家干过什么？我说：“放年呗！”他又问：“你在家一定很调皮吧？”并自我介绍说：“是呀，我在家时也是调皮得很，就爱骂地主，有一次把地主儿子的脑壳打破了，闯了祸，才跑出来的。”过一会儿，他又问：“你想入党吗？”我想了想说：“我行吗？”他点点头说：“你看行不行？”接着，就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的话通俗动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段：“为了党的事业，共产党员要不怕苦不怕死，直到最后一口气。比如说，党派我作统战工作，这个工作是危险的，但是共产党员在执行党的决定时，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当晚我们一直由黄昏谈到深夜十点多钟，他越谈越精神，一点不知疲倦。最后，还是我提出：“处长，休息吧。”才结束了这次谈话。以后他经常找我谈话，但这次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晚上，是彭师长给我最难忘的一次谈话，因为这是他培育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一次谈话。

二

1938年2月，我们30多人跟着彭雪枫同志离开太原办事处，到淮北敌后进行抗日。经过八夫行军，过潼关，渡黄河，来到河南确山竹沟。七个月后，我们又从竹沟出发，部队增加到305个人。没有番号，彭处长说：“就叫新四军游击支队吧。”

从竹沟到西华的行军途中，没有交通工具，全部东西肩挑背扛，处长和我们一样背着35发子弹和一个小包，包内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我们给他准备了一匹骡子，他执意不肯骑，让骡子驮东西。我几次劝他骑上，他生气地说：“我也是人，为什么大家都走路，我要骑马呢？”

一路上，他还帮助伙夫挑担子。到了集镇，他要亲自去交涉事情，出于礼节，他卸下身上的子弹袋和小包袱，对我说：“请给我保存一会儿。”回来后，又把子弹袋和那小包袱夺了过去重新背在身上。

八月，我们到了河南西华，与吴芝圃同志领导的三支队汇合，编为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经过两星期的整编，我们这支一千多人的抗日部队转战鹿邑、亳州、睢杞一带。

1938年冬到1939年三、四月间，部队开到河南永城。这是河南最贫困的地方，军队没有供给，筹不上款，连吃菜的钱都没有。我们每天把打仗缴获的骡马牵到集市上卖，再买回二尺多长的老菠菜，拿师长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秦琼卖马”的时期。眼看阳历年到了，我们还是地瓜窝窝头，窝窝头地瓜。那时一团驻的地方富些，他们搞了点面，要吃顿馒头过年。一团长张海生同志知道师部没有“年饭”吃，就叫通信员老远给师长送来一袋馒头。师长满意地收下了。他叫我把馒头送到伙房去，并说：“我们可以凑合着过一个年了！”我犹豫地说：“师长，这是张团长给你的嘛？”他说：“师长的还不是大家的，快拿走。”我又试探着问：“拿几个出来行不行？”他干脆回答我：“一个也不留！”第二天炊事员倒出来一数，不多不少正好八十一个。我们师部一百多人，怎么分呢？可把司务长难坏了。炊事员们提出了处理方案：首长一人分三个，其他的人两人分一个。到过年的那天，我们每人分了四两红薯，一个窝窝头，半个馒头，一盘塘虾炒辣椒。师长一看就知道司务长弄了鬼，问道：“大伙怎么分的？”老王停了停说：“两人一个。”师长说：“我为什么要特殊呢？”老王说：“你是师长，责任重，应该特殊嘛！”师长笑了笑没说话，三个馒头没有吃，他只吃了几个红薯。第二天，警卫员把三个又冷又硬的馒头送回伙房去了。

这是一顿不平凡的年饭，战士们很快编了一个顺口溜，一直唱了好久。大意是：大年初一吃地瓜，个个吃得笑哈哈。师长爱兵分馒头，两人一个刚刚够。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菠菜三尺长，杆子当号吹，上阵猛劲杀，明日赶集要卖马。

1939年10月，我跟师长从抗大四分校返回师部（他兼四分校校长），经过蒙城曹市集，就便到一营去看了看。一营长专门从市镇的小馆子叫了八个菜，请师长吃饭。师长一看就问：“你们今天会餐吗？”营长说：“师长不常来，没什么招待，到馆子叫了这席便饭。”师长幽默地说：

“嘿！这还是便饭？我又不是贵宾，你们谁做谁吃谁给钱。”结果只吃了三个高粱面花卷就走了。后来他不管大会小会苦口婆心地到处讲，提倡艰苦奋斗，反对生活特殊，与人民与士兵同甘共苦。他不管到那个部队，碰上饭熟了，就跟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一顿。

有一次，一个从上海来的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给他带来了一包肉松，他把我叫去吃，问我：“这是什么？”我说：“黄烟。”他笑着说：“土包子，开点洋荤吧！”

三

彭师长对下级对士兵有一颗慈母般的心，但对部属的教育是严格的。他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维护人民利益，记得他有一句名言：“对敌人要象猛虎，对党对人民要象绵羊。”

有一次骑兵团打完仗，路过一个庄子小歇，看到村前一园梨树，果实累累，战士们直往肚里咽口水。有的找“窍门”，把马拴在梨树上，马抖动树干，这样就可以吃“从地上拾来的梨子了。”还没等部队回到驻地，师长就知道这件事了。他马上把全团人集中到师部，训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批评完后还问：“高兴不高兴，舒服不舒服，再犯不犯？”说得每个人又难过又愉快，对师长又怕又爱。

我们部队每离开一地，总要反复检查群众纪律。为了更好地听取群众意见，师长告诉警卫员：“凡是老乡来见，不论什么时间，不管男女老少都不准阻拦。”久而久之，“凡事见师长”几乎成了群众的习惯。师长不问事大事小，总是热情地接待来访的群众，细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严肃而及时的处理问题。比如有几次马夫把马拴在树上啃掉了树皮，马脱了缰绳吃了青苗，师长听了一个老乡的报告，一边安慰他，一边派人调查处理，为了这些事情，师长用了不少休息时间。有时我不耐烦地对师长说：“这些事情交政治部门处理不行吗？”师长说：“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本质。老乡找上门来是好事，如果是国民党的军队，有谁敢去找他们的师长呢？”

这样一来，在泗县、洪泽县一带的群众中很少有不认识彭师长的，不

知道他的人就更少了。有些大爷大娘不叫彭师长，而称他“彭青天。”

(舒鼎云 胡范 整理)

罗炳辉同志的故事

易 辉

“弹无虚发的“神枪手”

被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做神行太保戴宗的罗炳辉将军，不仅是一位晓行一百三，夜走八十里的“飞毛腿”，而且还是一位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呢。记得我们二师在淮南的时候，他住的房子背后紧靠着一条小河，河对岸一片开阔地，长满了庄稼，其中杂生着灌木丛和竹子。一个初秋的夜晚，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夜乌漆墨黑。从河对岸的小丛林里，传来一只夜间打食的獾子吱吱不停的叫声。在夜间这叫声听得格外清楚，使人有点毛骨悚然，大家都十分厌恶，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可能是獾子的叫声把罗师长给吵醒了。只见他拿起心爱的“汉阳造”，冒雨走到屋子后面的小河边，端起枪，静静地听那山獾子的叫声。听着听着——叭地一声打了过去，叫声嘎然而止。

第二天早晨，警卫员们到对岸的庄稼地里把打死的山獾子拾了回来，大家还美餐了一顿呢。

记得我们二师攻打来安城时，行军途中住在达舜山靠南边不远的梁庄。当同志们正在擦拭保养武器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到我们跟前，她郑重的问道：“你们擦枪磨刀是准备打东洋鬼子吧？”

“是的”战士们响亮地回答“我们新四军就是打鬼子的。”

老太太笑着点点头：“打吧，狠狠地打！打走了那些害人贼，庄稼人才有太平日子！”

说话间，一个放猪的干瘦老头儿，赶着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肥猪走到跟前，停下了脚步，看了看我们手中的刀枪，凑到跟前惶惑的说：“鬼子有飞机、钢炮、铁甲车，你们靠这些兵器打鬼子，能行？”

“行哪”大个子小李拍拍手中枪说：“别小看这些老套筒子，‘汉阳造’，拿在我们手里，照样能打败鬼子的飞机、大炮、铁甲车！”

“说得对”人群后面响起洪钟般的声音。回头一看，罗师长不知什

么时候走到了我们身后。

罗师长正说话间，忽然听到“喳喳喳”一阵鸟叫，抬头看时，场子对面的槐树梢头飞来一只喜鹊，翘着长尾巴，喳喳乱叫，蹦来跳去。罗师长敏捷地拿过身旁战士手中的一支老套筒子，手举枪响，只听“砰”地一声，枝头喜鹊应声落地。孩子们争先恐后地飞跑过去，拾起喜鹊一看，呵！脑袋没啦。

人群中响起一阵“啧啧”的赞叹声。

“老套筒子管不管用”战士们笑着问放猪的老头儿。“管用！管用！”老头儿笑着说。

罗师长笑容满面地跟老乡们打招呼。大家一拥而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的水泄不通。罗师长就抓住有利时机向群众进行宣传，详细讲解我们如何运用劣势装备的大刀、长矛，打败拥有飞机、大炮、铁甲车等优势装备的日本鬼子的道理。

群众抗日的情绪和信心鼓舞起来了，大刀、长矛、锄头、土枪、土炮，都成了杀敌的武器。

对罗师长的枪法我们二师的干部战士没有不敬佩的。一次我们围着他问：“师长，你的枪怎么打得这么准呢？”他笑了笑说。“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都是炼出来的呗。你们要刻苦炼呀，这里面出战斗力哩。”他每次深入连队检查工作，总是要求部队勤学苦练，并亲自给部队规定，每天教练前，都要进行二十分钟的立姿瞄准训练。

罗师长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培养起来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却在我们部队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一篮榆叶见真情

1940年春天，玉米苗刚刚出土，麦子还没有抽穗，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由于日寇的抢掠，国民党的长期盘剥搜刮，人民群众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

当时我们二师部队驻在江苏盱眙县东南一带打击日本鬼子。那时，

在当地还没有建立起敌后抗日政权，部队的衣食来源相当困难。战士们个个面容消瘦，肤有饥色。炊事班长看到战士们常常因吃不饱饭，把裤腰带紧了又紧再去参加训练、行军打仗，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每当部队行军，在一个地方住下时，他们总是走东家访西家，想方设法搞粮食、买吃的东西。可是，一眼望去田野到处都是挖野菜、摘树叶的饥肠辘辘的老百姓，又到哪里搞粮食呢？

一天黄昏，战士们正在讨论打鬼子的办法，看到炊事班长手提一只大竹篮子高高兴兴的走来。大伙都以为班长搞来了什么好吃的，抢着和他打招呼，不约而同地围了上去，一看，原来是一篮嫩嫩的榆树叶。通讯班的两个小鬼有点失望。老班长看见大家有点扫兴，便摇晃着篮子说：“春天的榆树叶，嫩汪汪，甜丝丝，和上两碗玉米面，再搁一点盐，做一锅榆叶面饼，嘿！香甜嘎崩脆，要多美有多美！”大家被他“苦中作乐”的一逗，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两个小鬼在家里吃过榆树叶的，深知榆树叶子涩苦的滋味。

小张把头一偏小嘴一撇说：“骗人！这东西我吃过，吃得多了你屎都拉不下来……”

老班长一听，神情陡然严肃起来：“小张呀，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摘还摘不到呢，我是爬到树梢头才摘了这么一点点，拿回来给大家凑合一顿。我身上还划破了好几处呢！……”

大伙一听不由得心中有点内疚，同时也升起了对老班长的敬意。两个小鬼也高兴地抢过竹篮子，帮助老班长送到伙房。

不一会儿，忽然从罗师长的住房里传出批评人的声音，听声音很严厉：“……你跟群众讲了吗？你摘了群众的榆树叶，那群众吃什么？你脑子想到没有？你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大伙轻轻走到窗洞口朝里一望，都一下子怔住了，刚才欢天喜地的炊事班长，现在却耷拉着脑袋站在罗师长面前。罗师长神色严峻，一个手指在桌子上敲着，十分恼怒地说：“同志，现在是春天，青黄不接，群众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衣食无着的时候，靠这些树叶救命度春荒哩！我们怎么能争吃群众的救命粮！”老班长脑门直冒汗，不住地搔着头，嘴里嘟囔着说：“我只想

到，嗨！——”“你呀”罗师长接过他的话头，语气显得温和了些：“你只想到战士，还有我这个当官的是不是？”炊事班长点了点头。罗师长接着说：“同志呀！我们要时刻想到群众，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罗师长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又走到炊事班长面前，声调显得特别温和地问道：“你在家吃过榆叶野菜吗？”“吃过。”炊事班长低声回答，“连观音土也吃过。”“是啊！”罗师长点了点头继续说：“我们是人民军队，不能穿上几年军装就把群众的疾苦都忘了啊！”

老班长颤抖着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只见他眼里涌出几滴泪水。夕阳从屋顶的小天窗挤了进去，投下了一线金色的光柱，照亮了罗师长英武、刚毅的脸。从窗口钻进来的春风，轻轻掀起炊事班长的白色围裙，罗师长默默地注视着他，注视着那麻花斑斑带有油污的围裙，深沉的目光中交织着责备和爱抚……。

事后，罗师长让直属队的王指导员陪同炊事班长，拎着一篮绿茸茸的散发出袭人清香的榆树叶，送还给了老乡们，并向群众赔礼道歉。

这一篮榆树叶子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军队不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才得到人民群众信任、支持和拥护的吗？！

（晓军 岩武 整理）

本 钱

王俊魁 周福昌

1942年初春，陕西的关中地区已雪化冰解，而陕北仍很寒冷。这天天刚蒙蒙亮，在三五九旅旅部的住地金盆湾，特务连的战士们正忙着打窑洞。突然，战士谢光智连颠带跑地来到工地，声音大得像高音喇叭：“王旅长在自己住的山坡上开荒罗！”这个消息，如滚煎的油锅里滴进了水，在全连一下炸开了……特务连谁不熟悉王震旅长呢！战斗中，他总是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精神抖擞地来往于前沿阵地；战斗紧急关头，他一马当先，带领部队冲杀。平时，他常卧在地上给战士们作射击示范。有些连队的司务长根据家乡的习俗，杀了猪扔掉下水；有的炊事员不懂烹调技术，有猪肉做不出好菜来。王旅长亲自为旅司务长做杀猪、炒菜的表演，用猪的肝、心、肺、肠、蹄和肥肉、瘦肉，做出各式各样的菜来，叫司务长们当场品尝。看了旅长从杀猪、烫猪、拔毛，开膛到掌勺的全过程，谁不啧啧叫绝！南泥湾的千山万壑，原始森林，哪一处没留下他的足迹？哪个地方适宜种包米、谷子、水稻，哪里有珍贵木材，他都了如指掌。骑兵大队在李子沟的牧场，就是他进行勘察时发现的。秋收前，他亲自设计了防潮、防鼠、闸门自由开闭的“土仓库”。锄地时，他总是亲自到田间检查，发现有的连队生搬硬套开荒中的经验，只重数量，不问质量的情况，就及时提出了“精耕细作”，“锄草如绣花”的指示，还亲自为大家做锄草的示范……如今，他又亲自开荒了。

特务连住地离旅部约三百米，战士们为了证实这件事，都跑去看。嗨，果真是！旅长穿着单衫，卷着裤筒，高抡镢头，“嗨！嗨！”地干的正起劲哩。

南泥湾一带都是黄土和黑土。阳坡地是黄土，土很粘，长满了一丛丛狼牙刺，拔除一窝狼牙刺“据点”，往往身上要被刺伤好几处。阴坡地是黑土，掏一把简直可以挤出“油”来，讨厌的是处长满了黑松林。这黑松林本质坚硬，根又生得牢固，消灭它可真不容易！更何况是坚硬

如铁的冻土，一镢头下去，往往只啃个白点，又把镢头弹了回来，震得人不是手麻臂痛，就是裂了虎口。开头一段时间，多少小伙子满手的血泡，端碗拿筷子手臂不听使唤，晚上睡觉躺下去时，还得呲牙裂嘴喊娘哩。只见王旅长每挖一镢，都是把镢头高高举起，狠狠落下，一两镢就开了一大块土，把许多战士看得只吐舌头。尽管他穿得很单薄，可背上却湿漉漉的，额头上布满了米粒似的汗珠。战士们望着旅长身后拾起的几大堆杂草树根和新开的一大块荒地，感动地说：“旅长，休息一会吧。”

“旅长，你工作那样忙，开荒任务由我们来完成，你要注意身体。”说着，几个战士就去夺他手里的镢头。王旅长把镢头往身旁一藏，拦住了战士，哈哈大笑。接着，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你们说得不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要当心，可劳动是咱共产党当官的本钱啊！不劳动，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高高在上，变为官老爷……毛主席的工作比我忙多了，还自己种一块菜地呢。”说完，使劲向手心吐了口唾沫。站在前面的一个战士见旅长还要干，立即跨上前去，又要夺镢头，没想到被后面几个战士扯住了：“算啦，你忘了在绥德警备区时，旅长取消公务员的事啦？”

哦，谁能忘记呢！那时为了解决全旅的被服问题，王旅长带头，全旅一律取消公务员，把这些小鬼组织起来办“大光纺织厂”。许多领导找到他说：“旅长，我们不要可以，你应该有个公务员。”“我？为什么？现在多一个人劳动，就多一份成果。我也有两只手，我的活自己还不会干？”王旅长的回答，就象铁板上钉钉，谁还能再说什么呢？想到这里，想再夺下王旅长手中镢头的战士，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退，和大家一起深情地望着旅长，眼眶里一下涌满了泪水。是啊！我们的王旅长在什么时候都没有丢掉自己的本钱……

威斗何绍南

郭文贤 白二龙

1939年9月的一天，飒飒的秋风卷起地面的沙尘，横扫干枯的树叶，发出“呜——沙——”的啸鸣。只见从绥德城埝房疙瘩营房内，走出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来，特别是那位清瘦高个的青年，表情严肃，步伐坚定，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永往直前的豪气。他，就是名扬中外、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他昨天刚率领部队主力由山西抗日前线进驻绥德警备区，今天又干什么去呢？

这埝房疙瘩营房，是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距此约一里多路，就住着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这个家伙的确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货色，反共磨擦的专家，藏着一肚子坏水的大坏蛋。他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友情”甚笃；同时又颇得蒋介石的器重，曾任国民党四川自贡市市长。绥德警备区的几个县，原属陕北根据地，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被蒋介石趁机侵占。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协议后，这个地区的防务又划给了我们。但是，政权还在何绍南这类顽固派手里。他们要尽各种阴谋手段，暗算八路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何绍南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约四百余人，收买了“铲共义勇队”和一群兵痞、土匪，合编了五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磨擦，企图赶走我军。今天，王旅长是专门去给何绍南一个下马威的。

嗨！何绍南还真有那么点派头：沿途哨兵密布，个个全副武装，满脸杀气腾腾，门口的哨兵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可是，王旅长却视若无人，快步跨进何绍南的客厅。急忙出迎的何专员，还没来得及挂出笑脸，只听“拍”的一声——漆黑的桌面上，出现了一支铮亮的日本大眼盒子枪。紧接着就是一声霹雳：“何专员，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何绍南早闻王震大名，今天见！他亲自登门，知道情况不妙，心里已有几分胆怯，又见王震疾言厉色和那支大眼盒子，更是作贼心虚，额头上一下

渗出了一层冷汗，差点没筛起糠来。但他毕竟是反共老手，摇摇头稍一镇静，便满脸堆笑：“王将军，这是何必呢？我们都是为了抗日，有话好商量。”王旅长一声冷笑，质问：“既然都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有意制造磨擦，故意刁难我们，不给我们粮食和给养？”“这……这……”何绍南瞠目结舌，脸上青一阵，黄一阵。王旅长步步紧逼：“……你要不悬崖勒马，就决没有好下场！”说完，拾起大烟盒子，使劲往腰间一插，转身大步走去。何绍南一边向外送着，一边连连点头称是。

然而，狗总要吃屎的，何绍南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知道王震同志的厉害，便明的不行来暗的，硬的不行来软的，不长时间，又做了不少捣乱破坏、制造磨擦的坏事。王震同志决定在和专署联合召开的联欢会上，公开揭露何绍南的罪行，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有的同志说何绍南人面兽心，顽固透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担心王震同志的安全，建议将有些事情放在会后再跟他算账。王震同志轻蔑地笑了笑，将帽子使劲往桌上一甩：“他敢！”

这天上午，有驻绥德的党、政、军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在埝房疙瘩大操场召开了。王震等旅首长和何绍南，各党派代表以及各县县长，都坐在主席台上。我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身穿灰军装，打着裹腿，全副武装，整整齐齐地站在大操场一边。何绍南的部队和武装民团象一群乌鸦，乱七八糟地站在操场另一边。大会一开始，自作聪明的何绍南抢先发言。他先假惺惺地欢迎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进驻绥德，要求他的地方武装同八路军搞好关系，巩固统一战线。转而就颠倒黑白，含沙射影，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说：“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后，社会治安变得很不安定。你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打日本，跑回后方来干什么？你们是怕日本人不敢打了，跑回来破坏统一战线，白吃老百姓的饭……”

“到底是谁不打日本？是谁破坏统一战线？你何绍南见过日本人吗？你那么多武装，到过抗日前线吗？你们和日本人拼过刺刀吗？”听着何绍南在那里信口雌黄，王旅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手提铁皮喇叭话筒，大步走到台前，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象发连珠炮似的质问。

何绍南噤着向后边退边说：“后方有后方的任务，我们支援前线

嘛。”随即就一屁股坐在后台的椅子上。

“你在后方执行什么任务？你对抗日前线支援过什么？”王旅长面向台下，历数何绍南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台下群众听着王震同志讲的一件件铁的事实，个个义愤填膺，很多人站起来质问。“何绍南，你究竟安的什么心？”“有本事去打日本鬼子嘛！”“何绍南，你当面给我们说清楚！……”一时间，怒骂声，斥责声，呼口号声，如大海的狂涛，响成一片。此时，以老练持重自称的何绍南如坐针毡，坐立不安；又象吃多了辣椒，鼻尖上沁出汗珠来——他万万没有想到王震把他的罪行掌握得如此清楚。他几次想起来狡辩，可是，王震同志的英雄气概，义正词严的谴责，和台下那数不清的愤怒眼睛，使他的脸胀得象块猪肝，没有勇气让屁股离开椅子，完全象泄了气的皮球，嘴巴紧张而剧烈地抽动了几下，就瘫在椅子上了。原来台下打口哨，高声乱叫，甚至摆弄枪支、企图扰乱会场秩序、打断王震同志讲话的坏家伙，这时也象霜打了似的耷拉下脑袋，眼皮都不敢抬一下。

……

1939年12月，何绍南在其阴谋一个接一个地失败后，狗急跳墙，纠集了十三个保安队和他的部队一起，公开向我发动武装进攻，妄图用武力把我们赶出绥德。我三五九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王震同志的指挥下，立即展开反击，一鼓作气将何绍南的武装大部歼灭。磨擦专家何绍南如丧家犬，带着少数随从夹着尾巴逃出了绥德警备区。至此，绥德警备区面貌一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保证了党中央与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

（王俊魁 周福昌 整理）

宽待俘虏

王玉崑

1946年7月，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从湖北突围，7月底到达陕南后向边区进军。为了迎接王震同志和三五九旅，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党中央决定打一次较大的战役。这次战役就叫“迎王战斗”。

三五九旅返回边区后，旅部驻在孟坝镇，王震旅长住在县政府。“迎王战斗”结束后，部队返回驻地的当天下午，我和团政委秦武山以及团里其他首长，一起到孟坝看望三五九旅的同志们，并去县政府看望了王震旅长，汇报我们营的战斗情况。

这天，王旅长穿一身黑蓝色制服，留着黑油油的长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灰白色的博士帽。一见面，王旅长就表扬我们说：“仗打得不错，很漂亮，消灭了多少敌人，抓了多少俘虏？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大约消灭了四、五百敌人，抓了二百多俘虏，都交给后方了，怎么处理的还不知道。”

秦政委马上接着说：“现在俘虏都在保安科押着，其中还有一个中校团副呢。”

王旅长说：“好，那就把那个中校团副叫来吧。”

我心里想，对，就是要好好训他一顿，这伙敌人把镇原县太平镇的人民欺压得够苦了。每到春耕、秋收季节，他们都要捣乱破坏，干尽了坏事，这次不能轻饶了他。

一会儿，两名战士押来了那个中校团副。只见他低着头，弯着腰，进门喊了声“报告”，敬个礼后便站到一边，一幅狼狈象。看他这个样子，我不由得喝了一声：“站好，老实点！”

王旅长冲我摆摆手，指着凳子对那个团副说。“请你坐下”。接着，王旅长叫我倒水给他喝。

王旅长象拉家常似的问那团副“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团长也是湖南人。”那个团副回答说。

“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干什么的？”

“我家里并不富裕，为了谋生，进了国民党军官学校，出来当了排长、连长，抗日战争时期，混了一个中校团副。”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王旅长笑着说：“你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说起来还是乡亲呢，可走的道路不一样。我们共产党是为解放人类，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你们一边反共，一边抗日，实际上反共是真，抗日是假，你们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又发动了反共高潮。你不要认为现在蒋介石还有几个兵，但国民党一定要垮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改邪归正，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要做人民的罪人。共产党宽待俘虏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请你自选出路吧。”

敌中校团副马上站起来连声说：“我是有罪的，长官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愿听长官吩咐，怎么处理我都行。”

王旅长说：“我是要你弃暗投明，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成为人民的罪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久，我们就要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里有一封信，请带回去交给你们团长，今天就送你出去，保证你安全出境。”

敌中校团副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连声说：“是，是，谢谢长官。”这个敌中校团副回去后，果然作了宣传，通过他做工作，镇原县的敌人比过去老实多了，很少出来干坏事。我们俩方相处也没有过去那么紧张激烈了，尤其在生产贸易上还给了我们一些方便。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我边区实行经济上封锁，军事上进攻的反动政策，我军困难重重，就连做棉衣的棉花、布匹都要从外地运来，武器弹药也得靠钱买。为了度过难关，我们利用这个敌中校团副的关系，和关中有关单位取得了联系。关中那边的人过来买我们的一点药材、甘草、大豆、皮毛、牛羊等特产，我们就利用换来的钱买布匹、棉花、弹药等东西。这样，尽管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全团做军装的百分之八十的布匹、棉花，都是通过这个团副的关系弄来的。另外，还买来了一些日用

品，如火柴、鞋袜，烟、酒等东西。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镇原县的敌人比过去老实了一些，为什么边区敌人的各个哨卡比过去松多了呢？原来是王震同志在给敌人团长的信中，也宣传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全国战场我军的胜利形势，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给敌团长指出了奔向光明的道路。

（王群 整理）

“独臂照样干革命”

贾继毅

1948年，我任晋绥军区二分区独立团二营教导员。当时我团归一野七纵队彭绍辉司令员指挥。11月4日，上级命令我营在太原外围战中坚守牛驼寨阵地。在察看阵地时，我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右手和右肩，当即被送到了华北机动第二医院五分院。由于失血过多，急需大量输血。然而，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军医院血浆奇缺，加之伤员又多，五分院仅有的一点血浆用完了。医院的同志见我伤势严重，十分焦虑。我因身体极度虚弱又加上阵阵剧痛而昏了过去……

傍晚时分，我苏醒了过来，感到身上有了一点活力。通信员激动地对我说：“教导员，你知道是谁派人给你送来的血吗？”我急忙问：“谁？”他回答说：“昨天组织股长来看望你，见你昏迷不醒，生命十分危险，就把医院的情况告诉了彭司令员。彭司令员立即给卫生部写信，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你。卫生部把留着急用的三百多毫升血浆全部送来了。”听了通信员的话，我心情非常激动，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清冷的月光透过窗眼照在床前，更增添了几分寒意，但我心里却热乎乎的。遥望满天繁星，我不禁想起了五年前和彭绍辉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还是1943年夏天，彭绍辉同志要从晋绥二分区调往延安任抗大七分院校长。临行之前，他来和同志们告别，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搞什么工作？”我回答道：“我叫贾继毅，在供给部任总支书记。”“战时的后勤工作很重要，目前，部队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多想办法，保证前方多打胜仗！”他说完后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又到战士们中去了。

没想到就这么一次很平常的见面，象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却被指挥千军万马的彭绍辉同志记在心上。我一心想着早点养好伤，重返前线杀敌立功，用实际行动报答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

但意外的情况却发生了。由于当时医疗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打进我右肩的弹头无法取出。手术后，我不幸地失去了右臂。

看着孤零零的左臂，想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跃马挥刀驰骋疆场，也可能要离开火热的部队和亲密的战友，我难受极了。失去了右臂，这将给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多少不便啊？！当时，我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伤，有时甚至胡思乱想起来。

一天上午，我正躺在床上沉思，通信员一把推开门惊喜地喊道：“教导员，彭司令员看你来了！”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你说什么？”话音未落，彭绍辉同志已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床前，他一把按住我不让我坐起来，微笑着说：“我要去前线，顺便来看看你。最近好点了吗？我听说你也不幸伤残了，一定会有许多想法吧？”在老首长面前，我把满腹痛苦一下子倒了出来。

彭绍辉同志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同志，不要被不幸所征服。一个革命者要时刻准备着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作斗争。”接着他指了指自己空荡荡的左衣袖筒，坚毅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残废人，但独臂照样干革命。残废的人不只是咱们两个，还有多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继毅同志，革命快要胜利了，需要我们做的事很多。记住，要坚强，要战胜困难！”由于他军务在身，再没有和我多谈，但这寥寥数语却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看着他的身影在门外消失，激动得我泪水模糊了视线。我默默地想：对，独臂照样干革命！

从那以后，我每天苦练掌握独臂生活的本领。我首先从吃饭和写字学起。刚开始时，那双筷子不听左手指挥，一不小心就掉在地上，但我坚持不让人喂饭，手酸了就歇一会儿，一顿热饭吃着吃着就变凉了。

最困难的是写字。用左手写字很别扭，写出来的字歪七扭八的，越看越不顾眼，写不上一会儿胳膊就酸得抬也抬不起来了。同志们见我写字很困难，都差动提出要帮我写家信，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无论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是写家信，我都不让别人代笔，尽管写得不好看，但毕竟是自己写的。在住院的几个月中，我每天躺在床上练习用筷子夹烟头，

在被子上用左手指头练习笔画，并在窗台上放一个小杯子练习独臂瞄准。我知道，象我这种身体情况，组织上一定会照顾的。但我想，自己虽然失去了右臂，却还有左臂，有困难就自己克服，决不能给组织上增加负担。我经常记着彭绍辉同志对自己的勉励，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我不但能用左手熟练地拿筷子、写字、打手枪，而且还能一只手剪指甲。这件事不知什么时候传到了彭绍辉同志那里。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休息时，彭绍辉同志笑嘻嘻地走到我跟前说：“继毅同志，听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技术，快给我表演一下。”我挺纳闷“什么特殊技术呀？”他说：“你能用一只手剪指甲，还不算特殊技术？我剪指甲都是请警卫员帮忙的，今天你一定要教会我。”在他的坚持下，我只好掏出指甲剪给他做了表演，同志们都好奇地围过来观看。

我把剪刀放在桌面上，先用大拇指压着依次剪掉其它四指的指甲，然后又用这四指配合左大腿的左侧再剪掉大拇指的指甲，不到两分钟便完成了。彭绍辉同志仔细地看完后，兴奋地拍了我一下说：“你比我进步大，应该向你学习。”其实，彭绍辉同志很勤奋，他用独臂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枪打得特别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从不让别人做。有一次他来我们食堂吃饭，秘书要帮他盛饭，他说：“大家都自己打饭，我怎能搞特殊呢？还是让我自己来。”同志们看了都深受感动。我觉得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951年，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校校长，校址在甘肃天水市。那年我也调到该校练习团任政治处主任，从此以后，我们经常生活工作在一起，彭绍辉同志每次见到我总要关切地问：“伤口还痛吗？身体不行就多休息几天。”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而且还常常用他革命的乐观精神感染我，给我以鼓舞和力量。

1953年7月的一天，旭日初升，天空格外晴朗，雀儿在枝头叫个不停。我快步向西北军区直属机关党委会走去，在办公楼走廊里，我和已任军区副司令员的彭绍辉同志撞了个满怀。恰巧，楼外的大喇叭里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走！咱们也做操去！”他说完拉着我就走。

我考虑到就剩一只胳膊了，还去出什么洋相，怕别人看笑话，就推辞着不去。彭绍辉同志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幽默地说：“怕什么？你差右臂，我差左臂，咱俩合起来不就可以做出完整的动作吗？”我拗不过他，只好跟着他出去了。他故意和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认真地做着每一套动作，满操场的人看着看着，不约而同地向我们投来了尊敬的目光。

1954年，彭绍辉同志要调到总参任副总参谋长。临行前，我去他家送别，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意味深长地说：“西北虽然条件艰苦，但历来是战略要地。你也算西北的老同志了，要努力建设好大西北，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此后，我们虽然见面不多，而他临别的话却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上。

（靳士信 整理）